

炎黄春秋

第 **2** 期
2006年

于光远：我所知道的江青

文革中的李达与王任重

抗联名将冯仲云

从陈播的一封信看《苦恋》高层争论

曾国藩与天津教案的现代法理评析

目 录

8 乔石同志题词：天下为公

人物志

1 文革中的李达与王任重……………湘 人

9 抗联名将冯仲云……………许人俊

13 韩光——屈指忆征程……………唐 瑜

春秋笔

17 我所知道的江青……………于光远

25 “罗思鼎”和“朝霞”事件……………史义军

31 李正文在苏联劳改营……………张志卿

怀人篇

37 我听胡耀邦谈防止文革重演……………张治宇

38 先父施咸荣的翻译生涯……………施 亮

亲历记

44 叩访李四光故居……………刘仰东

往事录

48 护法运动中“南北军”大战……………陈明德

52 王震两签合同为植棉……………熊坤静

55 东北青年抗日中的“一二·三〇事件”……………董锐平

沉思录

60 胡风与王实味冤案引出的同类教训……………郑文林

64 一个宣传了几十年的错误口号……………冯东书

文荟苑

65 从陈播的一封信看《苦恋》高层争论……………徐庆全

品书斋

72 曾国藩与天津教案的现代法理评析
——读唐浩明《曾国藩·黑雨》……………胡铁民 黎映桃

家言

75 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符合当时中央的战略部署
……………王辅一 李维民

古镜台

78 笃好文艺的皇帝多败国……………官伟勋

本期执行主编 徐庆全

顾 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李耀文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庄 李 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袁 鹰 凌 云
龚育之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 (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 社 长：方 实 徐 孔(常务)

杨继绳 吴 思

执行主编：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胡竞成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员：白建钢

秘 书 长：徐 孔

副 秘 书 长：杜明明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淞赵阔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ISSN1003-1170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电 话：(010)68522852 (办公室)

(010)68534879 (编辑室)

(010)68523512 (编辑室)

(010)68532048 (发行部)

传 真：(010)68532569

印 刷：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龙源期刊网

网 址：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定 价：5.80元

文革中的李达与王任重

● 湘 人

王任重与李达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李达是1953年2月就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因为新中国的高等学校是接受中央和地方的双重领导,所以尽管武汉大学是国家重点大学,李达是国务院任命的部管高级干部,但却同时接受教育部和湖北省领导。同时,李达也兼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由于这种双重关系,李达与王任重也有交往。再加上毛泽东来汉总要见见他,王任重作为东道主,虽然不是每一次都在场,但自然非常清楚李达与毛泽东的关系。

1958年,中共湖北省委创办《七一》杂志,王任重撰写《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一文,派人将稿子送李达征求意见。李达读后说:“马克思死了,怎么超?恩格斯也没有说过‘超’嘛!比如屈原的《离骚》,你怎么‘超’?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学习(包括读书和应用),发展是学习的必然结果。针对目前我们党的情况,一是普及不够,一是头脑发热,还是应当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

王任重接受李达的意见,发表其文章时把题目改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他却认为李达的意见是思想不够解放,仍然使用着不同时空、不同意义的“超”。他说:“我开始考虑这篇文章的时候,本来想用‘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这样的题目,因为有几位同志不同意所以放弃了这个题目。如果说学生要超过先生,儿子要超过老子,青年人要超过老年人,活人要超过死人……这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赞成的;但是如果说要超过马克思,那么有人认

为这似乎太狂妄了。我想,如果不准说超过马克思,那么能不能说马克思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是后无来者的一位神仙呢?能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达到了真理的顶点,已经结束了真理呢?我看这样的说法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那么超过马克思的提法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呢?难道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实践,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没有超过产生马克思主义的19世纪吗?难道马克思不希望后来的人超过他吗?”

思想和事业自然是发展的,不同时空的人也可以延续和发展同一种思想和事业,但却不是同一时空人的“赶”和“超”。李达不同意或反对王任重的“超马克思”,当然不是指思想和事业的延续和发展,而是既强调时空的界线,又注重实际的意义。1960年,当经济遭遇严重困难,他惨淡经营的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刊物《理论战线》不得不奉命停刊时,他终于道出了他当年反对王任重“超马克思”的实际意义:“超过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超……超……超得好!我们这个刊物还是小事,饭也没有吃的了!”

1958年,武汉大学同全国其它高等院校一样,进入了所谓教育革命时期。虽然在“教育革命”高潮中,毛泽东于9月12日视察武汉大学,肯定了武汉大学“教育革命”的成绩,而李达却开始了痛苦的反思,对武大“教育革命”由沉默、抵制到公然反对。李达对于“教育革命”的这个态度,不能不令中共湖北省委派往担任中共武大党委第一书记的刘仰峤和书记刘真甚至中共湖北省委不快。因此,即使在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眼里,李达也不免同二刘等人一样有“碍手碍脚”之嫌。但是,李达是中共创始人之一,行政级

别定的很高,又与毛泽东具有很深的历史关系并与毛泽东保持不错的私交,因此无论在武大还是在湖北省委,都被视为“通天人物”,他们对李达除了敬而远之,似乎也没有其它的办法。

为贯彻“高教六十条”,1961年武大党委开展了整风,省委派宣传部副部长朱劭天来领导。经过非常激烈的整风斗争,继刘仰峤之后担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的刘真被调回湖北省委,校党委两位副书记侯福珍、罗鸿运也被同时调离武大去郑州担任河南省国防工办副主任,改由朱劭天担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但是,李达因为反对1958年教育革命以来“左”的倾向,在1961年整风中又发表了后来被指称为对1958年“教育革命”“反攻倒算”的激烈讲话,因而便得罪了刘真等许多“教育革命”积极分子即后来他们自诩的“左派”,埋下了以后“文革”置他于死地的祸根。

朱劭天是北平燕京大学学生,“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后来去延安,曾任陈云的秘书。南下后留在湖北工作,来武大前为湖北大学(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本为知识分子出身的朱劭天,熟悉教育工作,具有甚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开会讲话也十分中听。他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后,李达与他配合默契,工作显然顺手起来。

不意到了1963年,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工作的刘仰峤拟把在1961年整风调离武大的侯福珍、罗鸿运调回武大重新担任党委副书记,并已获得省委同意。按照惯例,他找李达谈话,以示通报。但李达认为他们不懂教育,不宜回武大工作。刘仰峤很不高兴,便直截了当地说:“这是省委的决定。”意思是省委听你的,还是你李达听省委的?李达本来对刘仰峤1958年在武大领导“教育革命”就有看法,侯、罗二人那时分别担任物理系和化学系党总支书记,正是因“教育革命”的“成绩”而被他刘仰峤双双提拔担任武大党委副书记,现在又要把他们调回复职,李达自然顶牛。他毫不退让地说:“那好,他们回来,我就不做校长,要我做校长,他们就不能回来!”说完竟扬长而去!

刘仰峤不顾李达的反对,准备给侯、罗二人下调令。李达果真给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打电报,

请求辞去武大校长职务。有人劝他,他说:“生姜愈老愈辣,犯错误就犯错误,为了这件事,总开除不了我的党籍!”杨秀峰是资深的共产党人,第八届中央委员。解放前夕,曾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30年代,与李达同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他接到李达的辞职电报,十分惊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的事,何况还是发生在他这位大名鼎鼎的老朋友身上!他马上把高教部人事司司长叫来,将李达的辞职电报交给他说:“你赶快去一趟武汉大学,看李老遇到什么坎坎过不去。你只了解情况,回来报告。你在那里不要表态。”

高教部人事司司长来汉后,立即造访李府,转达杨部长的问候。他说:“杨部长让我来问您老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坎,以至于要辞职。”李达见杨部长接到他的电报就派专员前来关心,心情很激动。他在如实介绍了他与刘仰峤之间所发生的这场人事纠纷后说:“是省委刘仰峤同志跟我过不去。”

高教部人事司司长回京向杨部长汇报后,杨部长对着话机向王任重通报情况后说:“请你们省委尊重李达同志的意见,不要使他为难,不要跟他过不去。”于是,王任重不能不过问了,两位副书记的调任只好收回成命。

翌年春节,王任重陪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来武大给李达拜年时还就此事说:“省委对您老不够尊重,还请您老多加原谅。”李达感动地说:“我对省委也不够尊重,也请您和省委原谅。”李达此事在当年那个时候不无唐突;但后来“文革”说他是反对党的领导,却显然不实。

王任重此次去看李达,知道李达身体和心境都有问题,他也急了。他当即把常务副校长何定华找去谈话:“李老夏天去青岛,冬天去(广东)从化,你们要关心。没有钱,找省委,具体事你们办。”

但是,王任重却对朱劭天不劝阻李达给省委所捅的这个“漏子”有意见。后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对朱劭天说:“任重同志对你有意见。”意思是难道省委、特别是王任重还不能做好李达的工作,能让他打电报向高教部辞职?其实,这也是冤枉了朱劭天。因为李达给杨秀峰部长打辞职电报那天,朱劭天正巧感冒发烧未上

班，完全不知道李达与刘仰峤之间所发生的事。1964年，朱劭天终于被调出武大，去广州任中南局科委副主任，省委另派庄果担任武大党委书记。

1965年1月，李达当选为全国三届人大常委。中央组织部已通知他留京专任全国人大常委，不再担任武汉大学校长，还给他在京找了房子。他本人也于10月14日给武大党委写信说明原委，并要其家属将书籍、衣物搬去北京。但到12月中旬，中组部又派员向他传达：原决定系个别部长意见，现予作废。李达仍旧担任武大校长兼全国人大常委，既可住京，亦可回汉。他因急于向其助手交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历史唯物论大纲”的编撰工作，便于1966年1月22日回武大暂住。

可是，李达哪里想到，一场置他于死地的奇灾大祸就要降临到他头上了。他的赶回武大也就成了他“自投罗网”而抱恨终天之行。7个月后，8月24日，他就被迫害致死！

4月10日，广州开始举行“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13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讲话说：“这是一场很大的仗，中南局下了决心要打。”他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他点了李达的名，同时也点了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和刘节的名，并与王任重商量向武大派工作组。

4月21至23日，一连三天，王任重派车把武大哲学系助教陆某接到其百花村住所，听她汇报已经搜集到的关于李达等人的材料。指示她将她当面汇报的材料再以给他写信的方式送省委，然后由他修改加按，印发省委和武大党委，并上报中南局。陆某原在政治系工作，1964年政治系撤销后才来哲学系。应当说，她并不怎么了解李达。但是，她居然搜集到了李达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材料！

25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学术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他依据陆某提供的材料点了武大哲学系和中文系的名。他还说：“武大哲学系，哲学史学四年，马列主义只学一年，毛主席著作只学六周。”“工农调干学生为反对学哲学史，被迫退了学。这是共产党干的事么？”

28日，武大党委书记庄果向全校党员传达



李达

王任重的报告，并宣布省委确定武大为“教育革命”的试点，已派省委书记处许道琦和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来武大领导运动，会同武大党委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

王任重特别指示，要把李达斗倒，关键在于做好知情人的工作。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根据这个指示，对他们所确定的“知情人”，包括李达的编书助手、秘书、警卫、司机以及与李达有工作关系的教员和干部，日夜追逼他们按已经定下的框框写交待、揭发材料，要求他们“拿出定性的东西来”，“一句话也要”。在那种“知情不报就是对组织不忠，对毛主席不忠”的时代氛围下，一些人出于对组织的忠诚，或出于自我保护，都不得不揭发交待。于是，“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很快便编印了《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并由王任重加上夹批按语上报中南局和党中央。

王任重在上报党中央的这份材料时又附信请示：“如中央同意，我即告武大党委首先印发

给全校党员阅读讨论,然后发动全校师生进行批判。这是武大教育革命中要打倒的一个资产阶级权威,也是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帅。”附信还说:“我看这一场革命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省委决定先以武大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展开。”在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既不可能判断这份材料的真假,又没法不同意湖北省委的意见。

另一方面,省委又将这份材料报送5月上旬在广州召开的中南局扩大会议讨论。陶铸再次强调批判李达是个大事,省委要派人去。5月12日,陶铸在扩大会议上宣布,批判李达,中央已经同意了。接着,中南局召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其中一个内容是进一步部署打倒李达“三家村”。

李达成为“‘三家村’村长”

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并在《人民日报》发表后,6月3日,武大召开全体师生的紧急动员大会。会上传达了陶铸5月19日在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上的报告,庄果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向珞珈山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动员报告。他正式宣布:“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店,李达、朱劭天、何定华是它的三个大老板,牛永年(按:党办主任)是‘三家村’黑店的总管。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把武大的领导权篡夺过去了……我们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揪出来,把这个‘三家村’黑店彻底粉碎掉,把学校领导权夺回来!”“现在我们宣布:从今天起,运动正式展开!”

动员大会后,李达向庄果要他的“罪行”材料看,几经要求,6月5日,庄果才让把“教育革命领导小组”5月初整理的那份“初步材料”同李达见面。李达看了三遍,用他的秘书刘某向工作组密报的话说,“他基本上逐条反驳”。他说:“材料绝大部分是造谣,他们把话变了样,王任重看过加了按语,只听他们的,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不听听我的情况。”“他们讲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反动派,我怎么能承认?我到死也不能承认

是反动派!”

6月13日,武大召开“声讨珞珈山三家村反动罪行大会”。先让李达在家听实况广播,散会前,保卫科指使人把他揪到会场所示众,被三次按下头来现场斗争,并被摄像。就在这一天,省市118个单位十几万人来武大声援和声讨,人流长达数里。接着又有数十万群众,夜以继日,敲锣打鼓来武大,持续半月之久。同时,湖北各地市县也召开各种声讨大会。

同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和省、市人民广播电台向社会公布武大揪出“珞珈山三家村”,发表报道和社论。以《湖北日报》为例,其第一版头版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同时发表王任重6月7日对武大的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下半版通栏标题:《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珞珈山,武大揪出朱劭天何定华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报道说:“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一九五八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压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武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与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复地进行了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激烈的斗争。”第二、三版则发表了武大一些人揭露批判武大的“三家村”黑帮的文章和大字报。

14日,《湖北日报》第一版通栏标题报道“同声欢呼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众口齐诛珞珈山的‘三家村’黑帮,全省人民坚决声援武大革命师生,横扫一切害人虫”。第二、三两版则是报道声援情况。15、16日的《湖北日报》继续以整版的版面报道声援情况。

据《武大战斗报》16日报道:“截至15日晚上8时止,来珞珈山声援我校革命师生员工的共达两千多个单位近三十万人,送来声援书十万多张,声援信五千五百多封,从全国六十七个县市来电七百八十四份。”“目前,在全国、全省、全市、全校已经燃烧起了烧毁‘三家村’的燎原烈

火。”

但此时报刊电台对李达尚未点名,而以“某资产阶级‘权威’”代指。6月28日毛泽东来汉时,工作队(按:6月中旬以后,工作组扩大为工作队)还派人将李达住宅内外关于“打倒黑帮头子李达”一类标语、漫画、大字报统统揭去,洗刷得干干净净。究其用意,一是王任重仍在请示毛泽东:“李达的问题,可不可以上报点名?”一是考虑毛泽东万一来武大视察,不至于有碍观瞻。

李达在历史上脱党但始终宣传和研究马列主义,这本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在那“怀疑一切”的时代氛围下,人们亦怀疑李达也一定有“大问题”。王任重在《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加按:“李达同志的历史可不光荣啊!一九四九年以前你在哪里?”在决定打倒李达的中南局会议上,庄果也预言:“按一般情况,李达一定是在大革命时叛党的。”

6月30日,李达被报刊、电台公开点名揭发和批判。当日《湖北日报》头版下半版,在通栏标题《打垮武大“三家村”黑帮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之下,发表“编者按”说:“今天本报发表两个材料,一个是《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一个是《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这两个材料,进一步揭露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黑帮的反动面目,这样,就便于同志们了解他们的反动言行,看透他们的反动本质,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批判,把他们斗倒斗臭。”

李达向毛泽东求援

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畅游长江,消息顿时传遍武汉三镇。李达从门外雀跃的小孩知道了这一消息,不由产生了一线希望。17日,他试探地问刘某:“听小孩讲,毛主席来武汉了。”刘某因未得工作队指示,不便回答,只是冷冷地答说“不知道”。他迅即向工作队汇报。工作队耽心的正是怕李达去见毛泽东,便反过来让刘某去试探李达是不是有想见毛泽东的念头。

李达经受18日那天他家乡湖南零陵“贫下中农代表团”和哲学系部分师生的面斗后,心里

愈加愤怒。他甚至气愤地说:“我是叛徒,是叛的陈独秀的党,不是毛泽东的党!”他也更加痛苦,到19日很少说话。得到了工作队指示的刘某这时以关心的口气反过来问李达:“毛主席来武汉了,你是否想去找主席?”而李达却反而冷静了,他说:“毛主席在武汉,可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也可能不会接见我。问题这么多,毛主席怎么包得了!”刘某向工作队汇报,工作队也就放心了。

但到这天下午,李达的血压已升到了236/114,尿糖仍是4+。在饭厅床上量血压时,刘某劝他坦白交待,低头认罪,他“顽固猖狂”地讲:“我过不了这一关,快死了,斗死算了。我顾不得别人了。死了拉倒,后代也不管啦。”量完血压,他背着石曼华叫刘某入内,“怒气冲冲”地说:“叫我回乡,带回去斗,我不去,要带就带死的回去,我就死在这里。”他对刘某说:“你帮我一次忙,不知肯不肯,就帮这一次忙。”刘问:“什么事?”李达说:“我血压这么高,随时都可能脑溢血,今天气喘病又发作,这是心力衰竭的征兆。我76岁了,死了算啦,你帮我一个忙,救一条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里去。毛主席住在东湖宾馆,内有冷气设备,你去找。”

随即,李达用毛笔亲笔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 武汉大学李达”。信纸上写:“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日”。

李达这封信虽说是请毛泽东“救”他一命,但实际上也是对毛泽东的“将军”:“我写有坦白书,请你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

对于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李达要刘某马上送到。但是刘某因为还没有与工作队联系,不便答应,便推说:“今天已下午5点多了,明天一早送去。”

李达不依说:“今天就送去,你送去,要不找祝福庆、刘敬一(按:均为李达警卫,运动中已被调开)送去。”他还特别交代:“你帮个忙,送这封信到毛主席那里,你不要与工作队他们商量。与他们一商量,信就送不到毛主席手里了,他们会留下。”他似乎在提醒刘某:“这还是一场宗派斗争,刘真、侯福珍回来领导运动,他们来整我们



1958年3月1日,王任重(右一)陪同周恩来和李富春(左二)、李先念(左一)、在湖北视察

几个人,非要把我们整死才甘心。”刘某顶他说:“省委不早作结论,武大没宗派问题。”他仍然说:“是宗派斗争,整我们几个人……”

5点半,刘某即到招待所向工作队庄果等三人汇报李达写信情况,交了信。庄果接后即行拆阅,在取信纸时还说:“呵,这是给主席的信啦,没有看见,糟糕!我犯了个错误。”因为其时已有作为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反党集团成员的杨尚昆所谓私拆和扣押毛泽东信件的“罪行”问题。

他们商量后,决定把信留下。庄果又告诉刘某如何向李达交代。他说:“你先到外面去玩玩,过一两个钟头再回去,对李达就说信已经送到毛主席那里了。”遵照庄果的指示,刘某晚上七点半回去见李达,讲信已经送到的情况。

李达问送信的经过,还讲主席是住在什么地方。但他又怀疑地问:“信是否真送到了?”刘某说:“怎么没送到?毛主席住的地方还有绿色篱笆呢。”李达似乎还不放心地问:“有收条吗?”刘某未想到此着,愣了一下,便支吾说:“信交给了警卫,他说给主席的信是不给收条的,他保证送到就是了。”李达由衷而充满期待地说:“辛苦你了,交给警卫,信毛主席一定能见到。”

直到7月29日,工作队陆某才让其秘书将李达这封给毛泽东的“救命信”改换信封,以机

要档交邮局寄“中共中央毛主席收”。陆某此举同样是出于所谓杨尚昆“私拆”和“扣押”毛泽东信件的“罪行”问题。

6月30日报纸、电台点名批判李达,翌日,7月1日,王任重就拟向已来汉的毛泽东呈报《关于李达问题的调查综合材料》,并写下一段请示的话:“请主席阅。李达是个地主分子,又反党

反社会主义,立即清洗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可否?请批示。”但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他又把写好了的这段“请批示”用红铅笔划去了。此后尽管他每天都能见毛泽东,却并没有向毛泽东呈报请示。毛泽东决定7月18日晨离汉回京。17日晚上,他在东湖召开省委常委会,一举通过了《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这个《决定》没有经过任何一级基层党组织的讨论,也不听李达本人的申辩,属于运动中的“热处理”,而不是通常运动后期的“落实处理”,并且属于“文化大革命”的罕例。

这个《决定》也开列了一些强加给李达的“三反”言行,明文肯定了李达“是个老叛徒”,但却既不给李达戴“三反分子”帽子,也不以“叛徒”罪名清洗出党,却只戴“地主分子”帽子开除党籍,并“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管制劳动改造”。

这个《决定》连同《关于开除李达党籍的请示报告》上报中组部,由该部八处于7月27日呈送已调北京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陶铸批阅。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的8月1日批复:“同意你们给予李达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但是,李达本人对此却一无所知。

8月10日,毛泽东看到了一张条子:“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写这张条子的人当然就是收到武大所寄李达给毛泽东救命信的人,他注明“武汉大学”,是因为他知道除了“文”李达,还有“武”李达,即刘邓大军的参谋长、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李达上将。毛泽东看到的只是这张条子,并不是李达的原信,自然不知李达的其它话语。但对于李达的求救,他岂有不允之理,当即便用他那特制的粗红铅笔作批:“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同日,陶铸也在这张条子上作批:“即送任重同志”。

王任重后来说,毛泽东还曾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他也向毛泽东保证:“武大的革命师生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

但是,无论是毛泽东对李达“救命”信的批示和对王任重的当面指示以及王任重向毛泽东的保证,都没有传达,武大的师生也无从知道。但到8月中旬,省长张体学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回来却对武大校文革传达了毛泽东对李达问题的这样两点指示:毛主席说李达是没有什么用了,我相信武大革命师生是不会对李达采取过火行动的。

8月16日,张体学一行来武大,临时召开师生员工3万人大会(包括附近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测绘学院等院校)。性情豪放、快人快语的张省长对李达问题又讲了一番能烘托当时“革命”气氛的话:“李达,过去我们叫他李老,现在我们叫他老不死。他现在已经搞臭了,你们再用不着斗他了。你们一定要相信省委,把他交给我们处理。让他进博物馆,吃饭、睡觉、拉巴巴!你们也可以回家看妈妈。”

李达之死

自7月中旬进入批斗高潮以来,李达胃溃疡复发,糖尿4+,血压已升到236/114,常感“头顶发麻”,心力已感衰竭。但他仍被强迫参加大小批斗会,最后是在家听批斗实况广播。由于他已是被公开点名批斗的“敌人”,校卫生科也停止了对他的公费医疗,连糖尿病需经常服用的D860药也停止供应。李达的病情愈来愈重,到8

月上旬,他已感到极度虚弱。他多次请求自费住院检查、治疗,让他活到运动结束以后再死。据当时武大卫生科医生说,李达虽年老多病,但按他的体质和病情,如果保持正常条件,稍加医疗照顾,三五年内是不容易死去的。但此时已既无正常条件,更无照顾医疗了!李达因是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行政6级,在正常条件下,他不仅享受特殊医疗待遇,而且有防痨专家、武汉医学院李晖教授的亲自诊治,他的治疗和保健当然不成问题。但是,现在他遇到了极不正常的条件,他也就是脱毛凤凰不如鸡了,连自费治疗请求也得不到准许,哪里还谈得上医疗照顾呢?

8月13日黎明,李达在卧室突然摔倒,仰卧在地,脸色苍白,口吐鲜血,连血都喷到了墙上。监视人员不仅不去请医生,反而斥责李达夫妇在耍花招。当日上午9点左右,卫生科医生来探视,诊断可能是胃出血,血压也陡降为90/50,随时有发生休克的危险,建议立即送医院治疗。刘某去工作队请示,医生也去向工作队说明诊断情况,但却被一句“研究一下”的话推搪了。上午11时才由护士来打针止血,却并未给药。

19日晨,李达高烧39.4℃,又从床上摔下,监视人员仍漠然置之。到20日才来一位护士打针。她发现李达小便带血,大小便都拉在床上。她要去向医生反映情况,也被制止。

李达自知年事已高,现在又病处垂危,但他仍在顽强地坚持生存,不想就这样戴着一大摞黑帽子死去。他尤其寄希望于和他有几十年友谊的毛泽东!他对夫人说:“等病好了,我们就离开武汉大学,我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向毛主席告状!”于是,他最后再一次向庄果请求允许送他去医院。他悲愤地说:“印度战俘有病,我们也给他治好病送回,现在你们把我当敌人,我就算是你们的一个俘虏吧,你们也应当让我治病呀。”然而,他的请求仍未被准许。

自8月13日胃出血卧床后,心力衰竭,李达很少说话。他的住院请求被拒绝后,自知不久人世。17日,他终于嘱咐妻子:“我如死去,请转告托德麟同志,我唯一的恳求,就是希望他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编出来,上卷改好,帮我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

一直到8月22日早上,李达已奄奄一息,工

天下為公

敬錄孫中山先生教言

乙酉冬

喬石

乔石同志为 孙中山题词手迹黄金版 首发式题词

首发式举办单位

中国孙中山研究会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中国研究出版社

作队才叫刘某等 2 人将他送往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但不准夫人石曼华去护送和护理。李达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对夫人说:“他们不让你今天去,你好好带媛媛,明天来看我。”于是,李达以“李三”的侮辱性名字(李达三家村意)住进普通病房(按行政级别,李达是当时整个武汉地区两位 6 级干部之一,当住高干病房)。第二天,秘书刘某来找石曼华,说他马上去医院,要她买些鸡蛋糕交他带去。石曼华要求一起去,仍然遭到拒绝。她请求带一点牛奶去:“他是靠牛奶吊命的。”但刘某还是不愿意。结果,石曼华只好买了四块鸡蛋糕和四个梨子给他带去。医院每天早餐是稀饭馒头,中、晚餐则是干米饭,李达粒饭未尝,石曼华托刘某带去的鸡蛋糕和梨子,也原样未动。只三天,8月24日,李达便撒手人间,含冤死去。

李达死后,25日,遗体即被火化。当天晚上,武汉大学校文革召开全校师生员工“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大会,宣布李达已死,宣读中央陶铸批复的那份《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

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1967年春,武汉大学部分群众组织开始公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这年夏,王任重也受到了部分群众组织的严重冲击,并从此身系冤狱近8年。

王任重在接受武大为李达翻案的群众组织盘问时说,对于打倒李达,他先后三次直接请示过毛泽东。第一次,杭州会议期间,他问毛泽东“李达可不可以批判”,毛泽东不表态;第二次上海会议问,毛泽东仍不表态;第三次问,毛泽东才说:“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这也就是前文所说直到1966年6月30日李达才被“报纸、电台点名批判”,而此前一直被报纸、电台冠以“某资产阶级‘权威’”的原因。

1985年,曾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在武汉大学纪念李达诞辰95周年的会上披露了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在东湖客舍当面论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举座皆惊!人们也更加由

衷地敬佩李达的睿智和胆识。但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任重却于1989年3月撰文《满篇谎言》,认为梅白所披露的这场论争“全是一片谎言”。他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主观主义的口号毛主席没有提倡过,湖北省委也没有提倡过。”但是,所幸梅白并不是孤证,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一书之22节也述说了这场颇有兴味的哲学论争。

然而,正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据说,王任重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日,终于说到他这一生有两个人对不住:一个是李达,一个是张体学。他所说的对不住李达的地方,不用再说了;而他所说对不住张体学的地方,大概是指1959年反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批张体学的“右倾”吧。张体学同样是革命家,王任重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他担任第二书记兼湖北省省长。他虽然文化和理论水平不很高,但却是一位性情豪爽、快人快语、体察民情、关心民瘼的好省长。不过这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了。

(责任编辑 萧 徐)

抗联名将冯仲云

● 许人俊

教授之家成了省委活动中心

1930年夏天，冯仲云在北京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历经折磨和考验。不久，北方军阀纷争，政局混乱，监狱管理松散，他乘机逃出监狱，北上哈尔滨。经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推荐，他到哈尔滨商船学校（青岛海军学校分校）担任数学教授。学校位于松花江畔，位置僻静，有利于开展隐蔽斗争。党组织支持他以教授身份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他虽然只有22岁，但数学天赋高，富有组织和教学才能，很快赢得海军学校师生的欢迎和尊敬。附近的中学纷纷慕名聘他担任高年级大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教学。他不仅团结学生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文艺书籍，而且秘密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和反帝会会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在沈阳的满洲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许多领导人被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驻东北代表兼省委书记的罗登贤，被迫转移到哈尔滨领导抗日救亡斗争。他在冯仲云家中紧急召集北满党的领导人开会，研究新形势下如何开展工作。冯仲云受命担任满洲省委少数民族委员会书记、全满“反日会”党团书记、省委秘书长，妻子薛雯任省委交通员，侄子冯钺任省委联络员。

当时，省委面临严重困难：一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央苏区正遭受敌人残酷围剿，东北党组织与党中央已失去正常联系；二是党的活动经费业已断绝，省委需要自筹资金。

幸好冯仲云是教授，又兼任附近中学数学课，月收入260多块银元。他们夫妇拿出180元

交党费，同时利用各种关系筹措活动资金。

不久，他们家迁到市区南岗一栋僻静的俄罗斯别墅里。当时，满洲省委下辖哈尔滨市委、磐石、珠河、汤原、宁安等中心县委，双方都是通过秘密交通员传递文件、沟通情况。省委文件和宣传品，均由他组织秘书处印刷、分发，妻子薛雯负责机密文件保管和秘密交通接头。她不断在省委宣传部、组织部、印刷机关之间往来联络。

当时罗登贤27岁，冯仲云、赵尚志24岁，赵一曼26岁，薛雯19岁，平均年龄24岁。为了抗日救国，他们分别告别故乡——广东、江苏、四川、河南，先后来到哈尔滨，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友谊。

教授投笔从戎组织抗日武装

1932年，东北三省已被日寇全部占领，关东军到处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城市隐蔽斗争更加困难。此时周恩来以伍豪名义发表文章，提出“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罗登贤如获至宝，决定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周保中、杨靖宇、赵尚志等分别到各地组织抗日武装斗争。

不久，省委又派冯仲云到松花江下游的汤原中心县委组织抗日武装。

汤原县原有一支中国工农红军33军抗日游击队，因缺乏经验，战斗不断受挫。冯仲云多次召开党的会议鼓舞士气，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捐款买枪给游击队。同时发动游击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开展夺枪斗争。在他组织动员下，有一次从敌人手里夺取了五条枪，士气大振。这支队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后来发展成为令

敌人闻风丧胆的抗日联军第六军。

1935年1月28日,哈东游击队正式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庆祝大会后,李兆麟、金策、王惠同、赵一曼等率领部队赴方正、延寿地区打击敌人。他和赵尚志率领部队化装成伪军向方城岗、小山子等行动,仅三小时就占领敌人三个据点,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后来又组织反日联合军突击方正城,俘获伪县长。当年冬天,关东军对抗日联军加强了扫荡,战斗十分激烈,第三军二团顽强抵抗,团长王惠同光荣牺牲,赵一曼政委不幸被俘,第二年英勇就义。不久,冯仲云和十多个战友在转移中,也遭敌人突然袭击,三个领导干部牺牲。他左手负伤,仍带着伤痛掩埋好战友的遗体,发誓:“为了祖国的统一,要斗争到最后一滴血!”

事后,他代表省委向党中央写报告:“哈东游击区,自1935至1936两年间,同志牺牲者数百名,百姓以数千计,血染帽儿山,尸填乌吉密,哈东人民解放斗争实以鲜血写成中华民族斗争史之光辉灿烂的一页。尤其是我共产党员赵一曼、王惠同等诸同志,在敌人百般严刑拷打、威逼与利诱之下,不屑屈辱而慷慨悲歌,从容就义,使哈东人民永铭勿忘,实我大中华民族之光荣,谁谓东北无慷慨悲歌之士!”

1936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东北党组织在汤原县密林深处召开了历史性的“汤珠联席会议”。他和汤原、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及东北抗联第三军、第六军军长赵尚志、夏云杰等出席,确定“领导群众抗日反满的各种紧迫的经济、政治斗争,广泛造成全民抗日统一战线,并在统一战线中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关于游击运动则提出“采取进攻策略,向新区发展,向日满统治薄弱的缝隙突击,以出奇制胜游击战术解决敌人。”

会议推选冯仲云为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赵尚志为执委主席,并和省委常委夏云杰共同负责军事部,朱新阳为省委常委,任青年部长,李兆麟为省委常委。

当时,在江西的党中央因反围剿斗争失败被迫率领红军长征,东北党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组织关系改为由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王明、康生直接领导。面对日本关东军的残酷扫荡,

东北党组织领导抗联部队坚持独立自主、顽强作战的方针,牺牲和损失惨重。王明、康生不了解东北艰苦复杂的斗争情况,给东北党组织下发《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以及补充指示——简称《王康指示信》、《吉特信》、《中代信》。其中有正确的指示,也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内容。满洲省委在讨论这些指示时,往往意见分歧,争论激烈,产生许多不必要的矛盾,严重影响对敌斗争。冯仲云、赵尚志对王、康指示曾经持怀疑和反对态度。

当时,王明、康生对东北党组织时有不满,经常调换领导班子,多次令满洲省委领导成员去莫斯科汇报、接受审查,甚至挂起来不作结论,给省委工作造成许多困惑。长期在省委工作的冯仲云深有体会,所以他这次特地派常委朱新阳去莫斯科汇报,请求指示。不料王明、康生严厉批评《汤珠联席会议决议》“完全是反统一战线的”,“不是真正懂统一战线”,“不懂满洲实际情况”。而且不让朱新阳回国沟通情况,送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挂起来。

朱新阳一去不回,《汤珠联席会议决议》得不到莫斯科批准,根据地议论纷纷,冯仲云处境尴尬,但仍坚持党性,忍辱负重,履行领导职责。幸好不久吉东省委成立,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周保中代表省委给冯仲云写信,表示理解和支持,他受到莫大鼓舞。

1937年,“七七事变”前,他和赵尚志商定在汤原县小兴安岭山谷里召开北满省委扩大会议,除冯仲云、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省委常委和珠河、汤原中心县委书记出席外,抗联第三军、第五军、第六军领导人也赶来与会。会议决定千方百计带领部队,利用青纱帐和深山老林开展游击战,发动群众对抗日本关东军的三光政策,打击敌人。

会后,他和东北抗联的将领们分别率领部队,在松花江两岸和兴安岭野林不断出击。有一次,在鹤岗煤矿附近集镇活动,日本关东军正张贴布告通缉他,调动部队四处搜捕,悬赏一万元要他的人头。地下党向他通报情况,他镇静表示:“不用怕,敌人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他有千军万马,我有地下长城。”

第二天凌晨,他和战友们趁着朦胧雾气钻出

铁丝网,胜利脱离包围圈。当时,敌强我弱,反讨伐战斗十分残酷,东北抗联原有三万多人,只剩下一千人左右。一些团、师、军长相继牺牲,血染疆场。敌人曾经押着战俘辨认哪个遗体是冯仲云。战士为了迷惑敌人,随意指一人说是冯仲云。敌人信以为真,将人头割下悬挂牌楼上炫耀战绩。

其实,当时冯仲云正在森林里参加省委会议。会议选举他和金策、李兆麟三人组成新的常委会,确定金策任省委书记,他任宣传部长,李兆麟任组织部长。那是东北抗联部队最为艰苦卓绝、充满悲壮的岁月,敌人重兵讨伐,强迫群众并屯居住,切断抗日部队的联系。我军伤亡惨重,粮草弹药断绝,到处冰天雪地,大家以树叶作铺,围着篝火睡眠,常常挖树皮草根、猎杀野兽充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作战,在漫漫森林里辗转穿行。冯仲云与李兆麟等战友偶尔相遇,第一句话往往是“你还活着呢!”

1939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那天深夜,为了打通与党中央的联系,他和战友高禹民等,越过边境进入苏联境内,寻求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沟通情况。

在异国他乡,他四天内奋笔疾书,挥泪写了三万多字悲情报告:“亲爱的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从1935年5月——1939年5月,整整四个年头了……北满党完全处在四外隔绝的状态,得不到任何直接的援助,没有得到上级组织的领导……但是值得中国人民嘉许和中国共产党足以自豪的,是我们在敌寇空前严重压迫之下,在巨艰万难的环境中,本着共产党

员的真正革命精神,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不怕流血地前进!一息尚存,誓死抗战,使我大中华民族历史上呈现灿烂的光辉!”

他直言不讳提出“中央三四年来与东北党,尤其是北满党没有联系,使党内各种问题不能在政治上、组织上得到解决,使工作受到无限损失。这是错误的,我们认为中央某些同志应该负有责任。”他希望见到中央同志当面汇报,批准由苏联远东党部发起召集吉东、北满党领导人开联席会议,研究建立统一指挥和调整党的领导机关等问题。

一个月后,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海来看望他们,冯仲云再次提出上述要求,对方说正在请示中,他又要求给延安党中央发电报联系,马海将电文带走,以后杳无音信,始终未见到中央领导人。

冯仲云焦急万分,直到1940年1月,他才和先后来苏联的周保中、赵尚志见面,共同商定在苏联伯力召开中共北满、吉东省委代表联席会议。

12天会议,认真总结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确定统一成立东北抗日联军:南满为一路军,杨靖宇任总指挥、政委;吉东为二路军,周保中任总指挥,崔石泉任参谋长;北满为三路



50年代的全家福

军,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许亨植任参谋长。

不久,他们返回中国境内,向抗联部队传达伯力会议精神,继续在林海雪原深处浴血奋战,开展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此时,日寇在东北的兵力已增至100万,对抗联部队进行“毁灭性的扫荡”,攻势猖獗、残酷,抗日名将杨靖宇、赵尚志等相继壮烈牺牲。

为了保存实力,积蓄干部,东北党组织决定将抗联一部分部队转移到苏联境内继续整训,冯仲云由此开始进入新的人生历程。

配合苏军光复东北河山

苏联伯力附近有一个一千多人的抗联野营基地,属于学习、训练性质,通常叫教导旅。成员是苏联、中国、朝鲜的抗日军政干部,其中有中国的冯仲云、刘亚楼、周保中、李兆麟等,也有朝鲜的金日成、崔庸健等,亦称国际旅。冯仲云、刘亚楼和一位四川人是国际旅的三位“大老师”,分别讲授政治、军事课程,深受人们尊敬。

当时,大家都盼望祖国早日解放。1945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本宣战,调动150万精锐部队,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对日军发动突然攻势,给日本关东军毁灭性打击。那天上午,中、朝抗联将士在伯力机场握手告别,先后登上飞机回国参战。金日成等率队进军平壤;周保中、李兆麟率队进驻长春和哈尔滨;冯仲云率队进驻沈阳,担任警备司令部副司令。他首先会见八路军先遣队曾克林将军,写信向党中央汇报抗联部队回国参战情况,“希望党中央派人来,越快越好。”同时指示沈阳电台着重播送新华社的新闻稿,宣传东北人民抗日英雄事迹。

不久,“九一八事变”14周年来临,在沈阳十万人“血耻大会”上,他以驻军副司令和东北抗联将领的双重身份慷慨演讲,回顾东北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号召大家勿忘国耻,建立自己的军队。当天傍晚,党中央派陈云、彭真、伍修权等到达沈阳,他们热情握着冯仲云的手,亲切慰问:“我们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事最艰苦,第一是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第二是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是东北抗

日联军的十四年苦斗。”接着,他参加了东北局工作会议,直接接受党中央的领导。冯仲云重情重义,深切怀念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杨靖宇、赵尚志等战友,曾写报告要求东北局在他们牺牲的地方命名纪念。后来,黑龙江和吉林设立了尚志县、靖宇县。

1946年4月24日,38岁的冯仲云高票当选松江省主席。不久,“七七事变”九周年纪念来临,哈尔滨20万人隆重集会。他在大会发言中热情歌颂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赞美东北人民前仆后继抗击日寇的英雄气概。同时,他念念不忘战场上壮烈牺牲的战友,饱含热泪倡议将哈尔滨最热闹街道改为靖宇街、尚志街、一曼街,获得热烈赞成。从此,三位民族英雄的名字,连同他们的事迹永传人间。

大会刚刚开完,战火纷飞年代离别12年之久的妻子薛雯带着儿女,也从江南新四军根据地来到哈尔滨。一家人久别重逢,幸福团聚,其乐无穷。东北局领导陈云、彭真、林彪、林枫四对夫妇,特地设宴为患难夫妻幸福团聚热烈祝贺。席间,大家相互开玩笑说:女同志应该学习薛雯,男同志应该学习冯仲云,他俩成了忠贞爱情的榜样。

此后,他一直担任省主席、东北局委员,并同周保中联名向东北行政委员会倡议建立东北烈士纪念馆、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烈士子弟学校。他经常执笔撰写东北抗联烈士们的英雄事迹,不断向文艺界提供有关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以及八女投江等故事的生动素材。当时,文艺界的袁牧之、陈波儿、塞克、周而复、刘白羽、于敏、石联星等,经常到他家里做客、聊天,搜集抗联部队的资料。电影《中华儿女》、《赵一曼》在国内外获奖后,剧本作者颜一烟和著名演员石联星曾感慨说:“望着这些荣誉,我总不想起最初向我谈材料并给了我许多帮助的冯仲云。”

冯仲云还兼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每周到学校办公一天,帮助解决难题。著名作家刘白羽采访冯仲云后,夸赞“他是一个教授,一个学者,是从艰险中苦斗出来的出色英雄。”“他是一个热情的人,也是一个好作家。他一时一刻也不忘牺牲的战友。”

(责任编辑 致 中)

韩光——屈指忆征程

● 唐 瑜

韩光从十几岁参加革命，是抗联组织者之一，是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李兆麟的战友，是新中国第一位大工业城市的市长，是国家科技战线和国家经济建设的卓越领导人。76岁时韩老才从中央纪委常务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

沐浴着八月的阳光，我们走进韩老的家。作为晚辈，我们倾听，我们思索。韩老的一生有如一部生动的教科书，让我们去阅读，去品味，去接受它的感染。

做一个职业革命者

韩老说，参加革命，就得下两个决心：一是不再升学，放弃正常学业；二是非经组织允许，个人不谋社会职业，做一个职业革命者。

1929年冬，他在邹大鹏（中共党员）老师的帮助下，来到哈尔滨参加革命活动，被组织安排到哈尔滨学院从事学生工作。实际上，后来他的一切活动、去向都是由党的哈尔滨市委决定的。

1930年3月31日，东北特区警察局以印制、出售进步书刊为由对哈尔滨书店、开明书局进行搜查；同时，以哈尔滨学院“煽动学潮”为借口，逼迫王里封院长辞职。消息传来，全院师生义愤填膺。当晚，学生召开会议，抗议当局干涉出版、集会、言论自由的野蛮行径，并决定举行游行示威。第二天，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哈尔滨青年反帝大同盟”、“争自由大同盟”等学生群众组织举行示威。沿

途散发《青年反帝大同盟宣言》、《哈尔滨青年反帝大同盟纲领》、《哈尔滨市民争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等传单，号召工农兵群众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海陆空军出中国，撤消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军事设施。第二天，又搞了“飞行集会”发表演讲，学生们的演讲博得了工人们的掌声。这次行动中有4名学生被捕。在参加哈尔滨学院的学生斗争过程中，韩光被吸收参加了共青团，介绍人是邹大鹏和朱新阳。这是他职业革命生涯的开始。1930年4月，哈尔滨市委把韩光调到市委机关搞秘密印刷工作，主要负责刻蜡版，印宣传品。

韩老给我们讲了这个时期的一个故事：

有一天，警察突然来“造访”。房东陪着警察



1946年韩光在大连

来敲门。这时我正关着门复写密件。听见敲门声，知道是警察来了。因我事先早有准备，桌子上经常放着代数、物理等课本，还有没算完的习题，钢笔当然也是插在墨水瓶里，随时可用。这时，我迅速将密件藏好，右手拿起钢笔，从容地站起来，用左手把门打开，若无其事地说：“老总有什么事吗？请进屋里说。”警察一看我正在做功课，一点也没怀疑，还说“老弟真用功啊！”我回答说：“为了升学，不得不努力复习。”房东于是也对警察说：“这位学生每天都是这样用功，日常我都舍不得打扰他。”我给他们每人倒上一杯茶，又给那位警察点上一支香烟。那警察问了我的姓名后，又问有没有家眷，为什么不在家乡复习等问题。我说：“家乡哈尔滨的学校多数都开俄文课，补习俄文可以，可英文就不行了，不及沈阳补习英文的学校多，水平高。”他喝了一杯茶，吸了一支烟，说：“不打扰了。”我送他们出了房门，这次检查就这样从容应付过去了。

韩老是在邹大鹏老师的引导下把革命志向，付之于革命实践的。时隔70多年后谈及此事，韩老仍心存感激地强调“立志”“做事”都“要有引路人”，要有良师，无论性格、人格都要有可法之楷模。

特殊的较量

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击败了日本关东军，对东北地区实施管制。当时的大连没有中国自己的政权，国共两党在大连政权的接管上展开了一场特殊的较量。

1945年10月，韩光按照彭真的指示，“抢形势，搭架子”，成立了日本投降后的第一届党的市委，制定了具体的行动方案。韩老为我们讲述了几件事：

对于国民党企图接收大连的各种阴谋活动，我们一直密切注视着。根据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为应对国民党可能接收旅大政权，采取了几项对策：如与苏军商妥，成立关东公署，对流通于旅大地区的苏军发行的通行货币进行登记、兑换、加贴印花、加盖钢印，以防有人将曾流通在东北其他地区的苏军货币带进大连，破坏旅大地区的金融经济。

1947年6月3日，国民党视察团在董彦平的带领下，携带大量苏军货币来到大连。我按照5月29日地委会议“拖延、孤立、留难、限制、监视”的对策，牵头负责领导这场斗争。关东公署指示各单位，没有公署介绍信不予接待，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仅参观了几个单位，所到之处，无不遭到冷遇、拒绝及机智的答问。他们到金县视察，因无关东公署的介绍信，被金县公安局南站派出所阻在南站，拒绝参观。他们到工厂问工人，“现在造炮弹吗？”工人们说“我们工人不生产炮弹。”“有没有从山东过来的八路？”“没听说过八路”。他们还到处觅妓院、购鸦片，结果一无所获。他们带来的货币没有贴花钢印，已成废纸，弄得他们不仅不能给潜伏特务提供经费，连他们自己也手无分文，窘态百出。

为了支援解放战争，1947年7月1日我们组建了一个大型军工联合企业——“建新公司”。在三年里，生产炮弹50余万发，引信80余万枚，弹体中碳钢300万吨，无烟火药450吨，还生产了1430门迫击炮及其他军工产品，有力地支援了前线，被誉为中国保尔的吴运铎同志就是这条战线上的英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亲笔写信给我，对旅大地委和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粟裕副司令员说：“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

开创新局面

韩老讲：1946年，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大批大中型企业处于停工停产状态，这不仅关系到大连20万工人及家属的生活问题，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地方政权的巩固。经过协商，由关东公署代表中方和苏方合资经营了四个大型企业：中苏合营远东电业公司、中苏合营石油公司、中苏合营盐业公司、中苏合营大连造船厂。股份为：中方51%，苏方49%。中方任董事长，苏方任总经理，初期经理、厂长都由苏方派，中方任副职。后期，我方副职学会了经营管理，我们的干部越来越多地担任了厂长、经理。1949年——1950年，全国解放，苏联政府决定将中苏合营企业和苏联代管企业无偿归还我国。周

总理指定他担任中方首席代表，接管了这批企业。

除去和苏联的“合资企业”外，韩光领导的大连党委、政府也搞了一批自己的企业。“关东实业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它接收和管理了六七十个厂矿，大厂如大连纺织厂 10 万多纱锭，广和机械厂以最早试制生产苏式机床闻名，还有窑业、搪瓷、

造船、胶鞋、暖水瓶、针织印染等企业。“实业公司”开始是用“实物工资制”。生产逐步发展起来后，已不利于鼓励技术进步，于是他们率先实行“七级工资制”，在工资改革上更进一步。全国总工会知道后，表扬了关东实业公司，并且立即将他们主持搞“七级工资制”的王榕同志调到全总，研究改进整个工资制度。通过这些措施，大连的工业投资，1949 年比 1948 年增加 5.32 倍，1949 年工业总产值增加 65.46%。全区消灭了失业现象，物价平均降低了 40%，其中煤炭降低了 70-80%，食品降低了 40%，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男同志西装革履，女同志衣裙鲜亮，市面繁荣，人心稳定。1949 年秋，大连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工业展览会。这是共产党接管工业大城市后的第一个工业展览，在当时影响很大，意义深远，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

大连党委先后创建了旅大建国学院、大连工业学校、关东电器工程学校、关东医学院和关东俄语专门学校。1948 年，把几所学校合并，建立了我党直接创办的第一所新型理工科大学——大连大学（后来改变成大连工学院、大连医学院、大连俄语专科学校），为新中国培养了许多人才。

恕己之心恕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韩老和其他老干部一样受到了冲击。当时韩老是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主



1950 年韩光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

任是聂荣臻元帅），是国家科技战线的重要领导人，正在领导成昆铁路的建设。

1966 年 7 月 30 日，江青亲自到场召开大会，批判“国家科委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会后，江青在科委选中的代理人找到韩光说，只要能与她合作，她和造反派绝不打倒他。韩光拒绝后，遭到了无休止的批斗、陪斗、游街，受到了残酷的人身迫害，被下放工厂劳动改造。韩老回忆说：

起初是送我到科技出版社印刷厂，到厂后把我分配到零件车间。这个车间的主任叫罗学儒，两个副主任，一位老师傅姓陈，一位女青年叫任小华。我住的屋子原来是个大庙的门洞，小罗和小华带了几个工人帮我打扫干净，还拿来牛皮纸将顶棚和墙壁都糊了一遍，几乎像个新房了。军代表指责他们没有与“反革命走资派”划清界限。小罗因此被调到分厂，预备党员也被拖了 4 年才转正。小华也受到点名批评，可她不在乎，还给我买苹果。一位老厨师，总是留在厨房，星期天厂里工人都休息，食堂几乎无人吃饭。但这位老厨师却从不休息，几乎是专门为我做饭做菜。一位党支部书记，是个 40 多岁的女同志，她也是几乎每星期天都来厂里，有一次她来看我，问：“外面有卖油炸黄花鱼的，你想吃吗？”我说：“想吃也不能去买啊。”她说：“我去给你买。”我说：“那怎么行，他们会批判你的。”她说：“我才不怕他们的批判呢，我们工人没有一个怕他们。”

她果然给我买了油炸黄花鱼,说什么也不要我的钱。

过了不久,我被送到科委所属的计量研究院第二精密仪器厂劳动。有一位女工,年龄较大,是搞技术检验的,日常喜欢自己烧菜吃,上海口味,我们同住在一栋楼里。每逢星期日,她必做两个可口的小菜吃。每做一次,都要送给我一小盘,送过蛋角烧油菜、雪里蕻烧豆腐,更常送糯米圆子羹,还送过烧虾仁、烧青蛙腿等。所有的工人都叫她“妮佳”。我也跟着大家叫她“妮佳”。但我这样一叫,大家却都笑起来。他们说,“别人叫得,只有您叫不得。”我说:“为什么?”妮佳说:“‘妮佳’是上海话,‘妮’是‘二’,‘佳’是姐,上海人叫二姐,发的音是‘妮佳’。您叫我‘二姐’我怎么承受得起?”我说:“没关系,我是当作你名字来叫的。”以后我一直这样叫她,以至这位常常烧上海菜给我吃的女工的真正姓名,我一直也不晓得。

我们看到了韩老在讲他始终不知道“妮佳”真实姓名的遗憾,看到了他讲那些普普通通的工人,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对他的照顾时的动情,但是,他没有再提那些迫害他的跳梁小丑。我们还是忍不住追问了一句:“您不恨她吗?”出乎意料的,韩老说:“她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最后她自己身败名裂了,干嘛要恨她?”

做官从做人始

1982年中央召开十二大,选出了新一届的中央纪委,陈云为第一书记,黄克诚为第二书记,王鹤寿为常务书记,韩光为专职书记。不久,黄克诚同志逝世,王鹤寿任第二书记,韩光任常务书记。

这一届中央纪委主要是抓党风、严党纪,强调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此外,处理经济领域里的严重犯罪问题仍然是中央纪委的一项重要任务。当我们想听如“福建晋江地区假药案”等大要案的查处情况时,韩老却给我们讲了一个“吴隐之畅饮贪泉水”的故事:

东晋简文帝时,广州石门盛产象牙、珍珠和名贵药材,历任刺史贪污受贿极为严重,民不聊

生,怨声载道。可是官吏们说,是这里的水不好,喝了石门“贪泉”水,才使他们产生贪念。百姓广为流传,信以为真。简文帝调吴隐之任广州刺史。他听到这个传说后,立刻命人汲取泉水,当众畅饮几杯,指出世上哪有致人贪念的水,都是骗人的鬼话。以后吴隐之坚持饮用此泉水,居官一尘不染,清正廉洁,过着清贫生活。韩老说,这个故事给人的启发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客观环境与主观因素的关系,也就是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对此有三种态度:有人说,久在井边转没有不湿鞋;有人说,久在井边转可以不湿鞋;还有人说,久在井边转就是不湿鞋。吴隐之的实践表明,久在井边转究竟湿不湿鞋,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客观环境,而是主观因素,只要严格自律,就能保持廉洁的本色。

韩老说,讲这个故事是希望大家从中受到启发,重视学习。我们作为党纪法规的维护者、执行者,更要时时把教育和学习放在第一位。

韩老的话,使我们感受到了一位革命老人的殷殷期望之心。颜渊之赞孔子“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韩老之“教人”深谙此道:“万事皆由人为,做官从做人始,做事从做人始。教育重于惩罚,育人是事业之本。”

后记

94年的人生之路,77年的漫漫征途,韩老屈指指数来举重若轻。

他的话让我们陷入深深的思索。

韩老是“勇者”,以杀身成仁的决心投入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勇不仅表现在他早年从事地下工作、从事抗日武装斗争,更表现在他不计得失和名利,不断做出开创性的工作。

韩老是“智者”,以其睿智审时度势,不断作出适时的、不脱离实际的决策。智不仅表现在不断的学习提高,更表现在不间断的革命实践,只有有了实践能力的智,智才能活起来。

韩老是“忠者”,把自己奉献给了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民族富强。忠不仅表现在战争年代的坚定不移,更表现在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如一地把一生交给党安排。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我所知道的江青

● 于光远

我怎样认识了江青这个人

1951年中到1953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人事安排和日常工作情况的确非常特别。陆定一的部长的职务没有变动,人也没有离开中宣部,就在中宣部工作,并且让他参加中宣部领导层每周举行一次的“部长办公会议”。可是实际上,却是由胡乔木以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身分,领导着中宣部的工作。那时中宣部有几个副部长——除胡乔木之外,还有徐特立和陈伯达。不过徐一次没有到过会,陈在中宣部基本上也是挂名的,只是偶然到过一二次会。在开中宣部领导层的办公会议时,胡乔木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的座位上,听取汇报,主持讨论,分配任务。开会时陆定一每次必到,坐在同参加会议的处长们同样的座位上,脸无笑容。胡乔木对陆定一同对处长们一样,分配工作任务。陆定一言不发,接受分配给他的任务。这样的情况,时间不算太久,也不算太短,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年多一点。造成中宣部这种情况的人我想当然是毛泽东同志,胡乔木是做不了这个主的。

我同江青相识,不算1942年与她去陕北绥德同行的那一天半,就是在1951年。江青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正处长,我同她一起参加过若干次这样的部长办公会议。

江青担任电影处的正处长这件事,我的回忆是非常准确的。叶永烈在他的书里写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只是中宣部的副处长,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中宣部在1951年是有若干个正处长的。比如文艺处正处长是丁玲,宣传处正处长是陈克寒。电影本来是没有必要单独成立处的,可

是主持当时中宣部工作的胡乔木建议江青做中宣部电影处的正处长。此事胡乔木书面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在1951年11月16日答复:“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同时也提出“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值得再考虑一下。”胡乔木还是决定让江青担任电影处的正处长。不过,中宣部电影处特别小,没有副处长,只有两个干事,一个是钟惦斐,另一个是名叫安琳的女同志。还有一个做办公室工作的、不是党员的沈美理。江青也不常来,她布置给中宣部电影处工作人员做的日常工作是看各式各样的电影,但是布置以后她就不再管了。江青自己不在电影处看电影,她在家里看。

这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热衷于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事情。电影处的工作主要的也就是抓这件事情。



江青在上海时的漫画像及其签名



1931年,江青(前左)在青岛时与友人合影

中宣部电影处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不很久江青说自己身体不好不再来了,电影处也就不再存在了。

在毛泽东要江青去山东进行“《武训传》问题的调查”时,江青用了“李进”这个名字。最初我以为这是随便起的化名,后来1961年5月毛泽东写了那首《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七绝中,又出现“李进”这个名字,我就不能再这样想了。可是我一直不了解“李进”同江青是什么关系。

江青最早的名字叫“李进孩”后改为“李云鹤”

最近我看了2005年第一期《中国老年》上发表的题目为《徐明清:我与江青74年的恩怨纠葛》的文章。徐明清现在还活着,年龄已经94岁了,是农业部的离休干部。她口述了她的历史

情况,由任秋萍执笔写成文章。文中说:“74年前,江青是她(指徐明清)青春岁月的好友。”徐明清在1930年4月因为参加当时的革命运动,在南京成了被追捕的对象,于是徐明清从南京到了上海,去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晨更工学团”工作。这时候,江青也在上海,由田汉的弟弟田沅介绍她们两个人相识,并希望徐明清能将她留在“晨更工学团”工作。因为江青是孤身一人,徐明清介绍她与一个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同住一个小阁楼上,就此徐明清对江青有了很多的了解。江青自己给徐明清讲了她的身世。江青说,“她的父亲李德文在山东诸城城关开了个木匠铺,生意不错。娶了两房妻子,自己是庶出。她原来的名字叫‘李进孩’。上小学时校董薛焕觉得这个名字不雅,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就替她取了‘云鹤’这个名字。”江青把这段身世说给徐明清和李素贞听。听了之后,徐、李二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在读了《中国老年》这篇文章之后,江青和“李进”的关系就明白了。

江青之所以在1951年进行《武训传》的调查时使用“李进”这个名字和1961年毛泽东写那首关于《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诗又用了“李进”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知道江青有过一段名叫“李进孩”的历史。

在与俞启威一起生活后,又与唐纳结婚

对江青的事情,现在我们还只写到从“李进孩”改名为李云鹤。讲到这里江青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呢。

徐明清继续口述:

“相处日久,徐明清渐渐发现表面平静快乐的李云鹤在独自一人时常常唉声叹气,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北方,手里握着一封信反复读着。后来徐明清在清扫地板时发现了掉在地上的这封信:开头写着‘进子’,落款则写着‘小俞’。文中写着‘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一类的话。把信交还李云鹤时才从她口中得知,这是她的恋人俞启威写给她的‘情书’。

“1934年1月28日,‘晨更工学团’参与了

上海各界共同举行的纪念‘一·二八’两周年示威游行。俞启威和李云鹤相继暴露被盯梢,两人意识到处境危险便决定迅速离开上海到了北平。白色恐怖下很多联络被中断,李云鹤和徐明清失去联系后音信皆无,徐明清担心了很久。

“李云鹤回到上海后曾到‘晨更工学团’寻找徐明清,但徐明清也同样因为避难离开了那里。1934年10月26日李云鹤在与同乡见面时因叛徒出卖突然被捕。

“据说李云鹤被抓进看守所后,叛徒并没有指证她。因为她说自己是教员,便由特务押着一起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遇到该部干事钟绍琴,由其证明确实是小沙渡路女工实习学校教师,这才因‘证据不足’获释。

“一天徐明清收到小俞的一封信,说李云鹤出狱后住在自己家里,心情非常压抑,郁郁寡欢,希望徐明清去看看她。徐明清马上赶到俞家,见到李云鹤时大吃一惊——李云鹤像换了个人:脸色发青,说话声音忽高忽低、忽紧忽慢,一直发着低烧,精神明显不正常。而俞家已经下了逐客令,明确表示不欢迎李云鹤,小俞左右为难。看来前段时间的被捕和后来在俞家的遭遇让李云鹤受了很大刺激。为同志和朋友,徐明清很难过,当即决定带李云鹤回自己老家休养。家乡人对李云鹤很好,都很同情这个北方来的女孩子。徐明清的父亲是郎中,给李云鹤把脉后说她患上了肺病,让她服了些中草药。后来徐明清的一个在北平军医学院学西医的堂侄回家乡来结婚,又给李云鹤开了些西药,让徐明清去城里买回来给她服用。就这样,中西医结合,加上徐明清每天带李云鹤到外面散步,李云鹤的身心得到了良好恢复,脸色开始红润起来,性格开朗了很多,说话也不再咕咕啾啾了。年底俞启威来信说他已经在北京大学开始执教,希望李云鹤回北平去过。徐明清从家里要了路费,把李云鹤送上了北去的汽车。”

李云鹤当时哭着离开了徐明清和对她悉心关照的徐家。

在这里我想插进来讲一段俞启威,他后来改名黄敬。我和黄敬没有直接接触过。但是对他的事情知道的不少。知道他在1935年冬北平掀起“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担任这一运动党的

领导工作。1936年党中央派刘少奇到北平担任北方局书记,黄敬是北平市委书记。1937年3月我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知道黄敬是以彭真为首的六人北方代表团成员之一,并去延安参加1937年5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这个代表团的成员,除彭真外其他五人是黄敬、李昌、杨学诚、林一山,另一位是工人代表。建国后我仍旧没有同黄敬见过面。但是我现在正住着的寓所,恰好是黄敬和他的夫人范瑾以及他的南国社的姐姐住过的地方。后来黄敬做了“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我在聂荣臻领导下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工作。两个委员会合并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不过这时候黄敬因病不能工作,我与他始终无缘见面。

江青在到延安之前,是上海滩上的二流电影演员

1936年8月徐明清知道李云鹤已经改名蓝苹,成了上海电影界明星,并和俞启威分手与电影圈的唐纳结了婚。

最近我看到郁风所著的、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的文集《巴黎都暗淡了》中所收入的《蓝苹与江青》。在这篇文章中郁风说,从1935年到1937年蓝苹离开上海去延安以前,她一直是青年妇女俱乐部的会员。那是陈波儿、吴佩兰和我,在一位中共地下老党员领导下,自己筹募经费,打通关系搞起来的党的外围组织,向社会公开招收会员,很快会员多至数百人,分组活动。有大中学女学生、职业妇女、家庭妇女、工厂女工、也有演员和作家。蓝苹是从1935年秋较早参加的,而且很积极,每周都来一两次帮忙工作。来时梳着两条小短辫,蓝布旗袍,不搽口红。她那时刚到电通影片公司当演员,是陈波儿介绍来的,很快把我们当作好友,表现热情。那时陈波儿已是主演了电影《桃李劫》的明星,比蓝苹名气大得多。那时电通正在拍《自由神》,王莹主演,蓝苹在剧中只演一个不重要的配角女兵。郁风年龄最小,只有19岁,可能也是最单纯的一个。蓝苹只比郁风大两岁,在青年妇女俱乐部几个人比较起来,她似乎更愿和郁风接近。每次散了会,她常和郁风同路走

在霞飞路上，一面走一面有说不完的话。蓝苹把郁风当作政治上比她幼稚的小伙伴，有一次神秘兮兮地告诉郁风如何对付特务跟踪之类。后来到快离开上海以前，郁风才从领导她的人那里知道：蓝苹不过和她一样在一所女青年会名义办的女工夜校教课。

1936年初，业余剧人协会要排宋之的写的新剧本《武则天》，导演等选中郁风饰演武则天B角。郁风谢绝不干。但是导演等不放弃，一再说服动员。蓝苹也极力劝郁风答应，蓝苹早已是业余剧人协会的成员，她对这出戏就很有兴趣，是她帮助郁风背台词，两人琢磨人物性格。

“文革”中的江青极力推崇女皇武则天，便是从最早为武则天翻案的这一话剧种下了根。

70年代的江青曾对访问她的维克多说：“我21岁就一举成名。”指的是1935年她21岁时参加业余剧人协会主演易卜生的名剧《娜拉》。郁风写道，其实蓝苹是在一年以后在《大雷雨》中饰演卡特琳娜这个角色以后才比较出名，才有联华公司的名导演蔡楚生找她拍电影《王老五》，饰演王老五（赵丹）的妻子缝穷姑娘。在此之前她虽在电通公司拍过几部片，全是只有少数镜头的配角，其中之一是袁牧之编导的喜剧短片集《都市风光》。她的角色只是一个男演员的女友，只出现几秒钟，连姓名都没有。那个男演员就是唐纳。

郁风还讲了蓝苹一件事：1936年三八妇女节上海妇女团体演出只用一个演员和一两个配角的独幕戏《婴儿杀戮》。蓝苹一口答应扮演杀死自己婴儿的那个失业女工。

郁风的文章写得很细致、很具体，也很真实。她所知道的事情徐明清不一定知道。我觉得把这两篇文章对照来看，江青的一生可以看的更清楚。

大约一个多月以后，报上登出三对影剧明星去杭州六合塔下举行婚礼。即赵丹与叶露西、顾而已与杜小鹃、唐纳与蓝苹。同去的有证婚人沈钧儒、介绍人郑君里和李清。一时大小报、画报新闻照片满天飞。更轰动上海的是一周以后，据说是应影剧界友人的要求，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茶点婚宴。一流明星如胡蝶、舒绣文、金山、王莹、陈波儿、郑君里……等全到场。余兴有女

高音歌唱家郎敏秀的独唱，还有孙师毅为此作词吕驥谱曲的合唱《六和婚礼进行曲》。词中有：“六和塔下影成双。决胜在情场，莫忘胡虏到长江……共起赴沙场……”等等，不忘宣传抗日。

谁知不到一个月就发生婚变，蓝苹和唐纳闹翻，她跑回济南，唐纳追到济南，在旅馆自杀被救，弄得满城风雨。尤其是小报，多数是对蓝苹“水性杨花”的嘲讽和责难。

业余剧人协会演出《武则天》后，就排《大雷雨》。章泯导演，蓝苹全心投入去排戏，饰演女主角卡特琳娜。

郁风还说，在业余剧人协会我见过章泯多次，中等身材、一套旧西装，显得苍老，不大说话，很深沉。和那个高高的、风度翩翩、对人和气的唐纳完全不同。章泯的名气也没有蔡楚生、史东山等叫得响，但在话剧界行家中公认他对戏剧的修养和导演的才能一流。

《大雷雨》的公演已是1937年初。渐渐圈内人传出蓝苹和章泯秘密同居的消息。唐纳又发生第二次第三次自杀。章泯是众所周知早已结婚并有个八九岁的儿子，蓝苹当然也知道。于是各种流言蜚语又成为报屁股的好材料。甚至恶俗刻毒的论者说：有的女演员不惜以上床的代价勾引导演以换取上台当主角的机会。当然这样的例子不能说没有，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好莱坞。但是据较知情人的了解，章泯从最初主动找蓝苹饰演娜拉时就已赏识她，两年以后又排《大雷雨》，两次合作中的默契产生爱情也是很自然的事。当然，破坏家庭造成悲剧是两人都有责任的。终于，章泯紧接着排完赵丹和俞佩珊演的《罗米欧与朱丽叶》之后，没等上演，就悄悄离开上海。不久蓝苹也去了延安。后来章泯到了重庆又和妻子复婚。而“文革”中所有与当年蓝苹有关的朋友全部都遭殃，连帮她工作很久的女佣秦桂珍都不能幸免，惟独章泯竟然无事。

以上大概就是蓝苹在上海时期的全部生活故事。她当时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作为一个明星的地位，不如说更多的是由于这些闹得不可开交的绯闻。自然，绯闻也不是她为出名而有意制造的，她确实想用功演好戏，甚至对电影兴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显身手，虽

然她是属于那种底子不厚、却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说她绝对想不到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作大舞台，叱咤风云，演出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

关于蓝苹（江青）与唐纳间的绯闻，连从来一点儿不关心这类事情的我，当年耳朵里不知道从哪里也刮进过几句。最近看到郁风所写《蓝苹与江青》之后，我就明白了何以这样的新闻会传到我的耳朵里来一点。

1937 年江青到了延安

徐明清口授的文章里写，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之后第二年的 1 月底，中共西安市委成立，徐明清担任市委委员。7 月下旬的一天，蓝苹突然出现在徐明清面前。她说自己在上海无事可做，又已经与唐纳分手。徐明清把蓝苹的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几天后蓝苹被批准奔赴延安。从此改名江青。

也就是 1937 年某一日，延安的报纸《红色中华》登载了有一批文化界人士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的消息，其中就有江青的名字。在这之后江青的名字就没有再改动。

徐明清明白蓝苹改名江青的原因，就是“青出于蓝”的意思。

在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年，也就是 1938 年 11 月，她就同毛泽东生活在一起了。

关于江青到延安后经过怎样的过程同毛泽东结婚，我是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才知道了一些。我有一个朋友何洛，他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任，1946 年他还是我在北平《解放日报》工作时的同事，他给我讲了关于江青的一些故事。他告诉我，他、徐明清、江青、还有王实味四个人曾在中央党校同一个党小组里学习和过党的组织生活。后来这个小组里的四个人就分开了，王实味调去了鲁艺，江

青调去了马列研究院，徐明清、何洛还留在党校。这时候王实味写了封信给何洛，信上说他能完全肯定江青对他“有意思”，可是双方不好开口，要何洛“玉成其事”。何洛告诉了徐明清。徐明清对何洛说，你不要管这个事情了，现在江青已经有“主”了。何洛问这“主”是谁？徐明清说江青要我替她保密，不让我说出来。徐明清嘴上虽然说要保密，可是忍不住把毛泽东的名字说出来了。

何洛讲到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前有这样一些故事：江青在延安演过一场俄国的活报剧，只有三个演员，一个是女郎，一个是革命者，一个是沙皇的警察。沙皇的警察追捕革命者，江青扮演的女郎就把革命者藏起来了。剧情就那么简单。

后来，江青和他的同乡康生联系上了。江青就经常跑到康生那里，康生拉胡琴，江青唱京戏。后来江青在延安就唱起京戏来了。江青唱京戏，毛泽东就去看和听。看来看去，毛泽东就把江青看上了。我猜想，江青是个电影明星，本来不会唱京戏，恐怕是临时学的，也许是康生为了玉成她和毛泽东给她出的主意。

我是 1939 年 7 月到延安的，那时我才听说了毛泽东和他的妻子贺子珍分开而和江青结合这件事。当时延安有许多人对毛泽东和江青的



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杨家岭窑洞前

结合很不赞成。后来江青反党集团给党造成很大的危害之后，谢觉哉后悔当时没有强迫把贺子珍留下来（这是2004年我在一本书中看到的）。毛泽东和江青在一片反对声音之中，冷清清地结了婚。在结婚的时候摆了两桌酒菜，可是新郎毛泽东没有出面，只有新娘江青向到的人表示谢意。李昌是出席那个酒席的一个，他曾和我谈起这件事情。

从1937年江青和毛泽东结合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有29年。江青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回过头来想，从工作上来说最重要的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那时候她是中宣部电影处的处长。这个时期她的工作是很活跃的，而且和毛泽东配合得很密切。

从她在党内的地位来说，她在延安时候就开始在党内有一点地位。1940年1月21日江青的名字就出现在《新中华报》上，组织上就安排她做边区文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她排在王明的老婆孟庆树的后面。这是她到延安的第三年。

在她到延安的第四年1941年末，毛泽东要她参加西北局组织的陕北的绥德米脂调查团，在调查研究中学习。我和江青第一次见面就是在那一次。在从延安到绥德的路上我们一起走了一天半。我曾同江青并辔而行，在清涧一起参加过一次晚会，但是我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

不过江青刚到绥德后，毛泽东的一个电报要她马上回延安，绥德专署的同志就派了人，陪江青骑马回去了。

她和毛泽东生了个女孩子李讷，算起来应该是在延安时生的。

补讲一节电影《武训传》批判

由于不想被从李进孩到李云鹤，再到蓝苹，最后到江青这些名字演变插乱，本来应写的电影《武训传》批判的事情不得不在这里补记一节。

江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工作很活跃，和毛泽东同志配合得很好。当时情况是：

1950年底到1951年初电影《武训传》放映之后，报刊发表不少文章，最初几个月大都是肯定赞扬，突出的有：“武训是劳动人民文化翻身

的一面旗帜”，是“勤劳、勇敢、智慧崇高的典型”等。1951春批评的文章如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和杨耳（许立群）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对吗？》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毛泽东大段改写的题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中开列了43篇赞扬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作为反面教员。1951年6月我们《学习》杂志编辑部请许立群再写一篇《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这篇长文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加写了好几段有分量的文字。指出武训是在搞骗局，武训的“义学”实际上是“不义之学”。武训是一个五毒俱全的恶丐，他用放高利贷的办法搜括穷人，依仗官府势力强迫捐钱。

看来后来江青到武训的家乡调查之前，毛泽东对武训之为人早已有定评。调查云云只不过为取得更多的事实根据而已。

前面讲过江青在中宣部电影处担任正处长抓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去山东武训家乡山东堂邑（现在不再是县）、临清（现在是地级市聊城下的一个县级市）、馆陶（现在属于河北省的邯郸市）做调查这件事，毛泽东重视程度可以说异乎寻常。江青到北京站前往山东的那一天，毛泽东亲自把江青送到火车站，只不过毛泽东没有下汽车进站，他在车上与江青告别。

江青以李进的名字参加这个调查，同行的有一个袁水拍。那时他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负责人，调查团的文字工作是袁水拍这个笔杆子做的。调查报告很长，内容分“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五节。这篇长报告的题目《武训历史调查记》是毛泽东审定时取的。它在《人民日报》连载之前是经过毛泽东改写或加写的。

毛泽东对这次调查任务完成的状况是相当满意的。大概江青要对袁水拍表示感谢，就在自己家里请袁水拍一家人吃饭。在餐桌上有毛泽东、江青、江青的姐姐，江青的女儿李讷和袁水拍一家。吃饭的时候还照了相。袁水拍把这照片挂在家里墙上。文革中被抄家的时候，袁水拍的许多东西被拿走了，照片也拿走了。后来归还抄

走的東西的時候,別的東西都還了,唯獨照片沒有退還。

袁水拍後來從人民日報社調到中宣部,文革時他和我同住在中宣部設在車公莊北京市委黨校的同一座樓的牛棚裏頭(而且是同一個房間)。這個情況是他直接告訴我的。

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

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一下子提得很高。1965年11月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對《海瑞罷官》的作者吳晗進行點名批判。這篇文章是由江青、張春橋秘密策劃、姚文元執筆起草的。這可以視作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江青就在文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5月28日黨中央成立以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張春橋等為副組長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並在5月30日中央通知陳伯達病假或離京期間,由第一副組長江青代理組長職務。5月30日中央專門發這樣的一個通知是很特別的。它可以說明文革的大權事實上已經掌握在林彪和江青手中。

這時候的江青,不只是權大、勢大,她還有一個特別的專用的稱號“旗手”。在“文化大革命”的這個階段,性質還是“奪權”的階段,林彪同江青是密切合作的。1966年林彪委託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是一件表明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公開結合的事情。在工作方法上也各有自己的創造。林彪和江青都講究儀式。林彪發明手持小紅書,口喊“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要求群眾作出“敬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的呼應。江青要求的儀式是她呼喚“同志們好”,要求群眾呼應“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學習!”

江青又網羅一些人在釣

魚台創作凡出樣板戲樹立自己的豐碑,這些都得到了毛澤東事實上的許可。

江青參與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江青在文革小組的權力,大到可以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文革小組名義聯名頒發文件的程度。真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不可一世。人們理所當然地不敢說出對她任何不滿。文革中許許多多老干部挨批受鬥,包括劉少奇和1924年就入黨的鄧小平都被打倒了。這當然要由毛澤東負責,但是江青那時已經是很重要的角色。

在這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是挨批受鬥的人中的一員。在挨批受鬥中有一段時間是住在自己家裡出門挨鬥。兩年之後的1968年,我被集中住進了“牛棚”。那時“牛棚”成了時尚。中宣部的“牛棚”設在車公莊北京市委黨校大院裏。有許多機關都在市委黨校設“牛棚”。我們中宣部占了一座樓。中宣部的黑幫占了好幾間房。我、袁水拍、包之靜、吳寄寒、林潤清,還有一個副處長,我記不清楚是誰了。六個人住在一起。因為我們是“牛”,不讓我們睡床,躺在地板上。我們六個人,白天都要在茶几旁邊寫“交代”。除非接受外調,不管有沒有話可說,一定要這樣趴著寫“交代”。晚上被關在“牛棚”沒人管,大家就胡說八道起來了。我們說的



“文革”的第一個打倒目標是劉少奇,但在天安門城樓上,江青見到劉少奇仍滿臉堆笑握手

话，尤其是包之静讲他同江青过去相识时的事情也就没遮拦的讲起来了。包之静说，他和江青在上海的亭子间睡过觉。可是到北京后她就不理他了。我们就“斗争”包之静，说你是不是还妄想江青保你？幸亏她把你忘了，否则也许就没有命了。包之静还说，这件事我告诉过上海的汪道涵。有一次我去上海问汪道涵，汪说他的确早就听包之静告诉过他这件事。如果那时房间里窃听器，我们全是“现行反革命”。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建立和江青

1971年林彪坠机身亡，许多老干部陆续解放。1974年，邓小平恢复工作。1975年他建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明显地标志邓小平的复出。这时候邓小平找了一些已经得到解放的笔杆子，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作为自己的助手。这时候邓小平虽然受命主持中央的工作，但是江青一伙还把持宣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因此邓小平成立的自己的助手机构没有用党中央机构的名义，而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名义。

邓小平的复出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立，就是这个阶段的历史产物。这个研究室是由邓小平物色的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七个负责人，又由这些人再找来一批中级干部和一般干部组成的。这个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虽然有好几个方面，但斗争的矛头是对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

这时候，毛泽东对江青做的有些事情不那么满意，有时也敲打敲打。比方江青对电影《创业》（这部电影是表扬大庆油田和石油部）做了错误的批评，毛泽东就做了批示，不赞成江青所做的批评，这就是一次“敲打”。有一次我在

天津告诉了原石油部副部长孙敬文，孙敬文转告了石油部长康世恩，使康世恩少受江青对他的一次讹诈。

但是“四人帮”对政研室的攻击，如“邓记谣言公司”、政研室炮制“三株大毒草”之类中伤，在反对政研室和邓小平中还是起了作用的。

由于江青一伙使坏，毛泽东支持了江青，1976年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除了保留党籍之外，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工作。这是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对邓小平斗争获得的一次胜利。

“多行不义必自毙”，1976年打倒邓小平是江青最后一次胜利。在这之后江青走向末日。1976年的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就是江青的末日。
(责任编辑 萧 徐)

《随笔》2006年第一期目录

- | | |
|-----|-------------------------|
| 吴小龙 | 从康熙与西学谈起 |
| 张 鸣 | 来了假冒的孙天生 |
| 张 柠 | 表态运动和自由的累赘 |
| 林 达 | 并不轻松的转变 |
| | ——美国宪法第十二修正案二百周年启示 |
| 半 夏 | 无可替代的失败者 |
| 李建纲 | 瑞典的官儿怎么当 |
| 邵燕祥 | 巴金是属于民间的 |
| | ——在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
| 黄宗江 | 说真话者万岁——祭巴金 |
| 王晴佳 |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吴晗一生的荣辱 |
| 吴孝楨 | 长沟流月去无声——追忆当年“文坛一勇士”黎烈文 |
| 张昌华 | 恩怨是非知多少——顾颉刚人际关系纵横 |
| 傅国涌 | 杨刚自杀之谜 |
| 单世联 | 主义与问题之间——读姚新勇《观察、批判与理性》 |
| 李 普 | 《李普自选集》自序 |
| 朱 正 | 重读《娜拉走后怎样》 |
| 苏福忠 | 恒产者的文化沉淀 |
| 王春瑜 | 朱棣制造的政治泡沫 |
| 施 亮 | 晚明的士风 |
| 周英杰 | 从“看客”到“共犯” |
| | ——纪念火烧圆明园事件 145 周年 |
| 秋 风 | 市场的背景 |
| 吴 江 | 说政治 |
| 冯秋子 | 搂地毛的风险和冒风险的农民 |
| 沈 坚 | 官员“编书”风当止 |

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随笔》杂志

邮编：510075 电话：(020)37606288-510

邮发代号：46-90 欢迎邮购，免收邮费，每册定价 6 元

“罗思鼎”和“朝霞”事件

● 史义军

罗思鼎的构成

1973年9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亦即罗思鼎)直接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创刊,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论尊儒反法》一文。这标志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为“四人帮”大造舆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关于上海市委写作组和罗思鼎笔名的由来,当年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回忆说,罗思鼎写作组形成时间是在中苏论战期间,是复旦大学的七名年轻教师相约共用的笔名,取义于1963年发起的“学雷锋运动”中间提倡的“螺丝钉”精神,并非出于市委的事先安排,它的前身是“丁学雷”写作小组。这两个写作小组的工作地点因为都设在华东局“内刊”所在地丁香花园,所以又叫“丁香花园写作班”。丁香花园是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的私家欧式住宅,在长宁区华山路。“丁学雷”也和学雷锋有关,有“丁香花园中学雷锋”之意。后迁至徐汇区康平路89号。

1968年,文革运动深入之后,写作组原来批判刘少奇的任务已完成,早期的批判任务就告结束,人员分散到各工宣队里面去了。

1968年底,姚文元要徐景贤在上海找几个人组织一个小组,专门为《红旗》杂志写文章和组织稿件,姚文元说:可以让朱永嘉负责。1969年夏,张春桥到上海,说是要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样本。张春桥让朱永嘉、王知常和肖木每天到他下榻的兴国路招待所去陪读,边读边改。

1970年,姚文元要徐景贤正式筹建《红旗》组稿小组,指定由徐景贤、朱永嘉、王知常和肖木四人组成。徐景贤立即将朱永嘉、王知常和肖木

(后任王洪文秘书)从工宣队找回,成立以朱永嘉为首的小组,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名义给《红旗》杂志写文章。这个小组由张春桥、姚文元直接领导。这个小组是《红旗》杂志在全国惟一的组稿小组。

这个小组主持过很多次座谈会,例如文科大学座谈会、理工科大学座谈会等,还整理过从工人中间培养技术人员的经验,后来被毛泽东批示推广,就是著名的“七二一”经验,以后各地不少工厂曾经兴办过“七二一工人大学”。这个《红旗》上海组稿小组,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组”的名义,写了不少关于“黑线专政论”的文章。

1971年7月,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上海,在康平路办公室召见徐景贤,说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正式重建上海市委写作组,由朱永嘉、王知常和肖木负责。张春桥强调说:“至少要培养一支二百人左右的我们自己的理论写作队伍。”

1971年7月,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正式成立,由在上海市委兼任第二书记的姚文元主管。写作组名义上属市委领导,实际上除了张春桥、姚文元,谁也无权过问。正如朱永嘉所说:“我们只听张姚的,其他人的话可听可不听。”

写作组重建时,正式成员只有四十余人。后来以借调使用、办学习班、培养理论骨干等方式建立外围组织层层向外扩展。到1976年,写作组本部成员及外围组织人员发展到三百人左右。

上海市委写作组分历史组、文学组、经济组、哲学组等,又下辖有若干外围小组(如“石一歌”和各种教材编写组);外围小组人员编制仍在原单位,经费由所在单位担负、筹措、拨付,分合自如,高度集中。在北京设有联络处。由于当时无宣传部的设置,写作组实际上兼有宣传部的管



徐景贤在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法庭上受审

理职能。

历史组以复旦大学教师为班底,别的小组成员另调有原宣传部、作家协会、华东师大、上海师院等单位的人。

哲学组的笔名为翟青,历史组的笔名为罗思鼎,文艺组的笔名为丁学雷、方泽生、任犊、石一歌,这些笔名是比较固定的,其他还有,宫效闻、石仑、康立、翟青、方海、齐永红、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谐音“放眼量”)、金风、方耘、常峰、景池、龚进等八十多个笔名。最重头的文章也使用上海市委写作组或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批判组的名义。

此时,写作组工作职能也扩大了,是一个编入政府系列、形似松散庞大而结构紧密的行政管理系统,利用“分层控制、多方插手”方法运作,直属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代管)。“文革”中张、姚两人给写作组的批示、书信、电话多至360次以上。例如1974年6月3日,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在朱永嘉的来信上“批示”,答复他提出要建立社会科学院的问题。张春桥的“批示”首先给他的班子打气,说“上海培养理论队伍是有成绩的”,然后说:“对社会科学院问题,我认为不忙建立。一搞这类机构,势必增加许多行政问题,忙于应付。”姚文元表示同意张的意见,并说:“我觉得写作组(或写作班子,这个名称不一定不好听,中央文革也叫小组),还是按照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需要,今后的战斗任务及事物本

身的发展规律来考虑组织形式较为实际。不在乎名称,而在乎实际。不要只看到顺利而不想到困难方面。”在信中提到“办临时学习班”时,姚文元批道:“这种形式较灵活,比集中到社会科学院好”。王洪文在次日批:完全同意张、姚的意见。

朱永嘉、王知常、肖木是该写作组的主要负责人。

除写作外,写作组还负责为张春桥、姚文元收集各种资料,从政治、经济、军事

到思想文化,无所不包;从上海到各地,从地方到中央,无所不有。他们仅密报张春桥、姚文元的资料就有一千多份。以至于其成员私下议论他们“所干的事,说出去是要杀头的”(代替了文革初期“游雪涛”的功能)。有人据此论定它除了写作班子外,还兼有“情报班子”职能。

写作组还以“调查”为名,如外贸调查、造船工业调查等等,为“四人帮”的活动提供了大量“炮弹”。不仅如此,写作组还通过编写《党史》、《一月革命大事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小辞典》等,为“四人帮”捏造功绩,树碑立传;通过“工人阶级状况调查”、“农村所有制过渡调查”、“阶级关系调查”等“三大调查”,为拼凑所谓“张春桥思想”提供根据。

充当高参,是上海写作组活动的又一个重要内容。那几年,写作组为张、姚的活动献计献策。如1975年底,张春桥写信给朱永嘉,要他们“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它的特点”,说什么“虽然不一定马上就能写文章,甚至不是为了写文章。”不久以后,朱永嘉就通过信函向张、姚提出,批“四个现代化”,以攻击“引进”作为突破口,并进而提出要张、姚抓《毛选》五卷的出版,抓“编写党史”,抓“中央起草班子”,以便把“号令权”控制到手。

上海市委写作组直接控制的刊物共有八种。最主要的是《学习与批判》,此外还有《朝霞》、《朝霞文艺丛刊》、《教育实践》(名义上是上海

师学报)、《自然辩证法杂志》以及文艺、哲学、自然科学三个《摘译》。

《学习与批判》挂着复旦大学学报的招牌,实际上,它是上海市委写作组一手包办的帮刊。罗思鼎的头头自称它就是“同人刊物”,“就是搞一家独鸣,不搞百家争鸣。”它的稿件,除少量投稿外,主要由上海写作组直接根据“四人帮”的指示,或主动配合“四人帮”的活动,自己拟题写作或请人写作。据粗略统计,这类文章近七百余篇之多。

《学习与批判》自创刊号起,发表的大量文章中,有不少是以谈论历史为名的文章,用借古讽今的手法,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

正因为《学习与批判》是“四人帮”得心应手的工具,所以“四人帮”将它广泛推销,甚至将其发往香港出售,扩大影响。“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些亲信洋洋得意,自吹《学习与批判》是“小《红旗》”,“《红旗》不便登的,我们这里好登”,“别的省市都要看这份杂志,摸政治气候”,“我们传达的精神有时比《红旗》快”……

从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上海写作组及其下属各组写文章156篇之多。仅1973年下半年至1974年,发表在《红旗》、《人民日报》上的所谓重点文章就有十二篇,几乎每月一篇。代表作是《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证的社会基础》、《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评 水浒 的投降主义》、《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企业管理的两条路线斗争》、《汇报提纲 出笼的前前后后》、《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

该写作组活动的历史最长,参与配合的运动最多;写作品体多样,有政论、史论、杂文、小说、教材等,产量最高;组织分工细致周密,作者队伍庞大,直接掌握的刊物最多,可以独立形成协同作战、轮番冲击能

力,声势上超过其他御用写作班子;形成“北有梁效、南有罗思鼎”的格局。1976年10月后,该写作组成员都受到审查,有些人长期受影响,著述出版不顺利,无法评上高级别教授职称;不愿再提及这一段“伤心史”。

《朝霞》事件

《朝霞》是上海市委主办的文艺刊物,由肖木和陈冀德负责。1973年肖木调到北京任王洪文的秘书,《朝霞》杂志就由陈冀德全面负责。1973年5月,《朝霞》丛刊第一辑出版,写作组召开大型座谈会以示庆祝,扩大影响。

1974年1月,《朝霞》月刊创刊。创刊号送到姚文元处,姚文元很欣赏,立即指示:“朝霞是一种高卷云,它吸收阳光中的各种颜色,只反射红色,所以是红的。”姚文元在会见外宾时,把《朝霞》杂志吹捧为全国文艺刊物的“样板”。

《朝霞》的编辑和作者队伍一律由写作组自己培养,上海原有的文艺编辑和作者队伍几乎全部排斥在外,其中包括50年代和60年代上海涌现出来的一批工人作者。这引起文学界大多数人的不满。但《朝霞》编辑部有恃无恐,依然我行我素。

《朝霞》月刊出到第三期,一场轩然大波骤



王秀珍在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法庭上受审

然而降。

1974年2月13日,上海市总工会召开区县(局)工会负责人会议,还邀请了犯过错误已经下台的老造反派头头,动员批林批孔。徐景贤在会上作报告,主题叫一月革命精神,还谈到“老造反正确对待自己”。第二天,这篇讲话的内容被《文汇报》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

总工会头头们看了这篇评论员文章很不以为然,把文章给了王秀珍。王秀珍看过文章,说,文章有问题,对一月革命的评价不对。一月革命最根本的经验是夺权,文章却没有讲。

于是,王秀珍要总工会整理一份材料批评徐景贤。材料整理出来后,王秀珍觉得还不够尖锐,又让他们修改补充。然后,王秀珍以“群众来信”的名义报送张春桥。张春桥看后在材料上写了批语,是批评徐景贤的。为此,徐景贤在市委常委会上作了检查,大家都批评他,说他好出风头。总工会的头头们觉得整了徐景贤很解气,也算报了写作组不重视工人作者的仇,于是他们继续找写作组的岔子,想更狠狠地整整他们。

这时,正逢《朝霞》月刊第三期出版。这期杂志的头条小说题为《红卫兵战旗》,讲红卫兵打破山头主义,搞大联合的故事,其中有个细节讲到一派红卫兵张罗成立半周年纪念活动。

总工会的头头们看了这期杂志后说,这篇小说有问题!里面重提半周年这件事。

有的人拍着桌子大骂,这是影射攻击我们总工会。

工总司成立半周年时,王洪文搞半周年纪念活动,被徐景贤报告张春桥。张春桥讽刺道:“难道连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吗?”王洪文为此与徐景贤大吵了一场。当时张春桥立足未稳,还需要工人造反派的支持,所以,他反而批评了徐景贤,这件事便不了了之。

总工会的头头们拿着《朝霞》杂志去找主持上海工作的马天水,说要批判《朝霞》。他们又打电话给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要廖向王洪文汇报这件事。这一切都在秘密地进行中。

《朝霞》编辑部还蒙在鼓里。他们正在忙着第四期杂志的定稿工作。

第四期的稿件中有一篇文艺短评,作者是工人文化宫文艺评论组头头,他在校阅文章清样之

后,加上了一段话,说上海近来有些作品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红卫兵运动和工人运动,为林彪路线翻案。

陈冀德审读清样时提出要删掉这段话,作者一反平时谦和的态度,坚持己见,寸步不让。陈冀德感觉奇怪。

这是写作组得到的第一个信号。

总工会那边则早已做好准备对付写作组的办法。他们从三期《朝霞》杂志上找出三篇“大毒草”。《红卫兵战旗》是“影射讽刺工人造反派”;《初试锋芒》是“污蔑工人民兵”;《闪光的军号》是为“林彪路线招魂”。当然,“半周年纪念活动”的事只能意会,不必言传。

首先发难的是总工会一个头头戴立清,在他掌管的后方基地工厂里召开了批判《朝霞》大会。紧接着,团市委,妇女联合会,民兵指挥部这些工人造反派掌权的群众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召开批判会。工人文化宫团结的一批工人作者这下找到了宣泄不满的机会,又是开会又是写大字报,十分起劲。

《朝霞》编辑部借住在上海人民出版社院子里,他们平时盛气凌人,独来独往,群众敢怒不敢言,现在批判《朝霞》的大字报一下子覆盖了出版社的大字报栏。一时间出版社的院子成了全市文艺界关注的中心。

这时总工会也出面召开批判会。写作组得到消息后派人去会场探听,结果被人认出而赶出会场。此后,总工会正式给中共上海市委打报告,要求对《朝霞》进行全面清查。

作为市委书记的王秀珍首先批示:“《朝霞》问题很严重,要好好清查。”

马天水见王秀珍态度如此强硬,还摸不着底,但知道工人造反派这一头不能得罪,便批了两个字:“同意。”

对此事,徐景贤颇感为难,他和陈冀德关系密切,工人造反派人所共知。他心里明白工人造反派整《朝霞》,实际是冲着他来的。况且他与王秀珍争权夺利,由来已久。但王秀珍的态度从来没有如此强硬,工人造反派更是全线出动,气势汹汹,连稳健老练的马天水也站到王秀珍一边,在市委书记的三票中他们已占多数,形势对他极其不利。此刻,他如果站出来保护《朝霞》,承担

责任,矛盾的焦点势必立即转到他身上来。弄不好他就会垮台。他左右为难。这时他只能自保,无法保写作组了。他在王秀珍和马天水的批示下面写道:“同意秀珍同志意见。”

徐景贤的批示既出乎王秀珍的意料,也出乎写作组的意料。写作组的人没想到徐景贤在关键时刻

把老朋友们都出卖了,他不仅没有保护他们,反而把他们抛了出去,自己却溜了。

三位市委书记的指示使写作组和《朝霞》所有的人都怔住了。就连朱永嘉也十分紧张,一时没了主意。

朱永嘉跑到王秀珍那里去打招呼,表示愿意检查错误。王秀珍却毫不客气地对他说:“你不用检查,我不要听你检查,你们知识分子要写检讨还不容易吗?!”

显然,这一次工人造反派不肯善罢甘休了。而在上海,已经没有能够制约工人造反派的力量。朱永嘉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张春桥、姚文元身上。他指定人每天写一份简报,向张、姚报告事件进展情况,他又要王知常出面,每天给姚文元写信,反映写作组成员的看法。

但是,接连几天,发往北京的简报和信件都没有反应。

这一下,写作组惊慌失措了,以为他们的张春桥、姚文远在工人造反派的压力下也要抛弃他们了。

朱永嘉已经稳不住阵脚,他想到自己苦心经营的这支队伍将毁于一旦,几次黯然流泪。他强迫陈冀德向工人造反派让步,争取妥协。王知常



2003年3月,徐景贤夫妇(左)和曾参加过《海瑞罢官》写作的原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朱永嘉及其夫人同游海南岛,在海口市凭吊海瑞墓

更是顶不住,在总工会头头的追逼下,把肖木抛了出来,说这三篇有问题的小说从主题到构思都是肖木的主意。《朝霞》编辑部的编辑开始清理抽屉,准备关门。而写作组的秀才唇亡齿寒,不觉惶惶然。只有陈冀德一个人态度强硬,不肯向工人造反派低头。

工人造反派见写作组和《朝霞》内部已分化瓦解,更是乘胜追击,准备以胜利者姿态接管《朝霞》杂志。据说,他们已经拟出了夺权后的领导班子名单。他们心里很清楚,这次他们如果能够压倒写作组,上海就是工人造反派的一统天下了。

4月9日,清晨。朱永嘉突然通知写作组一个年轻人去上海人民出版社门口等候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让他陪同何在出版社看大字报。

何秀文按时来到出版社。看了大字报后匆匆走了。

当天半夜,肖木从北京打电话给朱永嘉,说张春桥要他打电话告诉朱:“我是上海的第一书记,《朝霞》是上海的刊物,《朝霞》有问题,我应该负主要责任,而且,据我看没有什么问题,陈冀德不用检查。”肖木还告诉朱,过几天,张春桥会有批示给上海市委。

朱永嘉接电话时,陈冀德也在场。以后陈冀德给张春桥写信时曾这样描写他们当时的心情:“当时我和朱永嘉一边听电话,一边热泪直流,我们又一次感到‘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

陈冀德对《红卫兵战旗》的作者说过:“没有张春桥,你我都完了!”

第二天早上,朱永嘉立即召集写作组所属文艺组成员,传达肖木的电话精神。他情绪激动,流着眼泪,边哭边讲。

此时,总工会还不知道形势的变化,还在起劲批判《朝霞》。市工人文化宫组织了一次工人作者批判《朝霞》座谈会。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会议的通知,被写作组窃去了一张,作为总工会整写作组的“罪证”。

过了两天,马天水来电话请朱永嘉去,给他看一份张春桥的信,就是肖木电话中提到张春桥要给上海市委的批示。

张春桥在给马天水的信中,还附了一张纸条:

天水同志:

此件本来是想答复朱永嘉同志,现在考虑还是寄给你,请你约秀珍、景贤、朱永嘉三同志一谈,不要再扩大范围了。

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

张春桥的信是在谈工作,也不提《朝霞》事件,但信中第四条给这个事件下了结论:

天水同志:

请市委考虑:

1.朝霞、学习与批判、文汇报、解放日报,都不要发表批评外地报刊的文章。

2.如果要批,需请示市委。

3.这期朝霞准备批解放军文艺的文章,不要发表。

4.这些报刊的领导责任在市委,市委应负责,不要推给写作组。

如同意,请告朱永嘉同志。

张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

张春桥在信和纸条上签的日期是4月9日,实际上是4月12日才发出的。他让秘书何秀文

转告马天水。他还给何秀文写了一张条子:何秀文同志:

材料收到。请你把总工会的刊物从创刊号寄给我一份。团市委的那个简报也找一份。如果你能够找到有关批《朝霞》的其他材料,我都要。事情来得突然,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希望你能把来龙去脉打听一下。老马在电话里吞吞吐吐,说不清楚。当然,你要谨慎。只听不说。

张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

又是这个日子!

“又是这个日子”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张春桥最忌讳“四一二”。1967年4月12日,上海发生过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他对此记忆犹新。他认为总工会批《朝霞》是又一次“炮打”他。上海的造反派最忌讳“炮打”的罪名,过去两次“炮打”,凡有牵连者都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清洗。

王秀珍看到张春桥的信后,立即下令总工会停止一切批判《朝霞》的活动。总工会的头头听到“炮打”的传闻,哪里还敢轻举妄动。

现在是王秀珍去找朱永嘉打招呼了,他说总工会一帮人不是对写作组有意见,而是对徐景贤不满,想不到徐耍滑头,一个批示把矛头转向了写作组,自己溜了。

过去一个月里,写作组秀才们担惊受怕,现在可以扬眉吐气了,他们也不轻易绕过工人造反派,指责他们搞写作组是假,其实是炮打张春桥。

王秀珍也慌了,在一次工人造反派的聚会中,王秀珍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我们怎么会炮打张春桥呢?”

一向霸道逞强的工人造反派这次栽了大跟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些人过去动辄对别人上纲上线,小题大做,妄加罪名,现在轮到他们自己被别人揪住小辫子不放了。

今天我上你的纲,明天你上我的纲;今天我斗你,明天你斗我。谁一朝得势,大权在手,便重复别人整自己时的方法和手段。这成了历次运动乃至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任何一派也跳不出的政治怪圈。

在张春桥的干预下,《朝霞》事件总算平息了下来。

(责任编辑 萧 徐)

李正文在苏联劳改营

● 张惠卿

李正文同志是我党的一位杰出的地下工作者，他在1941年受共产国际东方部派遣，到上海从事对日伪的情报工作，日寇投降后转回中国共产党，直到上海解放。他长期在隐蔽战线上英勇斗争，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上海解放前，他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三位委员之一。

1999年在纪念上海解放五十周年之际，上海市国家安全局为表彰这位为解放事业做出特殊贡献的革命老人，特地派两位负责干部去北京李老家中慰问，并以该局名义赠给他书有“疾风劲草 青史英豪”八个大字的横幅，以表敬意，也是代表组织对李老一生的公正评价。

李老这位忠诚坚定的共产党人，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那就是他曾在苏联被内务部逮捕关押，在劳改营经受了近两年的残酷折磨，九死一生，是极少数得以平反出狱的幸存者之一。斯大林当时的所谓“大清洗”，冤死的不仅是无数苏联本国党政军各界的干部和群众，还有很多外国的革命同志，包括我国一大批在苏联工作、学习的干部和学生，以及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许多工作人员。他们都是极为优秀和忠诚的共产党人，却被强加于外国间谍、特务的莫须有罪名，作为反革命罪犯投入监狱，不少人惨死在劳改营中。这一段惨痛历史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李正文1908年出生在山东潍县农村一个贫农家中，1916年随家人逃荒到了东北关东的四平



20世纪40年代初的李正文

街。他自小勤奋好学，但因家境贫寒，小学和初中期间经常被迫辍学，后得到同学资助，顺利读完高中三年。1930年以优异成绩升入张学良任校长的东北大学。

本想作马列主义的信徒，却成为情报人员

李在高中时期即开始接触先进思想，参加进步活动，接受中共满洲省委地下组织领导。在东北大学曾被国民党市党部通缉，幸得校方庇护，才免于被捕。

“九一八”事变后，李逃亡到北平，在清华大学借读。1932年参加北平“左联”（左翼作家联盟），并很快被选为执委兼理论

部长。不久又从“左联”转到“社联”（社会科学家联盟）工作，担任执委兼研究部长，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用岳光的笔名编译了多种苏联有关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和小册子。

1933年10月，李正文经北平“社联”党团书记宋劭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社联”的党团成员，从此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当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党组织经常举行飞行集会、游行示威和公开讲演等冒险活动，把党员群众和进步力量公开暴露在国民党特务面前。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白色恐怖越来越猖獗，蒋孝先的宪兵第三团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赤色群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社联”、“左联”等进步团体也陷于瘫痪状

态。1934年5月宋劭文被捕,整个“社联”的活动被迫停止。

约在此事发生半年前,李曾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认识了在共产国际情报部工作的刘一樵。刘和李经过多次交往,彼此之间都比较熟悉,刘也知道李的共产党员身份。在“社联”停止活动后,刘就向李提出,愿不愿意去苏联学习,李当即表示愿意去。1934年8月间,刘带李到六国饭店会见一个苏联人,在座的还有一位名叫肖项平的中国人,据说是苏联情报系统在华的负责人之一。那个苏联人问李到苏联去想学什么,李说希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就说,那就派你到莫斯科去学习理论。

肖项平带李正文到了上海,办理去苏联的手续。在上海停留了三个月,肖要李抓紧空余时间设法提高自己已掌握的英、日文水平。1934年11月李正文乘上去苏联的轮船,先到海参崴,后转伯力,在伯力又停留了约一个月,到达莫斯科时,已是1935年1月了。

在莫斯科接待李正文的是苏联国防部的一位叫阿基莫夫的少将(此人在我国北伐时曾来华担任过军事顾问),阿基莫夫把李送到莫斯科郊区的赫姆基无线电学校,要他学习无线电课程,实际上这是一所培训情报人员的秘密学校,李当时毫无思想准备,因为他在北平时讲好是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经过反复交涉,校方最后同意李的请求,为他专门开了列宁主义问题的课,同时也要他学习其他课程,包括如何识别日本的军种、兵种、各种武器弹药的性能和作用等知识。在这个学校和李同一班级的共有八名中国学员,1936年上半年同时结业。李原有较好的英、日语基础,在学习期间,他又很快掌握了俄语。

结业以后,李被单独转到莫斯科的另一个叫马拉霍夫卡的郊区,住在一幢专门接待外国共产党人的国际宿舍大楼里,等待分配工作,这幢大楼又称国际招待所。

先后来到这家招待所的中国人连李在内共有六个人(四男二女),为了保密,他们相互都用俄文名字称呼,李的俄文名字是瓦夏。最后到的一位取名叫罗莎的女同志,是刚从上海来的,她原名吴先清(刘鼎同志的夫人),是中共老党员,长期为苏联搞情报工作,与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有来

往。

在这个招待所里,他们的生活条件较好,除吃住外,每人每月还发100卢布零用钱。有的人就经常进城去吃喝玩乐,甚至喝得酩酊大醉回来。李正文则始终洁身自好,烟酒不沾,也很少去莫斯科城里闲逛。他总觉得应该利用空余时间多学点东西,所以几乎成天关在房里看书学习,主要是钻研俄文和理论。他和大家的关系都处得很好。但万万没有想到,可怕的厄运正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逼来。

遭诬陷,成为苏联大清洗中的“特务”

1937年夏季的一天,吴先清对李正文说,她发现他们那个叫索妮的女同志经常偷偷地给上级写针对他们几个人的诬告信,指控他们是反革命。吴还说,今天乘索妮不在,她找到了一批诬告信的底稿,叫李快去看。李看后大吃一惊,其中讲到李正文的部分是这样说的:

“瓦夏反对国际无产阶级的五一劳动节,大家喝酒庆祝,而他怎么也不肯喝;瓦夏不想看到苏联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所以经常呆在房间里,不愿到莫斯科城里去参观;瓦夏为了掩盖他的反革命政治面目,买社会主义建设公债最多,捐给西班牙革命战争的钱也最多。”

实际是李不乱花钱,把每月的零花钱省下来,因而买的公债和捐献的钱就比别人多。索妮的信里还说:

“瓦夏懂日文,他的母亲是日本人。他长得也像日本人,肯定是日本特务。”

她写吴先清和其他几个人的诬告信,也都是满纸荒唐,全是造谣。

李正文完全没有想到,世上竟会有这样卑鄙到不择手段来陷害别人的人。他和吴先清都气愤极了,当天等索妮回来就和她大吵了一架,从此见面也不说话了。

当时正是苏联大清洗时期,斯大林大搞肃反扩大化,全苏联处于极为恐怖的气氛之中。不仅是苏联人,也使在苏联的外国人感到人人自危,李正文他们也感觉到了。当时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已经大张旗鼓地宣传,声言要发动一场“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声势浩大的运动。斯大林

公开号召,要大家“大胆怀疑”,提供“人民敌人”的材料,说什么只要包含百分之五到十的真情,也是我们需要的。于是在全苏联掀起了一片诬陷狂和告密狂,造成不仅成千上万无辜的苏联共产党人遭逮捕,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工作或学习乃至避难的外国共产党人也纷纷被捕,中国人自然也不例外,一批接着一批遭到苏联内务部逮捕和审讯,差不多都是被指控为“日本间谍嫌疑”,而西方人则被指控为“德国间谍嫌疑”。



李正文、陈惠瑛夫妇和儿子海丘(1950年元旦摄于上海)

住在国际招待所的六名中国人,除那个不断写诬告信的索尼外,都先后被捕。李正文懂日文,在劫难逃。吴先清则因她来苏联时途经日本,并在那里停留了若干天,也硬说她是“日本间谍”。五个人中他们两个是最后被捕的。

1937年11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招待所那个一直和他们联系的翻译通知李正文和吴先清,说领导要找他们谈话,并一再要他们多带点衣服和日用品。李虽意识到可能要逮捕他们,但自认为自己完全清白,反正很快就会回来,就和往常一样,什么也没有带。中途换了一次车,从黑色车换成了内务部的黄色车,直接开进了莫斯科鲁别克监狱。

据说这个监狱关的都是“要犯”,关李正文的牢房里已有近十个人挤在一张通铺上。他们见李进去,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给他腾地方。李当时认为他们都是真正“人民敌人”,而自己则是因误会被捕的人。同他们是敌我关系,故装聋作哑,自始至终不和他们搭话。但他们仍然亲切地向他介绍,说他们都是苏联的驻外大使,这个监狱的规矩是如何、如何的,并告诉他,如果你的问题严重,就要留在这个监狱里,如果不严重,就将被送去布德里斯克监狱,然后押到劳改营。但不管什么情况,都不会被释放,还要判刑,至少五年。

李正文当时根本就不相信他们这些话,认为

是故意挑拨离间,要他反苏。他心想,抓我完全是一时误会,不出一个星期就可获释。然而大出李正文的意料,对他的审讯既草率又无理。首先是每次审讯都叫他“刘进”,李一再声明,他从来没有叫过“刘进”,你们搞错人了。最后他们才改口称他“刘进又名李正文”,说明他们连名字都没有搞清楚,就把人抓进来了。

然后是大搞疲劳轰炸、车轮战,每次审讯都在十个小时以上,搞得李头昏脑胀。一再逼他承认是“日本间谍”,还用手枪顶着他的脑袋吓唬他,硬说他懂日文,母亲是日本人,非是“日本间谍”不可。李再三申辩说,日文是在东北四平 and 沈阳学校里学的,那时那里的学校都有日文课,至于他的母亲,则是一个大字不识的中国劳动妇女,根本不是什么日本人,你们只要稍作调查就会弄清楚。可他们根本不相信,说他编造假话,还骗他说:“我们有一种药酒,人喝下去就会迷醉,不自觉地真话都说出来。你不说真话,就叫你喝这种药酒。”李说,“我倒真想喝这种药酒呢,那样你们就会知道我说出来的全是真话,到底我是不是日本间谍了。”

谁知这些审讯者完全不顾事实,也不要任何证据,就把李正文定为“日本间谍嫌疑犯”,并经苏联法院特别会议判处五年徒刑,送到布德里斯

克监狱关押。这时李正文才开始明白那几位苏联大使所讲的话，并怀疑苏联内务部抓来的人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人民敌人”！

非人的监狱生活

在布德里斯克监狱，一间五六十平方米的大牢房里，住着一百多个犯人，除了少数刑事犯外，大多是所谓的“政治犯”，有苏联人，还有很多外国人。这些“政治犯”彼此间都很融洽，对李正文也很友善，使李体会到一种国际主义的友情。在和他们接触交往后发现，这些人和他一样，都是无辜被捕的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崇敬斯大林，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无产阶级伟大领袖，天真地以为他是受了内务部的蒙蔽，才发生现在这样的事情，只要斯大林一旦发觉，他们都会被释放出去，而且这样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

有一位乌克兰中校军官，睡在李正文旁边，因为彼此都是共产党员，便成了好朋友。一个做值日的苏联盗窃犯老是找岔欺负李正文这个中国人，故意折磨他。这位中校就挺身而出，把这个盗窃犯狠狠揍了一顿，使他再也不敢对李无理。监狱每天只发300克（6两）面包，李经常饿得十分难受，而中校的妻子常从家里给中校送来面包、奶油和香肠，他都要分给李吃。他还不止一次地对李说：“如果我们都能释放出去，那就一起到中国发动游击战争，你当政委，我当指挥员。”这些都使李十分感动。

1938年5月，李正文和其他几个中国“政治犯”一起被从布德里斯克监狱发配到苏联靠近北极圈的齐必由劳改营服役。这个劳改营处在西伯利亚的最北端，自然环境十分恶劣，一年四季天寒地冻，最冷时可达摄氏零下50度以上。他们每天都要从事10小时以上的重体力劳动，每人都有劳动定额，口粮面包是按完成定额多少来分配的。如不出工一天只给200克，出工只完成定额一半以下的，给400—500克，完成百分之百定额的给800—1000克，菜和汤也按定额分配。劳改营从不给犯人发衣服、帽子、鞋袜等必需品，更不用说日用品了，逼着你拼命劳动挣钱来自己解决。很多人都穿着缝了又缝、补了又补、难以蔽体的破烂衣服。李正文体弱力气小，又不善于干力气活，累得

要死也完不成定额，当然也就经常挨饿。

那里的人际关系也极为险恶，这个劳改营里有“政治犯”，也有不少刑事犯——小偷、流氓、劫匪、赌徒、杀人犯等等。这些刑事犯十分嚣张霸道，常常欺压殴打“政治犯”，偷、抢“政治犯”的东西，女犯人则被他们轮奸，整个劳改营是一座可怕的人间地狱，不少人就在那里被折磨而死，有饿死的，有累死的，有病死的，还有冻死的，死了就抬出去一埋了之。和李正文一起被押解到这个劳改营的原莫斯科东方大学青年学生王迂，一位1927年就入党的姓包的老同志，还有和李同时被捕判刑的吴先清同志，都在这个劳改营里悲惨死去。李正文自己如果不是得到难友姚良的全力帮助，也必死无疑。

姚良比李正文小四岁，他于1931年在东北入党。“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他受组织派遣到莫斯科求援，在进入苏联边境地区不久即被当作日本间谍嫌疑逮捕。最后被莫名其妙的判刑五年，递解到远东、中亚等地的劳改营服役。其间因劳动优异，按规定应给他减刑二年半，在1935年3月释放。但苏联当局言而无信，非但没有给他减刑，五年期满后还把他继续关押劳改，最后转到了齐必由劳改营。姚感到灰心失望、前途渺茫，在李正文到来时，他正处于极度苦闷无法自拔的状态之中。

李正文和姚良同住在一个大工棚里，这里除姚良外，还有一些中国“政治犯”，有的已经关押很久，他们都曾经满腔热情地来到这个被看作是共产主义圣地的苏联，但谁也没有想到会平白无故地蒙受不白之冤，成了一名罪犯，大家怎么也想不通这个道理。而在苏联这个最北边的劳改营里，对每个人都是严峻的大考验。精神上的折磨不用讲了，每天还要在严寒下干挖煤、挖坑、砸石头、盖房等等超乎体力的重劳动，很多体力差的人就这样被拖垮、拖死。李正文成天干重活，吃不饱、穿不暖，靠自己一定要活下去的坚定信念和毅力，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已到了能够忍受的极限。

姚良向李伸出了援助之手，这个小伙子经过五年多重体力劳动，什么苦活都干过，练就了一身强壮的筋骨。他和李正文一见如故，常把自己节省下来的口粮给李充饥，并用业余时间帮别人干活挣来的钱接济李，这样才使李没有饿死、冻死。有

一次劳改营派他们到一个一丈深的大坑里去挖泥,修建重油库。李奋力干了一阵,力气耗尽,再也挖不动了,人像瘫了一样,定额还远远没有完成。而姚良干完了自己的定额后,又回过来帮李干了好几个小时的活,完成了定额。这样的事经常发生。

有一天,姚良下工回来,看见一群人正围着李正文,看他干劈柴的活。李用一把大斧在劈一段直径足有半米长的木柴。那把大斧子叫大楔子斧,斧头足有十公斤重,再加上又粗又长的柞木斧把,一个棒小伙子举起它来都相当费劲,只见李正文勉强把斧子举了起来,落下去时非但没有把木柴劈开,反而弹落在地上,粗大的木墩子上只留下一道浅浅的斧痕,围观的人群登时哄然大笑,有人说:“哎,不要把大斧子落在自己头上,当心脑袋开花!”

从这天以后,姚良和其他几个好心的“政治犯”就尽量挤时间帮李锯木头,劈木柴,并教会他如何巧干这些力气活的要领。但李毕竟是个文弱书生,力气小,个子又较矮小,再怎么尽力,也总是干不好,每次都是累得精疲力竭,还是完不成定额。

有一个叫隋老爹的“政治犯”,他原是苏联远东红色游击队的司令员,是姚良的好朋友,也很同情李正文。他在这个劳改营有一定的威望,经他多次找管理员交涉,才得以把李正文调到了烫衣房工作,那里的活比较轻,李学得很快,也干得很出色。李十分感激他们的帮助和关照。他常常对难友们说,是他们救了他的命,如果他继续干劈木柴、砸石头、挖土方的重活的话,大概早已不在人世了。

李见姚良思想苦闷,就耐心劝导他、鼓励他,要他克服消极情绪,振作起来。当姚表示想学习马列主义知识,要在理论上求得进步时,李非常高兴,帮他制定了一个具体的学习计划,并按计划一步一步地给他辅导。他们睡在上下铺,几乎每天晚上都可以互相切磋。姚在李的悉心指导和帮助下,进步很快。在他们相处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这两位难友成了最亲密、最知己的好友和同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理想,是为了追求真理,决不能半途而废,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离开革命。

姚良在被关押六年三个多月以后,终于在

1939年2月获释,辗转回到了祖国。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公安部工作,担任过公安部办公厅主任。他把自己在苏联近七年的惨痛遭遇写成了一部四十多万字的书,书名叫《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1955年群众出版社出版),写到了在齐必由劳改营和这位李正文大哥的生死之交的前后经历,十分生动感人。

姚良走后,李正文继续在劳改营服役。他和好几位外国“政治犯”,包括苏联、波兰、捷克、朝鲜的共产党人交上了朋友,常和他们交谈各国的革命情况。每当他们从《真理报》上看到报道关于中国红军打了胜仗的消息,就来向李正文祝贺,他们也曾多次请李到他们住处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情况。他们家里寄来黄油和面包,也总会拿出来请李共享。特别是几位苏联同志常向管理员说情,尽量让李正文干一些轻活,并在生活上给予方便。这也是李在姚良离开后仍能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

向斯大林申诉

李正文对自己的冤案始终不甘心,也从不气馁,到了劳改营后,他仍像前一段一样,接连不断地给斯大林写申诉信,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要求重新审查。他在信中巧妙地引用了斯大林自己的话:“托洛茨基认贼作父,糊涂蛋认友为敌,只有布尔什维克才能辨别敌友。”并反问道:“我为什么就不能被辨别呢?”

他坚持不懈地用俄文先后给斯大林写了二十多封信,有的托被释放的难友带出去,有的自己投邮。这样反反复复的申诉,终于发生了作用。据说斯大林发了话,经过有关部门甄别,于1939年9月正式向李宣布:“撤销原判,平反释放。”李正文是被捕受冤者中极少数例外的幸运者,前后被关押了近两年,就逃脱了这场厄运,而和他一起在国际招待所被捕的四位同志,都全部冤死在劳改营中,无一人生还。

但是,劳改犯即使平反获释,也不准再让你回莫斯科,对李正文的处理是“遣返回国”。他从齐必由劳改营被遣送到歌德拉斯堡的劳改营停留了若干天。在这个劳改营里,李正文见到了不少中国政治劳改犯。一位叫张北的东方大学学生告诉李,他被特别会议判了8年刑,并说莫斯科东方大学

绝大多数学生都被捕了。李还碰到了被特别会议判刑 20 年的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成员陈郁同志。他们两人畅谈了很久,彼此都感慨万千。陈俄语说得非常流利,当时在那个劳改营里担任近百人的劳动队长。据陈告诉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中大部分人被捕了,都是由特别会议秘密判刑 10 年、15 年、20 年、25 年不等,现在都分别在几个劳改营里服役。

李正文在歌德拉斯堡呆了不久,又经过阿拉木图、阿克斗卡等城市,等待一些监狱中被释放的华侨刑事犯一批一批集中过来一起遣返,最后共有二百多人,这些人中就李正文一人是“政治犯”。一直到 1940 年夏天,苏联当局才把他们途经阿亚古兹押解到我国新疆塔城。李正文终于结束了在苏联的这段噩梦般的生活,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隐蔽战线上的勇士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李正文决定先回到重庆找党,投身抗日行列。但沿途交通十分不便,他历尽艰辛,长途跋涉,经迪化(今乌鲁木齐)、安西、兰州、西安、宝鸡、成都,到达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时,已是 1941 年 1 月了。

李正文通过熟人,找到了驻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和该处的负责人徐冰见了面。徐冰听了李的详细叙述后说:“你在苏联被捕过,要解决党的关系,必须要有苏联政府正式平反的书面证明。”

李又设法找到阎宝航寻求帮助。阎是中共秘密党员,直接受周恩来领导,并和苏联在重庆的驻华大使馆有密切联系。李和阎在东北时就相识,李对阎十分敬重。阎很同情李在苏联的不幸遭遇,立即找到苏联大使馆的武官罗申(罗后来是驻新中国第一任大使),请他帮助查询此事。苏联方面很快来了答复,说李正文是一位好同志,1937 年被捕是一场误会,早已正式平反,并要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共产国际东方部实际上是苏联在远东的一个情报机构。罗申交给李正文一份用俄文打印的证明材料,其中就是以上内容。李内心不想再和苏联发生任何关系,就推托说:“我不会抽烟喝酒,也不会交际应酬,不适宜做情报工作,还是让我回中国党去。”罗申说:“这是决定,你必须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

李正文拿了证明去见徐冰,汇报了苏方的意见,表示自己迫切希望回到中国党来。徐说:“既然共产国际要留你在他们那里工作,你就应该在那里工作,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不能和共产国际抢干部,挖他们的墙脚,反正你在哪里都是一样干革命。”李一再请求,徐就是不松口。这样,李正文就只好接受苏方的决定了。罗申要李先协助阎宝航工作。阎将李安排在黄炎培先生主持的重庆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任顾问,作为职业掩护。

大概在 1941 年 6 月 15 日前一两天,阎宝航从国民党的于右任、孙科那里获悉希特勒德国将于 6 月 20 日以后几天内进攻苏联的重要消息,这个消息是从国民政府驻德使馆秘密传回来的。阎一方面将此事报告了周恩来,一方面要李正文将这一重要情报迅速转告罗申。

据后来知道,潘汉年也随后在香港获得了这一情报,报告了中共中央。苏联最高当局是 6 月 16 日收到中方提供的这份情报的,可是他们将信将疑。因为苏德已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方不相信德国法西斯会如此不讲信义。但以防万一,还是作了一些部署和准备。因此,当德军于 1941 年 6 月 22 日果真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进攻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情报,使苏联得以避免更大损失。为此,斯大林曾致电毛泽东表示感谢。

1941 年 7 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决定派李正文去上海从事对日寇和汪伪的情报工作。上海是沦陷区,除租界成为“孤岛”外,已全被日军占领。

李正文从重庆乘飞机先到香港,再搭船于 8 月到达上海,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上海地区情报工作的苏联人尼克莱·伊凡诺维奇接上了关系,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地下秘密工作。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李正文在敌占区的隐蔽战线上,应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渊博知识,以大无畏的精神,面对复杂凶险的恶劣环境和白色恐怖的严重威胁,始终勇敢坚定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一个又一个艰巨任务,为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特殊贡献。

李老于 2002 年 2 月病故,终年 94 岁。他是一位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的共产党人。

(责任编辑 萧 徐)

我听胡耀邦谈 防止文革重演

张治宇

2006是值得好好纪念和进一步反思的重要年头。40年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30年前，我们党一举粉碎“四人帮”，为中国能迈向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中国终于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回顾过去、瞻望未来，我想起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革”这样的大灾难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我们怎样才能确保类似的灾难不会再次发生？虽然这方面已经有了不少可喜的研究成果，但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把这一研究工作深入进行下去。因为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能否健康地向前推进的大问题。在此，我不禁又想起了25年前耀邦总书记的鞭辟入里的一席谈话。

1980年4月应我党中央邀请，意共总书记贝林格率该党中央代表团来华访问，实现了中意两党关系的恢复。作为一名翻译，我参加了接待工作的全过程。我清楚地记得，在同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代表团会谈时，耀邦总书记详细地向意共客人介绍了我们党的发展历史、当前国内形势与政策，以及我党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与政策。在回答中国能否避免“文革”重演这一问题时，他强调指出，要防止“文革”这样的灾难，必须从党和国家的制度上想办法、要发展和健全民主。他提到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一文，称赞马克思对这次政变作了非常光辉的分析。耀邦总书记说，对（中国）“文革”大灾难，既要向社会根源上找，也要从当时的主观原因上找。林彪、“四人帮”是一伙野心家、阴谋家，但他们的坏并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而是从中国旧的剥削阶级那里学来的。旧社会的痕迹在中国是要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怎样防止野心家和个人主义者改变党的方向，这就要从我们党和国家的制度上想办法。使党和国家的制度没

有漏洞，减少漏洞，尽可能堵塞漏洞。耀邦总书记指出，文革十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场大灾难。他引用了恩格斯在1893年写给丹尼尔逊的信中的一句话：“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三次大灾难。文革是最大的一场灾难。我们能不能像恩格斯所说的，用历史的巨大进步来补偿这场大灾难呢？有这种可能，而且是很大的可能。当然要努力争取。耀邦总书记特别强调：作为一个执政党，我们一定要把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搞好，要制定一整套适合执政党的党规党法。他还借用邓小平同志的话：“人到八十岁，一般地讲，脑子僵化了。有功绩的人当然要尊重他，更重要的是，要强调集体领导。少数人掌握国家大权效果不好。”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能够长治久安，顺利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耀邦总书记认为，仅仅用“四个现代化”来概括党在今后20年中的任务“还不很完整”。在集中精力搞建设的同时，我们还要提出“建设现代化、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在回答意共客人有关取消“四大”的问题时，耀邦总书记指出，所谓“四大”实质上是号召大家写大字报，没有事实根据就提出打倒谁，这不是什么民主。对方听完解释后表示，取消大字报并不是取消民主。耀邦总书记明确肯定地说：“对。取消‘四大’不是取消民主，而是要发展民主，健全民主。”

耀邦总书记同意共客人这一番谈话内容同邓小平当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重要讲话精神是完全相通的。耀邦总书记的谈话已经过去了一个四分之一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番谈话中所包涵的精辟论断依然闪烁着光芒，完全没有过时，对我们全面推进现代化事业向前发展依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曾任中联部西欧局局长、办公厅主任）

（责任编辑 杜晋）

先父施咸荣的翻译生涯

● 施 亮

我的父亲施咸荣于1993年5月18日因病逝世。我们家人遵从他的遗愿丧事从简,只在他的遗体火化前举行了一个简单告别仪式。那天,约有各界人士近400人参加。大伙向父亲的遗体三鞠躬后,即将把他的遗体搬运走。在一片抽泣声中,我扑过去把自己脸颊贴在他的瘦削脸上,感到了一阵冰凉,这种冰冷感觉一直浸透到内心……是啊,亲爱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那时,我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十二年很快过去,再重新回想父亲的一生真是感慨万端。

无端成为肃反对象

我的爷爷曾经是上海某英国轮船公司的经理,也就是后人所称的买办。他发奋要让儿子读书,将我父亲送进了当时上海有名的“圣芳济”教会学校。

父亲毕业时,正值抗战胜利之后,他充满一腔报国热情,觉得中国农村凋敝,若要强国必须振兴农业,就投考了上海临时大学的农艺系。但进校门却发现这不是一所正经大学,教师学生都吊儿郎当,他随即退学,又报考了南京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是国民党政府为培养外交官而新设的系,待遇特别优厚,不仅不收学杂费,免费供食宿和发服装,还每月给一定津贴。不过,那时国民党政府已经腐败不堪,政局混乱,兵败如山倒,父亲的心理也是很复杂的。他厌恶国民党官吏贪污成风,尤其看到金圆券飞涨等黑暗现象,对当局充满了失望感,可是他也忧虑自己个人的前途。以后,国民党在大陆溃败,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曾经派专机接他们这批学生

去台湾,一班同学约四十人,一半人走了,另一半人则留在大陆。父亲坚定地选择留在大陆,他说他不相信国民党还能起死回生,对他们失望厌恶透了。

父亲在1949年又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由于原来英语基础较好,他免修某些课程,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写作和翻译。他曾经用英文写过六千字的长文,刊登在当时的英文周报《密勒氏评论报》上,还有许多译作在报刊发表,读书期间已经出版三本译作了。毕业前一年,国家实行院校调整,他又转入北京大学读书。父亲于1953年毕业,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先让他去原稿整理科工作。他心绪有些不愉快,认为要他放弃所喜爱的外国文学,实在是学非所用。但是,他很快又想开了,心想以后若要搞外国文学翻译,也离不开吸收中国文学养料。况且,他在清华读书时,曾经主动选修过著名作家李广田先生的课程,对当代文学创作也很感兴趣,他就在原稿整理科安心工作,还处理过杨朔等不少作家的稿件。以后,回忆这一时期,他对我说,人不仅在顺境要注重学习,在逆境中也要会学习,总会学到东西的。

一年后,他终于被调到了外国文学编辑部,正待充满青春活力大干一场时,厄运却无端落到他的头上。肃反运动时,单位收到一封匿名信,诬告陷害父亲是暗藏的军统特务,且有七条人命案,因此足有半年他被拘押在单位受审查。这一段痛苦日子里,母亲肚皮里正怀着我,她日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眼巴巴等待,希望见父亲一面,或找到某一位高级领导能够申冤上诉。父亲被关押在单位内,禁止与家人联系,

也不知道母亲的情况如何，内心的凄凉滋味可想而知。这时，聊以安慰他心灵的是还允许读书，他就利用一切空闲时间看书，既读中文书也读英文书。父亲说，正是有了这些书籍，才使他免于精神崩溃。父亲病逝后，当年的一位同事写过悼念文章，描述他软禁期间专心致志读书，几乎忘记了旁人，忘记了时间，让监视人员也大为感动。肃反运动过去了，单位负责人确认是冤案释放他回家。但是，反右运动



1984年施咸荣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所摄

接踵而至。在鸣放中父亲虽然谨言慎行，未写文章也无激烈言论，单位负责人却逼迫他去揭发另一个同事，此人曾经在鸣放时为父亲喊冤，领导便一定要父亲加一些罪名在那人身上，父亲拒绝了，觉得这不是该有的为人之道。哪里想得到竟然因此又惹祸上身，被单位负责人内定为“有同情右派思想”，受到降一级工资处分。当时也是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右派太多了，有的编辑室居然大多数业务骨干都被一扫而空，难以开展工作了，父亲方才侥幸未被戴上右派帽子。

人文主义者的思考

父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8年，主持编辑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哈代选集》、《司各特选集》、《萨克雷选集》等大量外国名著。在60年代初，又开始注意研究英美当代文学各个流派，与同事一起翻译出版了一批“黄皮书”。这期间他孜孜不倦工作，在政治上小心翼翼，思想深处却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大概是由于他研究英美文学，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较深，对极左的那一套做法甚为厌恶。与他同一编辑室的黄爱伯伯，跟他的思想很一致，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心里明白，由于领袖制定了错误的方针路线，政治理论越来越左，国家也面

临着更大灾难祸害。黄爱伯伯时常与他谈一谈对时局、政治的看法，父亲虽然赞同他，却仍然谨慎从事。还劝解过黄爱伯伯要注意结交，千万不要把心中的想法随意跟别人乱说。可黄爱伯伯是性格爽朗的人，有话藏不住。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那些言论终于被人揭发，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事发后，父亲冒险悄悄递纸条给黄爱伯伯暗通消息。他后来几次对我说，他很钦佩黄爱伯伯注重操守品格，被关押后绝不乱咬别人。否则，他自己也必被牵连进去乃至大祸临头。可以想象得到，那一段时间父亲的内心是极其忐忑不安的。其实，在家中，父亲即使对较亲近的亲戚朋友，也很少讲自己内心的真正看法，很少谈时局、政治。只是有一次，家里人过中秋节，父亲饮酒过量，醉醺醺地抨击时世。记得他痛骂那批文革新贵，断言他们绝不会有好下场。他还说，很久以前在文化部院中曾经偶然遇见过贺龙元帅，与他谈过话，是个性格豪爽之人，竟然也遭到陷害。倘若贺龙真要反党，又何必当年抛弃高官厚禄来参加革命呢？他预言那时的政治形势发展会越来越糟糕，竟趴在桌子上痛哭起来。这情景在我幼年记忆中清楚地铭刻着。因为，父亲平时极少袒露心灵深处的思想。而那一天是内心深处积郁的一次爆发。看来，他极其忧虑文化大革命动乱中的国家前途。

我渐渐长大了，也有了自己的思想。我的少

年时代是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度过的，那里集聚了一大批“落难精神贵族”，这些文化人的思想也是各式各样的。由于逆反心理及各种复杂原因，我的思想却越来越左。我在师范毕业后，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还有启蒙时期欧洲哲学家的著作，自以为有了自己的政治见解。我认为，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搞文化大革命，都是很正确的。因为十月革命后，苏联虽然没收地主资产阶级的财产，镇压了剥削阶级，可是党内却产生官僚阶层，他们有权也有钱，必将是新资产阶级的萌芽。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毫不松懈地抓阶级斗争等等。这个思想与“新左派”理论很相似。那时我还有一批年轻朋友，经常在我小屋里高谈阔论。父亲向来作风民主，对我的那些思想观点很不以为然，却保持着沉默。有一天，我讲一句：“你们也都是既得利益者，自然是从内心里害怕革命……”激怒了父亲，他滔滔不绝地讲出一些内心的真实思想。他说，我算什么既得利益者，那些文革新贵们位居高官，有权有势才叫既得利益者。说实话，我是不主张总是搞什么斗争，把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中国从鸦片战争后陷入混乱，辛亥革命以来国家又四分五裂，老百姓只是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过上安宁日子。有句俗语：“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你们哪里晓得军阀混战时惨不忍睹的情景！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饿肚子也没有造反，为什么？就是怕回到战乱的日子里去呀。暴力革命会给社会带来破坏，建设起来就很难。任何一股在野的政治势力为了上台掌权，总是把话说得很好听，平等呀自由呀，这个那个的，可上台后谁会想到去兑现政治支票？中国的事情是很复杂的，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建设，绝不是一场又一场革命。还有你在农村呆过，也知道一些农民的真正状况。现在，报纸上总讲什么“向工农兵学习”，还有“工农兵当家作主人”什么的，其实对于农民来讲，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很差，温饱都未能满足，又何来什么“当家作主”？他又对我说，你现在研究理论，在看那些哲学书，我不反对。多看一些书总是好的，但是，你要记住一点，凡是闭起眼睛大谈什么理论教条，不去看社会现实，不问老百姓疾苦，这样的人没有不失权的。

的。我那时听了父亲的话更增加反感，觉得他的话都是改良主义那一套，胡适那一套思想体系。后来，我的思想历程经过一段反复，也逐渐摆脱了极左理论。这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了，这里也就从略。

顺便还要提及一点，新时期文坛曾经出现过一种现象，就是所谓“书香门第作家”现象，所谓“子承父业”。很多评论家认为是由于“家学渊源”，是某种文化素质的影响啦，其实远远没有那么简单。这一现象仅只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具有特殊性质。比如在这特定的时期以前，如此现象却是极少的，多数文化人子女倒是从事另类专业。这可能因为在文革动乱时期，那些文化人子女的境遇不很好，就使他们直接接触了底层社会生活，而他们的家长又大都具有民主作风，使得那些子女能够独立思考，这才是他们从事文学活动的基本原因。有生活，有自己的思想，这是形成一个作家基本素质的最重要的条件。但是，父一辈作家与子一辈作家的思想却未必完全一致的，有时还大相径庭。一代作家总要反映他们所处时代人们的生活风貌，因此很难与父辈们的思想完全一致。这也就是所谓“代沟”吧？

致力于翻译事业

80年代初，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父亲的事业也进入了黄金时期。他从编辑工作岗位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担任文化研究室主任。这期间，他又撰写文章介绍了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各种流派，还出版了不少翻译作品，尤其是参与写作《美国文学简史》，其中黑人部分和当代文学部分就是他撰写的。

1984年，他又作为美国富布赖特基金的访问学者，先在哈佛大学讲学和研究3个月，以后又转到伯克利的加州大学讲学和研究，为时一年时间。他这时开始对西方通俗小说感兴趣了，在加州写了《英美畅销小说一瞥》一文，认为通俗文学虽然不被学者所重视却被广大读者所喜爱，占畅销书之大宗。他那时就敏锐地察觉到，我国转入市场经济时期后，文学作品也将成为一种商品，通俗文学也必然会有很大发展。父亲

还认为,真正优秀的通俗小说并不比“纯文学作品”的艺术地位低,过去英国的历史小说家司各特和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都被人们认为是通俗文学的作家。目前在国外,政治小说、历史小说、科幻小说、言情小说等都属于通俗小说范畴,拥有很多读者。因此,应该借鉴国外通俗小说的优秀创作手法,发展我们国家各种艺术形式的通俗小说。而且,尤其要加强理论研究,将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相比较,将中国

传统通俗文学与外国通俗文学相比较,将通俗文学的各类作品相比较,只有这样的纵横比较,才能深化通俗文学的理论研究,繁荣我国的通俗文学创作。

他还想写一系列文章,包括总结我国的通俗文学历史。他说,我国较早的通俗文学作品是《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等,还有各式的演义小说,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也未尝不是通俗小说。我国的小说作品开始大都是以通俗文学的形式出现的,由说书人讲故事再演绎成话本。所以,有它们的优点,比如故事曲折生动,描写人物传神,具有戏剧性等等。可是也有严重弱点,它们受传统伦理观念影响很深,使得主题难以深化,写人物时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又大都是大团圆结局,显得很肤浅。到了现代,又有张恨水先生和张资平先生等,小说题材大都是男女情爱,三角恋爱或多角恋爱,在写作技巧上借鉴外国小说,注重心理描写等,他们的小说有一种模式,也拥有相当数量读者。这样的小说也是一种类式的通俗小说,特别体现了通俗文学领域里过去由传统文化占统治地位,到后来也开始借鉴外国艺术形式,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以前,对他们的小说,许多文学理论工作者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这是不对的。

父亲准备写一部外国的通俗文学史,还准



施咸荣在英国莎士比亚故乡留影

备搞中国通俗文学与外国通俗文学的比较研究,基于这种思想,他在回国前,在美国购买并搜集了许多国外的通俗文学作品,装了几十箱带回国内。回国以后,他去海关取那几十箱书,一位海关工作人员惊诧地问他:“这是不是你们单位委托你买的?”父亲老实地回答:“不,这都是我自己掏钱买的。”那位海关工作人员大为感动,他说:“我瞧见的出国人员几乎全是买电器买货物的,还没有自己花钱买书的。看来,您是一位真心研究学问的学者。说实话,您的这些外文书我是一个字也看不懂。就凭着我对您的信任,咱们也别一箱一箱查啦!您就都运走吧。”后来,他与漓江出版社联系,主编了“外国通俗文库”,出版了英、美、日等西方国家约二十余种小说,比较受读者欢迎的有《假若明天来临》、《情盗》、《百分之七溶液》、《偷宝石的猫》、《夏威夷》等。那时的报刊上,还曾经炒作过此事,说是“欢迎专家入俗”云云。父亲苦笑着说,其实我们本来就在俗中,还有什么入不入的。通俗并不等于庸俗、鄙俗、恶俗,其实高雅与通俗并没有什么严格的界限,有些自以为阳春白雪的作品难道就没有鄙俗气息吗?他还曾经想研究关于电影电视文学剧本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他曾经有过一个中外通俗文学比较研究的庞大计划,可惜只作了一个开头,由于各种因素而未能实现,这也是他临终前最大的憾事之一。

一个学人的政治良心

1989年4月,父亲受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第二次偕同母亲赴美讲学和研究。他打算为即将撰写的《美国黑人文学史》和《美国当代文学史》搜集一些资料,也为进一步开展中外通俗文学比较研究做好充分的学术准备。就在这期间,国内政治局势出现动荡,许多人劝他俩留下。美国一个学术机构还主动给父亲打电话,向他提供了待遇优厚的职位,答允支持他写完《美国黑人文学史》。这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路口。但是,父母经过慎重考虑,还是按期在7月中旬回国了。那时有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其实,又是可以理解的。他毕生研究英美文化,晚年又涉猎研究美国政治,别人以为他是受欧美思想影响很深的知识分子,而他由于比较熟悉西方社会,反而能够客观地分析认识西方文明的精华与糟粕,他内心深处传统文化的东西实际很多,尤其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充满理想主义成分,民族情结是融化进思想血液中去的。他始终不后悔自己做出的决定。一次,父亲赴美国大使馆宴会,一位熟悉的使馆官员好奇地问

他:“那时候,你为什么回来呢?”父亲微笑地反问他:“我又为什么不回来呢?”那位美国人只好笑着耸一耸肩膀。父亲后来对我说,由于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等各种因素,中国人很难将自己融入到西方社会里,他们身处异邦的寂寞与孤独心理别人难以理解的,尤其当时的国内人们更难理解。如今,大量的“海归派”回到国内,此事就不难理解了。

回国一段时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命父亲担任美国研究所的副所长,当时所里的人事状况较混乱,还要他主持所里的工作。他几经考虑,又与老朋友们反复商量,最后同意了。而我们家里人并不很同意,觉得学者做官,殊为难事,倒不如安心做学术研究。对于我们的看法,父亲从道理上是同意的。但是,却有着极其复杂的具体原因,使得他不得不挺身而出,身任艰巨。后来,他幽默地苦笑着说,他是被拉上“官轿”的。他主持美国研究所工作,正处于90年代初极端压抑的社会环境里,他为处理繁忙所务整天疲于奔命,面对种种复杂的局面,纷纭的人事纠纷,以及难以使人舒心的氛围,回家后总是忧虑重重,长吁短叹。我记得一天晚上,他不去看电视,却拿一本金庸的武侠小说靠在沙发上,



1985年中秋节,钱钟书(左二)、杨绛(左三)夫妇与施咸荣(左一)一家在一起

怔怔地望着天花板。我悄悄过去问他有何心事?他却长长叹息一声,挥手说:“你别管了,跟你说,也说不明白!”父亲比较内向,有什么心事总埋在心里,更是绝少与家人谈起。不过,我心里清楚,他对那时有些人又企图恢复极左的政策,特别是想恢复整人的那一套,心里很厌恶的。

他认为,美国研究所的那些年轻人本质是很好的,既有才学又有爱国热情,即使在那场风波中有过冲动,有些什么激进的言语行动,只要认识到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置人于死地呢?他下定决心保护那些年轻人。他说,自己过去就挨过整,是极左政策的受害者,如今不能让年轻人再受害。这些年轻人是国家财富,保护他们也是保护国家的未来。所以,他殚心竭虑地与某些思想僵化者周旋,用各种方式保护那些年轻人,帮助他们摆脱那些麻烦和纠缠。我记得,其中的几个年轻人后来被保送出国留学,到我家来向父亲辞别时流泪向他倾吐心声,那些情感真挚的依依惜别场面实在使人泣下。父亲的内心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了。但是,他毕竟只是学者,没有政治经验,那几年苦苦的应付与周旋,使他心力交瘁,成为染病的一个重要原因。父亲患病后期,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我始终不明白,你何必当这个副所长呢?”他长久不做声,脸色肃然,好一会儿才嗓音沙哑地说:“是呀,你讲的这些,我怎么没有想过?干我的学术研究,轻松潇洒,也不用操那么多心!可是……”他又沉默片刻说,“你知道吗?爸爸年轻时挨过多次整,我真是不愿意看到现在的年轻人再挨整了!我对某些人说过,你们若是非要整那些年轻人,我宁愿也陪着挨整;你们要是送他们进监牢,我也宁愿陪着一块儿去。还有,我与那些年轻人没有一点儿私人关系,我为的是什么呢?为了国家!”他的声音又激越起来,“咱们国家可是经不起再折腾了!你看看这十几年改革开放,经济有了多么快的发展。再有十几年,我们国家就会更加强大。中国人在国外也能扬眉吐气了。可是,不能再折腾,一折腾,什么都完了。再也不能恢复那种人整人的一套了!”他又说,他绝不后悔做出的这些事情。他自己一人作学术研究,无非是写出几本书。但是,他能够保护了一批年轻人的话,将来他们又能够出多少学术成果呢!

父亲的这一套思维方式,现在的年轻一代或许并不理解,被认为是很陈旧甚至很迂腐的想法。有人还感到诧异,像他这样毕生研究英美文学的学者,为何骨子里边又那么传统呢?这确实是值得研究的一个现象。这一代老知识分子当中,一些研究国学的知识分子却隐约散发着

崇尚欧美文明的气息,而欧美派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又很传统。可能,就是东西方文化冲突又融合的某种矛盾统一现象吧?父亲是钱钟书和杨绛先生的学生,他极为钦佩这对夫妇的学问品格,认为是大师风范。他多次公开说,他仰慕这两位老人。他特别喜欢杨绛奶奶《干校六记》中的一段话:“默存常引用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父亲感慨地说,其实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爱国的,他们都有一个“俄狄浦斯恋母情结”,这个母亲就是祖国。父亲病逝后,我代表全家人起草了一幅挽联敬献在他的灵前:“一生坎坷,永忆江湖尽归白发;三载从政,萦怀天地实难袖手。”这个“天地”,也就是“伊”,也就是这个情结,他之所以“衣带渐宽”,之所以“消得人憔悴”,之所以“尽归白发”,之所以“实难袖手”,也就是为此。

父亲病逝第二天,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给我们家人写来一封信:“若莹夫人、亮、研贤伉俪同鉴:昨日得知咸荣逝世,不胜惊悼。数十年至交,临终未得诀别,尤为悲感。我自动手术以后,衰朽愈甚,一时未能康复。杨绛失眠减食,亦成病姬,本拟闻讯即造尊府慰唁,而实以精力不胜,稍待异日。先此草函,尚望节哀顺变,料理大事。指痛不便多写,书难尽意,即颁阖家平善不备。钱钟书、杨绛同上。五月十九日。”这是钱钟书爷爷亲笔信,也是他拖着刚动大手术的衰弱病体给我们写来一封哀切的信。过去,他给我家的信从来是一笔遒劲有力、神采飞扬的毛笔字,当时也只好用钢笔了,而且字迹颤抖,我们看信不禁潸然泪下,深深为老人的情谊所感动。如今,父亲已病逝十二年,钱钟书爷爷逝世也有六年,这使我想起向秀《思旧赋》里的话:“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他们这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形”已经逝去,是不是“神”也会随之而流逝?在这变动越来越剧烈的时代里,人们的思想当然也会有更大变化,那些风范与品格也可能再也传不下去了,会成为一种陈旧古董,只能让年轻人付之一笑吧。说实话,在这个扰攘纷纷的世界里,连我自己也很困惑,也只好“心徘徊以踌躇”了。(责任编辑 萧 徐)

叩 访 李 四 光 故 居

● 刘仰东

李四光的最后十年(1962-1971),是在紫竹院北面一处国家为他专门建造的宅院里度过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院子还在,并于李四光诞辰一百周年(1989)时辟为李四光纪念馆,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题写了馆名。2005年深秋的一个上午,笔者敲开那扇耳闻已久的宅门,有幸见到两位“留守”者:一位是马胜云研究员,1955年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地质部李四光部长办公室,长期给李四光做学术助手,如今年近八十,是李四光纪念馆的馆长;另一位是自1960年起在李四光家工作的保姆,看样子也已七十开外。两位老人一直没有离开这处主人已离去三十多年的故宅,足见他们和院主人的情感之深。

故居

李四光故居是一幢两层小楼,总建筑面积989.1平方米,有院墙环绕,院门朝北(以前朝南),楼门朝西。院内曲径通幽,有假山、喷泉、果木点缀。马胜云说,李四光解放后回国,搬过几次家,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上世纪60年代,因备战需要而迁居。有关方面请他去看李济深在城内东单的一处住宅,李四光感到那处房子过于豪华,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弃了。此后,他亲自选址、设计,并由国家建造了这栋小楼。老保姆回忆说,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树,都是当年李夫人许淑彬带着大家栽的,李四光也手植了其中的几株。

李四光是地质学家,择地而居,必然捎带关及“水土”,选象鼻子沟如此,选此地也是如此。从周围的一些历史遗迹看,这里不失为一处“风水宝地”:门前是一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有人测量过,这棵树周长9.8米,树高约27米,树冠荫地

面积约400平方米。传说当年李自成打北京时,曾在这棵树上拴过马,李宅正南是紫竹院,西面是万寿寺,北面是法华寺,还有几座历代名人的墓安在附近,如清朝康熙年间的兵部尚书甘文,明朝大太监刘瑾,以及辽代的什么人物。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现在,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其他家具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质感陈旧的皮沙发的扶手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老保姆告诉笔者,这几个沙发,还是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在旧货市场上买的便宜货,看来年头更为久远。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这里尚未恢复原样,但一张大写字台是李四光用过的。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写着“斗私批修”四个粉笔大字。马胜云说,这是李四光的手笔,写于“文革”高潮时期。那时,业务活动已不可能正常进行,“天派”、“地派”的红卫兵又轮番“造访”,或许是李四光出于自我保护意识而写上去的。如此说,这四个粉笔字至少也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马胜云告诉笔者,李四光夫妇在世时,这幢小楼只他们两人居住。他们去世后,女儿李林一家搬了过来。李林三年前过世,丈夫邹承鲁还住在这里,也患病在身,出入不离轮椅。在李家客厅的书

橱里 ,摆着三张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的证书 ,它们的主人分别是 :李四光(1955) ,李四光的女儿李林(1980) ,李林的丈夫邹承鲁(1980)。一门三院士 ,似已传为佳话。邹承鲁院士在生物工程研究领域的多项课题中取得过重大突破 ,尤以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成果最令他感到自豪。

李四光迁居这里 ,马胜云的家也就随之从象鼻子沟搬到这里——作为李四光的学术助手 ,须随叫随到——一晃四十多年了。李四光去世后 ,马胜云一直守在故居附近 ,住房条件没有得到太大改善 ,他说 ,也不是没机会改善 ,但为了兼顾李四光纪念馆的事情 ,多次放弃了搬家的机会。四十多年前 ,李四光家的小楼 ,李家南门外那棵银杏树 ,以及刘瑾、甘文等历史人物的墓碑 ,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 ,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 ,小楼因年久失修加上深秋的萧瑟氛围 ,多少显得有些残旧。当年的墓碑早已不知去向 ,银杏古树若非马胜云等人的一再呼吁 ,也早就因房地产开发而化为乌有了。

故居的主人(一)

在故居客厅的会议桌边 ,马胜云向笔者谈起了他所知道的李四光——

李四光是农民的后代 ,出身寒微。马胜云去过他的家乡 ,是湖北黄冈回龙镇下张家湾乡的一个穷山村 ,与林彪的老家上张家湾相对应。他14岁出国留学 ,凭的是自己勤奋努力得来的成绩。李四光先去日本学造船 ,后去英国学采矿 ,最后确定以地质学为终身事业 ,但也付出了不少实际代价。在去日本学造船的船上 ,因为穷 ,买不起正式的铺位 ,只好白天窝在底舱 ,晚上在船顶过夜。不想受了风寒 ,大病一场 ,又因没钱医治 ,落下一个毛病——不能吃肉 ,一吃就犯病。此后他一生与肉绝缘。去英国留学 ,靠打工维系生活。写毕业论文时 ,腿上长了一个浓疮 ,也因为既没钱又没时间 ,耽误了治疗 ,他索性用刮胡刀片自己把疮刮掉 ,腿上落下一个大疤。

李四光穷过 ,也因为穷而吃过这样或那样的苦。但苦中有乐 ,他是个多才多艺的科学家。一些后辈学者叹赏前辈科学家的国学根底 ,常拿李四光为例。的确 ,李四光不光散文写得好 ,旧体诗写

得好 ,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 ,用马胜云的话说 ,同样写得“有声有色”的。这只能归结为一句话 :国学基础深厚。不仅国学 ,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 ,尤好小提琴。1920年 ,他在巴黎曾用随身携带的一张八开12行五线谱纸谱写小提琴曲《行路难》 ,这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 ,曲调如曲名 ,低沉的主调中带着高亢的强音。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 ,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纪念晚会上 ,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世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现在这首曲谱和李四光在国外常拉的小提琴 ,都陈列在故居里。李夫人是钢琴教师 ,与李四光有珠联璧合、相映成趣之美。

李四光问学虽苦却并非不问窗外事。上世纪20年代 ,他在北大教书 ,有一次带学生去三峡调查地质 ,刚到宜昌 ,还没有住下 ,正扛着行李找旅店 ,大街上忽然传来英语叫骂声 :“蠢猪 !东亚病夫 !”李四光随声望去 ,看到这样一幕 :两个英国水兵坐黄包车到地方不但不给钱 ,还殴打向他们讨车钱的车夫。一群中国人在围观。李四光见状拨开人群挤过去 ,挺身阻止住外国水兵 ,他的学生王恒升等也抄起地质铁锤跟了上去。两水兵见这阵势 ,不免心虚起来。李四光用英文命这两个水兵付车钱 ,向车夫道歉。两人慌忙照办 ,逃离了现场。车夫很感激 ,当下给李跪地磕头谢恩。李四光扶起车夫说 :“我们是同胞兄弟 ,应该的。”围观的人群中响起了掌声。

晚年的李四光 ,生活很简单。他身体一直不好 ,血压高 ,肺也不大好。饮食上沾荤腥 ,常喝用玉米须熬的水。衣着也很不讲究 ,得过且过 ,甚至补丁擦补丁。李四光去世后 ,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 ,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家里的一架电视机——当年的高档产品 ,还是50年代苏联专家送的。李四光身兼多职 ,但除了必须出席的会议 ,他从不在类似晚会、宴会、纪念性活动这样的应酬场合露面。他总觉得年岁越大 ,时间越紧 ,要尽可能地把有限的时间花在有用的地方。

李四光待人和蔼、慈祥 ,不摆架子 ,无论对下属 ,对身边工作人员 ,对保姆 ,都一视同仁。因而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 ,也都愿意当面向他提出来 ,无

所顾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任他们,马胜云说:他对我们其实要求很严,只不过不用训人的方式而已。这也体现了一个大科学家所具有的胸襟和涵养。李四光对科学事业的追求相当执着,这不是一句空话,他解放后回国时已年过六十,但跋山涉水依然是他的一种工作常态,北京周边所有有地质价值的点,没有他没到过的。有一次马胜云随李四光去八大处考察,途遇大雨,当时李已七十多岁,马劝李这次就别爬山了,雨太大。李不听,说有个问题不到实地不能解决,执意爬了上去。结果是两人浑身湿透,淋成了落汤鸡。到家后,马胜云不免被李夫人训了几句,李四光则替马胜云开脱:“是我坚持要上的,你要骂就骂我吧!”

故居的主人(二)

有一类人,擅长闷头做学问。他们逮着一个价值可观的课题关起门来猛钻研,以至于不问世事,不识人间烟火,几十年如一日,牺牲了正常的生活和人生的乐趣,最终取得重大突破,得到这个或那个奖,并载入史册。李四光不属于这样的科学家,在他的履历簿上,还写着与科学无关却非常重要的这样几笔:

李四光是中国同盟会的创建会员之一,参加过1905年7月30日的同盟会筹备会和8月20日的东京同盟会成立大会,这年他16岁,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的。在同盟会筹备会上,孙中山特地走到李四光跟前,摸着他的脑袋说:“你年纪这么小就参加革命,很好,有志气,你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李四光一直记着这句话和同盟会成立当天的一些情景,他后来回忆说:

闭会后,我和(马)君武先生一同出街,走在路上,不意遇着留学生监督李宝巽(汉军旗),他开口便说:“你们小孩子不读书,在外面干些什么,我都知道,再不要胡闹!”我们转背便走,我和君武先生开了一个玩笑,我说:“你去请他加入好不好?”君武先生:“哈哈!”

辛亥革命爆发时,李四光已经回国。11月初的一个晚上,宋教仁约李四光等到湖北咨议局旁一公馆内,议论时局及组织南京政府人选。宋在谈话间曾试探李是否愿意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次长。李四光推荐了马君武。南京政府成立后的

1912年2月7日,李四光被推选为湖北军政府的实业部长。袁世凯当权后,李四光辞去职务。第二年再渡海外,留学英国。这一去,才奠定了他终身为之献身的地质学事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国民政府选拔六个人为孙抬棺送灵。选拔的标准是:一、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二、在辛亥革命中有贡献;三、对当时社会发展有重大推进作用。时任北大教授的李四光便成了这六人中的一员。4月2日,李四光参加孙中山的祭奠活动后,到中央公园社稷坛(今中山堂)为孙中山抬棺送灵。目睹这一历史性场面的袁复礼说:“李四光在这些抬棺者之中,是左前方的第一位。”孙中山的遗体棺被抬到门外后,放到高架灵柩上,在几十辆黑白相间的马车和众多送灵人陪同下,前往西山碧云寺。李四光则从中央公园一直步送到西直门外的万牲园。

故居的主人(三)

说李四光是中国地质学界的泰斗,这有点打不住。一则他的弟子如杨钟健、黄汲青等人,也早就是称誉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了,此外,作为一个大科学家,李四光的眼界、抱负和贡献,都不止于地质学界,甚至不止于科学界。

前面提到,李四光早年去日本,学的是造船,以求用船坚炮利救国。后来到英国学采矿,最终从事地质科学研究,都离不开“科学救国”这个根本初衷。如今全球都在关注的两大问题——能源和地质灾害,李四光在上世纪20年代就预见性地提出过。1920年,他在巴黎给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作的《现代繁华与碳》的学术报告中,不仅精确地计算出我国煤炭的储量,而且提出能源将渗透到现代生活的各个角落,必须用新的能源去替代资源有限的石油和煤炭。后来,他和许多那个年代的优秀科学家一样,拒绝国外的高薪聘请及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国过苦日子。他四处奔波,找煤,找石油,到宜昌找三峡库址,找一切可以转化为能源的东西。他孤军奋战提出的第四季冰川学说以及他在地质力学领域做出的创造性的贡献,已是人所共知。马胜云向记者特别讲到的,是另一个话题。

提起新中国的核工业,很多读者能说出一串科学家的名字,但里面如果没有李四光,这份名单

至少是不完整的。李四光在上世纪 20 年代初就把“原子裂变”作为天然能源之一提出。他认为铀矿是稀有放射性矿床,往往产生在地质构造复杂的地区。30 年代他曾派学生去广西调查铀矿,首次发现了磷酸铀矿、脂状铅铀矿和沥青铀矿。这项工作后因战乱和暂时提不到实际利用日程而中断。

1953 年夏天,李四光到北戴河疗养,朱德、李富春等也在那里。李四光平时走路有观察地质的习惯,有一天,在北戴河海滩边,他散步时发现了一堆黑砂,当地渔民告诉他,日本人占领时期,曾挖走不少这种黑砂。当夜李四光就派人带信到北京,找钱三强借仪器测试,并随即向朱德反映此事。朱德提出,应及早着手放射性矿产资源的调研。

第二年,李四光在地质部普查委员会设立了第二办公室,专门负责铀矿资源的调查,这等于延续了他 30 年代想做而未能展开的工作。他在地质学会第二十九届学术年会上敏锐地提出:“目前最需要的是‘油’和‘铀’两种矿。”

第三年,1955 年 1 月 15 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他在会上问李四光:中国有没有造原子弹的铀矿石,李四光拿出随身带来的铀矿石标本,答道:有。但一般的天然铀矿石,能作为原子弹原料的成分只有千分之几,因此需要大量的铀矿资源和浓缩铀工厂。他们给中央领导人现场测量,探测器刚一接近矿石,就产生了信号。毛泽东见状很高兴,他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床来。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我们只要有人,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此后,李四光一直身居领导中国核工业事业的核心位置,他是 1956 年成立的 国家原子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陈云)、1958 年成立的 中科院原子核科学委员会主任。他不仅直接领导原子核科



李四光故居

学委员会的经常性工作,还直接给来自基层的地质工作者讲解、做部署,在他提出的三条东西构造带上,陆续发现了储量丰富、品位高的铀矿床……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李四光的贡献有多大,是不难推想的。

说李四光是一个视科学为生命并为之拼搏到死的人,也不是一句空话。李四光不大相信天分,有人问邹承鲁:“如果天赋不好,即便很勤奋,是不是也难以成才?”邹是这样回答的:“李四光先生不赞成这样的观点。他老说自己天资不是很高,考虑问题比较慢,但慢有慢的办法,人家花一小时,我花两小时,别人学一遍,我学两三遍,也一定能学会。”辩证地看,惟其慢,也许会更扎实和更深入,也就更有可能有所突破。马胜云告诉笔者,李四光晚年几乎没有节假日,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直至病重去世。他晚年考虑最多的是地热的利用、能源的利用和地震灾害的预报这几个问题。这在今天,依然是科学界最值得思考和解决的课题。去世的前两个月,他还在召集有关会议,故居客厅的墙上挂着他在会上发言的照片;去世的前一周,他还在过问我国海域寻找石油的事情;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对大夫说:“请你坦率告诉我,究竟我还有多少时间,让我好好安排一下工作……”

(责任编辑 萧 徐)

护法运动中『南北军』大战

• 陈明德

孙中山何以护法

1915年,北洋军阀袁世凯精心策划的“洪宪帝制”出笼,引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从而爆发了旨在反对袁世凯取消民国的“护国运动”。民国开国元勋孙中山立即发动中华革命党在南方各省相继举行武装起义,全国各地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在全国人民的一片讨伐声中,袁世凯在皇帝美梦中一命呜呼。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段祺瑞担任内阁总理。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培养自己的在华势力,纷纷扶植在华代理人。北洋军阀的主要头目在帝国主义列强收买利诱下,迅速分裂为以冯国璋、曹锟为首的直系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两大派系。而在中国东北地区有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南方也有滇系和桂系军阀。另外,盘踞山西的阎锡山和割据徐州的张勋,也是两股颇有影响的军阀势力,整个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权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继续实行独裁统治。

面对错综复杂的中国局势,军阀混战的导火线一点就燃。为了挽救中华民族,孙中山于1917年7月率领驻沪海军和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广东,联络西南各省地方实力派,树起护法大旗。8月25日,非常国会(因议员人数不够故称非常国会)在广州召开,到会议员120余人,讨论了组织政府事项,决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在《临时约法》恢复前,大元帅为国家行政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9月1日,举行大元帅选举会,到会议员91人,孙中山以84票当选为陆海军大元帅。大元帅下设外交、内政、财政、交通、陆军、海军六部,从而形成了北、南对峙的两个中国政府。

中华民国军政府(俗称南方军政府)成立之后,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通电全国,否认以冯国璋为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北京政府,号召北伐。1917年,南方军政府巩固了广东、广西、云南等南方数省之后,决定开辟第二战场,派遣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俗称南军),出兵福建,计划占领闽省之后,再图浙江、上海、江苏等地,进逼南京。由于福建与广东毗邻,又是北洋军阀的一个前方基地,不但是中华民国军政府进行北伐的重要障碍,而且对南方政权有着直接的威胁。所以,南方军政府能否攻克福建,在战略上至关重要。当时驻福建的北洋军阀(俗称北军)代理人李厚基,在“护国战争”中就已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了福建革命党领导的武装起义,使福建的局势牢牢地控制在北洋军阀手中。南方各省的革命形势高涨后,原福建的革命党领导人方声涛立即以靖国军总司令的名义,树起“护法”旗帜,并在福建各地召集地方民军,扩充自己的武装势力。尽管陈炯明与方声涛所打的旗号都是为了“护法”,但各怀鬼胎,都在趁机扩充自己的军事势力。

各抱目的的军阀

1918年夏,陈炯明率粤军攻克了福建的西部龙岩后,直逼闽南重

镇——漳州，从而有力地打击了驻福建的北洋军阀，动摇了北洋军阀在福建的统治基础。粤军的军事行动引起北京政府的惊慌，为了阻止南军的前进，保住福建这一前沿阵地，段祺瑞立即命令驻浙江的董葆暄部，通过海上运输进驻厦门，企图用武力阻止粤军进攻。为了避免军队的重大伤亡，孙中山邀请浙江督军吕公望出面，成功地策动了浙军第一支队司令陈肇英倒戈，从而使北军从攻势变为守势。随后，陈炯明又率粤军乘胜出击，全面占领了漳州、泉州所属各县，直逼兴化，将地处闽中战略要地的莆田、仙游等地推上“南、北军”大战的前沿阵地。

莆田、仙游地处福建沿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有革命党人组织农民武装起义。“护法运动”爆发后，莆田的革命党人积极响应，原黄濂起义军旧部再度揭竿而起，形成不同归属的地方民军。最早成立护法军的是莆田籍前清秀才杨持平。杨早在武昌起义前夕就投奔黄兴，继后又辗转上海，参加革命党。辛亥革命后，他在厦门任《民钟报》编辑。“护法运动”开始后，他带领一批莆田籍农民骨干在长泰成立了“闽南护法军”，通电反对北京政府，拥护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军政府。1918年夏，杨持平率护法军配合粤军进攻安溪、南安和同安等县。李厚基急令驻厦的浙军董葆暄一师共2000多兵力进攻驻灌口的闽南护法军。杨持平率部队奋起反击，大败浙军，使闽南护法军军威大振。莆田、仙游两县的民军在杨持平闽南护法军的胜利鼓舞下，纷纷宣布起义，对抗驻守莆田、仙游的北洋军阀政府。有的民军还投靠杨持平部，如原黄濂旧部的陈贻、黄金藻、何标、陈铁和邹去病等部民军，他们虽驻扎莆田的黄石镇，却归属闽南护法军第三路军。其他各路民军包括仙游民军，虽然游离于南军与北军之外，但大多是以反对北洋军阀统治为借口而揭竿起义，并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地方武装力量。因此，粤军的陈炯明和靖国军的方声涛都想方设法拉拢争取莆田、仙游等地的民军，以壮大自己的势力。由于杨持平与方声涛是故友，自然归入靖国军。而陈炯明也不甘示弱，马上派人拉拢驻仙游颇有势力的民军头目张约，委任张约为援闽粤军左路军司令，下辖三个营。9月1日，张约奉陈炯明之命率民军攻打仙游县

城，推翻了北洋军阀仙游县政府，委任周湘俊为仙游县长。南军占领仙游后，驻莆田的北军急调两个营的兵力，企图收复仙游城。但因张约受到粤军的支援，武器装备得到改善，加上北军两个营内部存有矛盾，不能同心协力，故被张约个个击败。

南军在仙游得手之后，立即向莆田进军。当时莆田驻军有北洋军马督彪营和福建陆军第一师江涛营。护法运动爆发后，江涛曾经与许莫多图谋在莆田举事，后因计划泄露，江立即将许杀掉，以推卸责任。因此，李厚基对江涛表面上信任，暗地里却存有戒心。粤军入闽后，李厚基为防不测，命马督彪率北军一个营到莆田协防，实为监督江涛。在南军将要攻打莆田城前夕，马、江矛盾恶化，马威逼江率部移驻莆城南门外，把江部推向战斗前沿。江部屡遭马部威胁，心中不满。在派兵攻打仙游时，马督彪曾借用李厚基的名义，派江涛营打头阵，江营被张约打败后退时，马部用炮火阻止江涛营的士兵撤退，使江部损失惨重，导致双方矛盾激化。回到莆田后，江、马两部矛盾公开化，随时都有火拼的可能。江涛于1918年9月8日撤出莆田县城，移驻城外，并准备武装进攻马部。时任莆田县长的刘荫榛亲自出面调解，但难以化解双方矛盾，这给南军进攻莆田提供了良好机遇。在莆田北军内部剑拔弩张之际，南军也在积极策动莆田、仙游的地方民军攻打莆城。因此，在南军攻莆时，江涛营临战倒戈，率众参战。但在战斗中江部只是观望不前，虽然武器比民军优良，却没有发挥作用，而且还伺机向李厚基投靠。

第一次南北军大战

1918年9月11日，莆田、仙游的各路民军在粤军的支持下联合进攻莆城，爆发了“护法运动”中在闽中动用兵力最多且持续最长（81天）的一场“南、北军大战”。此次大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9月11日至9月底，代表南军的莆田各路民军分三路围攻莆田县城：一路由仙游民军张约部同莆田民军杨雷霆部和潘云部及江涛营作为正面战场，进攻莆田县城的南门；一路由蔡春庭、陈龙、吴牧村等常泰民军攻打西门；还

有一路由邹鸿恂率民军攻打莆城东门。当时驻莆田城内的北军有马督彪和一些地方武装,马系北洋军阀的直系部队,装备精良,配有快枪大炮,战斗力强,而莆田县城又是福建著名的“石头城”,城墙均用大石块垒砌而成,又高又牢固,易守难攻。因此,北军凭借坚固的城墙,分兵把守,固守待援。而民军武器大多是土枪土炮,只有江涛营武器较好一些。同时,各路民军纯属乌合之众,缺乏正规训练,战斗力低下,又没有统一指挥,协同作战,更没有集中兵力,攻其要塞。在攻城的头两天,士气较高涨,少数民军曾一度抢上城墙,却因寡不敌众,被北军个个击毙,死伤数十人。只有东门外锦墩村一带民军,组织土制大炮配合药统进攻,沿用过去农村械斗时的熟练射击技术,把炮弹射中城内数处,给北军造成一定威胁外,其余的子弹均被坚固的城墙所挡住。加上没有切断北军同福州的交通线,在战略上尤为失策。因此,南军打打停停,围困北军10多天,仍然未能攻破莆城,时间一长,民军反而情绪低落,缺乏取胜信心。而在南军攻打莆城的同时,李厚基急电段祺瑞,要求调兵增援,因莆田与福州系唇齿关系,唇亡齿寒,一旦莆田落入南军之手,福州城将岌岌可危。因此,段祺瑞急调装备优良且战斗力强的耿锡联“模范团”增援莆田。

9月14日,“模范团”前头部队程经邦营,约600多人从南军防守薄弱的莆田北门突破,进入城里,加强了北军的防守力量。9月18日,耿锡联率“模范团”主力进驻莆田涵江。翌日,即派出一个营兵力从莆田县城的北门援助北军。城内北军见援兵已到,士气大振。9月20日,被围困多日的莆田北军转守反攻,集中兵力,冲出南门,首先出击围攻南门的民军。由于民军多日攻城未克,情绪有所松懈,认为北军被困,不可能反守为攻。加上江涛营已密电李厚基:“友军挑战,不忍糜烂生灵,迫而处此,求瓦全”,表白自己是被马部所逼而致,并无反叛之意。李厚基马上派遣沈国英携带军饷数千,慰问江部。当江部获悉“模范团”到达涵江时,即率部退出莆田南门阵地,佯装去攻打涵江。队伍行至桥兜时,即令士兵撤掉南军徽号,再度临阵倒戈。所以,南门的南军兵力锐减,北军很快就突破了民军的前沿阵地,并焚烧筱塘村。左路军司令张约中弹阵亡,仙游民

军群龙无首,各自持枪退回仙游。莆田地方民军杨雷霆部抵挡一阵后也不敢恋战,急忙撤退。9月21日,南军经过一番兵力调整后,再度攻城,双方激战一个晚上,仍未能攻破莆城。9月24日,北军又集中兵力袭击在东门外围攻莆城的莆田民军邹鸿恂部,邹部难以抵挡强敌,只好撤回黄石根据地,并派人往同安请杨持平增援。而西门外的莆田民军蔡春庭部面临强敌,孤掌难鸣,亦不战而退,撤回常泰山区。9月25日,“模范团”与莆田马督彪部会合,又出击城南一带,将莆田民军余部追击到南寺口。至此,第一阶段的闽中南、北军大战暂告一段落,但零星战斗仍在继续。

莆城久攻不克,孙中山、陈炯明等甚为担心,如果南军受阻闽中,就很难实现开辟第二战场的战略计划。所以,陈炯明即命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率部增援莆田。而在此之前,闽南护法军主帅杨持平也心系家乡民众的安危,于10月8日从同安派遣两支护法军赶回莆田增援。10月13日,北军从涵江、城里分两路向黄石进攻。第一路北军由马督彪部从咸淳桥方向准备抢占塘头。而闽南护法军却在沙坂村伏击,双方展开激战,北军当场被击毙5人,伤多人。北军不能越过咸淳桥,便固守桥头。为了歼灭北军,护法军正准备分兵绕道咸淳桥从侧面进行袭击,恰好杨雷霆、潘云率民军及时赶到,截住了北军的退路。北军背腹受敌,阵容顿乱,士兵们拼命向城里逃命,护法军乘胜出击,击毙击伤北军百余人。

与此同时,北军耿锡联的“模范团”也派两个连从涵江向黄石进攻,在后尾地区遭莆田民军邹去病部、翁汉国部的袭击,耿部因马督彪部已被击退,失去犄角,孤立无援,故无心恋战,退回涵江。10月21日晚,莆田民军又分两路袭击北军,是夜城涵两地枪声大作,但仍未攻破莆城。10月23日,耿部“模范团”围攻海滨村,捕抓民军13人,焚烧房屋无数。10月下旬,以北军袭击各地民军据点为主陆续发生了多次战斗,双方均有伤亡,但这都是第一阶段南北军大战的余声。

第二次南北军大战

护法运动时期闽中的第二次南北军大战从

1918年的11月初拉开序幕。11月上旬,莆田地方民军杨汉烈部开往莆田北面的梧塘,拟与邹去病部联络,召集其他民军一道袭击驻涵江的北军,忽接到援闽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援莆急电,许已率部到达莆田梧塘,正在联络莆田、仙游两县的地方民军。这时闽南护法军总司令杨持平也率部从南安溪尾到达莆田,并主动到驻梧塘的粤军第二军军部同许崇智联系。双方商定,所有莆田、仙游两县13支部队统归许崇智指挥,粤军主力负责进攻涵江的北军“模范团”,由驻黄石的民军邹鸿俦部从南面配合粤军进攻涵江。杨持平率闽南护法军及莆田其他各路民军联合进攻莆城。并约定莆涵两地首尾呼应,协同作战。

11月中旬,南北军在莆田进行了第二次激战。11月15日,许崇智派朱得才、赵光、武定国等旅,向北军“模范团”发起总攻,双方一接触就展开激战。北军在涵江黄巷坡构筑工事,凭借阵地的掩护,阻击粤军的前进。粤军虽损失惨重,但人多势众,大兵压境,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用大炮摧毁了北军的前沿阵地。双方激战两天,许崇智部于翌日晚进占了涵江塘北制高点。随后,粤军架起大炮,向涵江镇区猛烈轰击,素有商业重镇的涵江成为一片火海。涵江的各界士绅担心商业区毁于炮火,便通过红十字会向许崇智求情,恳请不要炮轰城区。许崇智认为粤军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北军已成为瓮中之鳖,自信不用炮兵也可以摧毁“模范团”,便命令用步兵进攻。北军利用粤军停止炮轰的机会,调整了兵力布署,利用粤军地形生疏的弱点,分兵埋伏。粤军不明底细,贸然从涵江东面沿街开进,结果在涵江顶铺遭到北军伏击。北军在暗处,南军在明处,短兵相触,炮火发挥不了作用,粤军前头部队被切成数块,伤亡惨重,急忙退出涵江。

经过几天激战,南、北军都消耗了不少弹药和兵力,北军几乎弹尽粮绝,便通过中间人向南军建议,因当时正处农忙季节,要求双方停战10日,让农民收割粮食。此时,粤军也已乏弹,便顺水推舟,同意停战。北军得到了休整机会,立即向李厚基呼援。李马上通过海上向“模范团”补充武器弹药和兵力。北军得到补充后,士气复振。而许崇智也向陈炯明急电要求补充供养。

在涵江激战期间,杨持平也按计划率闽南护

法军和各路民军包围了驻莆田城郊的北军两个营。激战一天,北军损失惨重,阵亡数十人,急忙退回城里,据城抵抗。由于城墙坚固,南军围攻数日,难以破城,也暂时休战,准备待农民收割之后,再行攻城。

然而,此时战局出现了意外转机,陈炯明并没有及时向许崇智补充弹药,使许崇智大感困惑。11月下旬,粤军第二支队司令蒋介石奉陈炯明之命从长泰前往永泰,途经仙游时电召许崇智到仙会晤。蒋传达了陈炯明的授意,令许暂缓攻打莆城,准备退兵。原来,陈炯明正背着孙中山与李厚基谈判,双方初步商定以莆田为界,莆田以北的地盘归北军管辖,仙游以南划归南方军政府。于是,许崇智便将粤军撤回仙游。

南方军政府的攻打莆田的战略计划半途而废,杨持平的闽南护法军和莆田、仙游的地方民军都极其不满,公开表示反对,并准备继续进攻莆田的北军。而陈炯明又担心“南北协议”被杨持平破坏,即派亲信诱杀了闽军护法军驻安溪的第二路军司令林敬根,袭击了护法军第二路军。随后,陈又派兵进攻驻安溪、南安境内的闽南护法军。杨持平为了解救部属,被逼放弃攻打莆城,率部返回闽南,先后击退陈炯明部的多次进攻,并乘胜追击,进军长泰,威胁漳州。陈炯明见势不妙,深怕自己陷入闽南护法军的包围之中,急电请孙中山出面解围。孙中山从大局出发,亲自向杨持平写信,并派黄展云到闽南劝说护法军。杨持平为了顾全大局,接受孙中山的劝告,停止对陈炯明的进攻。尽管如此,陈炯明仍对杨持平记恨在心。1920年,陈炯明勾结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发动政变,从闽撤军时,暗约北洋军阀李厚基夹攻闽南护法军,把漳州、龙岩所属各县,全部移交给福建的北洋军阀李厚基接防,并逮捕杀害了闽南护法军总司令杨持平。

由于陈炯明的叛变,南方军政府开辟福建第二战场的计划以失败而告终,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也功败垂成,历史事实又一次证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和软弱性,难以担任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这一历史使命将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身上。

(责任编辑 萧 徐)

王震两签合同为植棉

● 熊坤静

如今,新疆棉花的总产、单产已经雄居全国第一,成为我国重要的棉花主产区之一,并由此撑起了自治区“一黑一白”(“白”即棉花)的经济发展框架。但50多年前,新疆仅有少量的棉花种植分布于南疆,其它地方特别是北疆的玛纳斯河流域仍是植棉的空白区。在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新疆军区代理司令员、代理政委和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政委的王震的领导和开拓下,才使棉花种植逐渐推广到全疆,从而奠定了新疆棉花产业发展壮大的坚实基础。回首往昔,王震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棉花种植而两签合同的故事,已然成为深深镌刻在新疆各族人民心坎上的经典。

—

和平解放之初,新疆突然一下子平添了包括进疆人民解放军以及由“三区”民族军和驻疆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人民解放军第五军、第二十二兵团(以下简称兵团),总计近20万人口,使得本来就贫穷落后特别是农业生产能力低下的当地粮食等物资供应万分紧张。为了减轻地方各族人民群众的负担,王震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要求人民解放军驻地部队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除了从驻疆人民解放军中,分出一半继续执行守卫边防、剿匪肃特和维护地方社会治安等任务外,其余10万多官兵在他的率领下,自1950年起即奔赴天山南北,挺进亘古荒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以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为目的的大生产运动。

按照新疆军区的命令,第二十二兵团的绝大部分指战员进驻天山以北的茫茫准噶尔盆

地。当时的新疆虽然百业待兴,但吃饭穿衣问题依旧是首当其冲的当务之急,加之随着棉纺织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必需有源源不断的棉花供应才能维系。为此,兵团在开荒种粮的同时,也开始了棉花生产。早在1951年,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兵团司令员的陶峙岳即萌生了在玛纳斯河流域垦区试种棉花的想法。他将通过一位探亲归来的老战士从关内带来的一包棉籽郑重其事地交给兵团二十六师七十八团(现石河子总场四分场)试种后,当年秋季就获得了50公斤/亩的收成。尽管产量很低,但这一事实却打破了过去流行在某些专家学者口头上的关于高纬度、高寒地区不能种植棉花的论断,也彻底结束了玛纳斯河流域亘古未有的植棉的历史。在此鼓舞之下,兵团党委提出,1953年在玛纳斯垦区进一步推广棉花种植并达到单产200公斤的要求。

为了完成上述指标,驻玛纳斯垦区的兵团农七师和农八师的领导想方设法,而一向崇尚科学、重视人才的王震更是煞费苦心。他特地将来华从事援建工作的苏联农业、植棉专家迪托夫聘请到兵团来做技术指导。

以工作上一丝不苟、认真负责而著称的迪托夫一上任,即着手对玛纳斯河流域的气候、水土等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尔后,他便信心十足地对王震、陶峙岳等兵团领导人说:“如果司令员能保证按我的要求去做,我就可保证达到兵团党委提出的亩产量。”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满足。”王震豪爽地满口答应道。

迪托夫见状,这才直截了当地伸出三个手指头说:“我的要求有三条:一是每亩地施优质

厩肥 3000 公斤，二是在栽培技术和管理措施上要严格按我的规定办，三是办一个植棉技术培训班，由植棉单位的团长、营长和连长亲自参加，不得借故派人顶替。”

王震笑了，以征询意见式的目光望着陶峙岳说：“这个要求不高嘛！你说呢，陶司令？还有晋初、仲瀚同志？”

得到陶峙岳的赞同后，也不待时任兵团参谋长的陶晋初和兵团政治部主任的张仲瀚说话，王震便明确表态道：“迪托夫同志，你的要求我们件件照办，如果更具体一点，就是技术上由你负责，施肥、管理和其它杂事则由师、团负责。若有不听指挥的，向陶司令员和我汇报。”

“司令员的话我很满意，也深信不疑。但我们不可能时刻都跟着我在农场工作，如果出了问题再找司令员汇报，就可能延误时机。我想，要是用一个什么法子来实施监督约束的话，双方就不至于失信。”迪托夫以双手比划着，搜肠刮肚地说。

王震愣了一下，随即顿悟似的说道：“噢，我们可以立个军令状嘛！”

“军令状？”

见迪托夫莫明其妙、一头雾水的样子，众人不禁开怀大笑起来。

“军令状是军队专用术语，类似于合同。照我的理解，迪托夫的意思是要订个合同，把我们口头商定的条款都写进去，以便做到责任明确、有据可依。”

张仲瀚的解释立马使迪托夫明白过来，以致于他高兴地竖起大拇指连连夸说道：“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好！我们就来订一份植棉合同。”王震响亮地拍了板后，又用目光扫视着陶峙岳等人。

当陶峙岳的“要得！”二字脱口而出，陶晋初和张

仲瀚也无什么异议后，他们就很快拟定了一份植棉合同，包括：由王震负责组织领导，由陶峙岳、陶晋初负责物资供应，由迪托夫负责技术指导，由时任兵团农七师师长的刘振世和农八师师长的罗汝正保证各项技术措施的贯彻执行以及亩产籽棉 200 公斤等主要内容。最后，由迪托夫以及王震、陶峙岳、陶晋初和张仲瀚分别代表双方在合同上郑重地签了名。

通过各方面的协同努力，玛纳斯垦区的两万亩棉花获得了平均亩产籽棉超 400 斤的大丰收，其中有 1.6 亩产量高达 1349 斤/亩，创造了当年全国棉花单产的最高纪录。因此，该垦区也迅速跻身为全国重要的产棉基地之一。

二

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新疆军区于 1954 年 10 月决定，将集体转业的驻疆生产部队与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成立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后更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使其成



王震和上海支边青年亲切交谈

为一支集生产队、工作队和战斗队为一体的特殊的党、政、军三结合组织,成为一支一手持锄、一手拿枪的劳武结合型的屯垦部队。从此,生产建设兵团获得了一日千里的蓬勃发展,并曾于上世纪60年代中叶一度成为新疆先进农业生产力的代表。但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内乱中,兵团和师两级机构于1975年3月被撤销,原兵团所属各团场及企事业单位归地方农垦部门统一管理,使屯垦事业遭受挫折。

作为新疆屯垦事业开创者的王震,虽然早在1954年就调走了,但他却时刻关注着新疆,特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他得知生产建设兵团被撤致使屯垦事业徘徊不前时,简直忧心如焚。因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就积极筹划着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有关事宜。1980年9月至1981年5月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等职的王震热情地奔走呼号,先后四次往返于新疆和北京,竭尽全力做了大量深入的调研等前期工作。1981年1月12日至13日,来疆视察的王震在乌鲁木齐延安宾馆先后接见了石河子垦区、奎屯垦区、新湖农场以及二十九团负责人。1月12日,他认真听取了石河子垦区新湖农场的工作汇报,当得知位列全国八大农场之一的新湖农场竟然是一个累计负债达7011.9万元的亏损大户,况且其棉花亩产仅有五六十斤的情况时,便痛心疾首地说:吃社会

主义,这样吃不得了!他表情严肃地沉默了一会儿,又坚定果断地说:石河子农学院正在搞地膜植棉,你们看了没有?亩产达200多公斤,要增加多少利润啊!随后,他像是发布作战方案似的命令道:“你们新湖农场要搞35000亩地膜棉,一亩也不能少。”紧接着,他又扳起手指头给大家算起经济账来:35000亩地膜棉,亩产200多公斤,每人管3亩,就是600多公斤,40%奖给个人,可得480元钱。这样,职工就能很快地富起来。正当大家为此而喜上眉梢之际,王震却又忽然大声喊道:“拿笔来!拿笔来!空口无凭,立据存照。咱们写个字据,大家都签上字,好吗?”签完了字,他就高兴地站起来和随后担任恢复了的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王寿臣以及时任新湖农场场长的黄金山和副场长张守廉握着手,连声说道:“好好干,明年棉花丰收了我来参加你们的庆功会!”

新湖农场遵奉王震的教导,上下齐心协力、大搞科学种田、推广地膜植棉,一举扭亏增盈,当年即实现利润400万元。

由于王震的大力倡导,先进科学的地膜植棉技术率先在新湖农场得到应用,然后迅速推广普及开来,从而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棉花生产再创新高,成为引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棉花产业的一面旗帜。

(责任编辑 萧 徐)

按需出版 征稿

本广告自去年7月刊出后,得到大家的热烈支持,纷纷来稿要求出版。现将有关基本情况告知如下:

适用范围:个人著作(小说散文诗歌自传等等);家庭、家族需要保存、传世的专辑、画册;出版社样书;印数在100册以下最合适。

三大优点:(1)解决由于印数少而不能出版的问题(50本起印);(2)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3)避免资金一次过多投入造成浪费。

资金投入:自费。以20万字288面为例,印制50本一般在4000元左右(黑白印刷,不含录

入排版校对封面设计)。详细报价可电话或信函咨询,亦可看去年本杂志第9第10期所登广告。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但不符合我国现行法规的不能出版。没有书号,不能销售。仅作为留世或赠送。印制质量:上乘。

我公司也可为作者联系其他出版社以传统出版方式出版印数多的著作。比如为企业、各级机关政府部门及作者在新华、华龄出版社等出版专著。

所有出版的图书均事前签订合同。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蓟门里小区北一楼5-203A,邮编:100088,热线:010-62359410(传真同),手机:13901158422 联系人:张三杰。北京地区上门服务,送书到家。本广告长年有效。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东北青年抗日中的 “一二·三〇事件”

● 董锐平

“一二·三〇”事件发生于1941年,是伪满政府对东北青年反满抗日组织的破坏事件。关于该抗日组织的政治背景,曾经引发一番争论,不明历史真相之人可能会将该事件与同时期发生的“贞星事件”相混淆,并将该青年组织误认为是国民党的组织,甚至在一些国民党人士口述的材料中也有此误解。近几年来,史学界的许多学者对“一二·三〇”事件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同时还有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著书立说以缅怀过去。其中以郑新衡先生所著的《一二·三〇事件始末——东北青年反满抗日地下斗争史事纪》最能够反映东北青年地下抗日活动以及“一二·三〇”事件的全貌。该著作将这个历史事件发展的整体脉络展现在读者面前,详细阐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东北爱国青年秘密组织的抗日活动,并拨开历史的迷雾,说明因“一二·三〇”事件而被日本人破获的抗日组织,并非是国民党的地下组织,而是由东北青年特别是爱国学生自发组建而成的。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东北地区一直就是日本侵略者垂涎的对象。日本人通过“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并将该地区变成其吞并全中国的以战养战的基地。敌人对东北资源的掠夺、对东北人民的奴役,激发了爱国人士的救国思想与抗日激情,在东北地区相继出现了许多地下抗日组织,其中就包括因为“一二·三〇”事件而被日本人破坏的左翼青年组织。

这个地下抗日组织没有明确的名称,在日伪档案被称呼为“左翼读书会”、“东北大众革命党”、“铁血同盟”、“全满读书会”等等。这个组

织的成员不是普通的东北青年人,而是由伪满政府培养出来的,伪满的财务职员训练所的学员为其主要成员。该训练所原名“经济部财务官吏养成所”,1937年成立时隶属于伪满政府经济部,一年后改名为“经济部财务职员训练所”,实为财经学校。这个训练所属于“官费”学校,不但不收取任何的费用,还为学生们提供优厚的待遇,每人每月发放二十元津贴。由于训练所的待遇优



《今日东北》月刊第二期封面



厚，许多出身贫寒但成绩优秀的学子汇聚于此。也正是由于学校提供了优厚的待遇，学生们有充裕的资金购买进步书籍，并通过读书交友等活动逐渐形成了抗日救国思想。

在训练所，学生们以读书会为主要形式开展思想交流活动，并逐渐扩大读书会的规模，准备成立组织严密而且目标明确的地下抗日团体。以青年学生为主要成员的秘密抗日组织的筹备工作，是在财职训练所二期毕业生陈树满的召集和主持下进行的。该组织的宗旨是“争取人们活着、继续活着、好好的活着”。学生们成立抗日组织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拯救日寇铁蹄下的中华民族，而是为了谋求全世界人民的解放。因此，抗日组织的纲领是“联合一切爱国力量，配合祖国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军阀、财阀，解放全东北！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关于组织的名称，大家出于不同的理由确定了以下五个：“东北青年复国会”、“东北青年救国会”、“东北青年铁血同盟”、“东北青年解放先锋社”、“东北大众革命党”。尽管对各个名称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大家都认为青年人是东北的希望，因此几乎所有的名称都冠以“东北青年”四个字。在1940年的端午节这一天，这个以财职训练所学员为中心的抗日组织的成立大会正式召开，李逢春、刘庆武、陈树满、王国贤、李金山、刘长青、

唐允武等十五人参加了会议。在与会的十五人中，有多人在“一二·三〇”事件中被捕。

抗日组织成立后，成员们致力于秘密图书馆的筹建工作，并继续通过读书交友的形式开展爱国思想的传播活动。同

时，组织者吸收更多的成员，壮大抗日队伍，并在东北的各个地区相继建立、发展了分组织。此外，该组织还积极地寻找内地的抗日组织。

1941年6月，作为该抗日组织主要成员之一的王国贤被伪首都警察厅逮捕。这件事是“一二·三〇”事件的导火索。在逮捕王国贤过程中，日本人发现了该组织的一些线索。此后不久，该组织的相关成员如李逢春等重要人士相继成为敌人的搜查、缉捕对象。为了进一步破坏东北地区的地下抗日组织，敌人还暗中派遣特务混入其中，这些特务后来成为日本人破坏该组织的帮凶。

同年7月，该抗日组织在长春的负责人之一刘荣久在马成龙的介绍下结识了朱广军（朝英）。朱自称是共产党黑龙江支部的军事负责人，骗取了刘荣久等人的信任。朱广军假装同意帮助刘荣久逃到华北，并要求刘在走之前能够在新京组织一个新的抗日团体。为此，刘荣久、马成龙等人决定建立长春地区的抗日组织——东北大众革命党，并吸收了张文芳、刘清臣等青年学生为成员。9月7日，刘荣久等人就组建抗日团体事宜召开了筹备会议，军官学校、新京工业学校、法政大学、新京医科大学的一些学生参加了会议。东北大众革命党是在原有组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在其名称、宗旨、纲领上有所体

现。例如，“东北大众革命党”是在原组织筹备大会上被提出的；“解放东北大众，建立理想社会”的宗旨也是由原组织制定但尚未实施的。由此可见，刘荣久筹建的团体是对原有组织的恢复与改进。但是，这个团体最终未能成立。在一周以后的会议上，准成员张文芳突然以组织抗日团体具有危险性为由，提议中止该项活动，并获得大家的支持。同时，刘荣久不再向朱广军提供有关抗日组织的情况。抗日团体的筹备活动之所以不了了之，是因为张文芳等人对朱的共产党人身份有所怀疑，认为他对社会主义理论不了解，因此，不但取消了筹备活动，就连有关抗日组织的情况也对他进行封锁，只有刘荣久、马成龙仍然与之保持个人联系。

在朱广军潜入长春地区抗日组织的同时，在齐齐哈尔，有五位参加了北满执委部的组织成员因“田白事件”而被敌人逮捕。

1941年9月20日，田中、白丸部队在兴安省莫力达瓦旗西线急袭了抗联三路军九支队的郭铁坚等十八人。日军在战死的郭铁坚身上搜到了密码文件。齐齐哈尔宪兵队以此为线索对抗联地下组织——北满执委部进行调查。该事件被称为“田白事件”。“田白事件”的直接结果是导致唐允武、张德邻、李德先、刘长青、胡振武等五名成员被捕。这五名成员是抗日组织的骨干，其中刘长青是哈尔滨地区的负责人。以刘长青为代表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是在1941年的8月间与“执委会”取得联系的，并且与其他学校的大学生及准大学生组成了“执委会”下属的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小组。

刘长青等人的被捕震动了刘荣久，刘决定离开东北去关内发展。为了防止刘荣久逃脱，内侦朱广军伪造中共指令，称自己将要返回黑龙江军事基地，要为军队招募志愿者。被蒙骗的刘荣久决定前往所谓的军事基地，以便为组织创造更多的抗日条件。

此时，单凭朱广军一个人已经无法从刘荣久身上套取更多的情报，敌人决定向抗日组织中增派内侦。在伪满治安部警务司的田端、大原事务官的指挥下，伪首都和哈尔滨警察厅向组织内部派遣了一名中共叛徒，进一步开展内侦工作。这名特务化名王福，伪装成中共中央东北特派员。

12月14日，王福与刘荣久、马成龙见面，向大家介绍了关内的抗日情况，并演唱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歌。王福的“表演”完全迷惑了抗日青年，大家对他的身份深信不疑。但刘荣久等人并没有完全丧失警惕性，他们对王福索要组织成员名单的要求予以拒绝，使敌人妄图消灭抗日组织的企图再次落空。

由于内侦王福未能顺利地从小刘荣久等人那里骗取抗日组织的成员名单，敌人决定假借召开会议之名将该组织成员一举捕获。16日，王福以研究东北抗日活动为借口，要求刘荣久召集其他地区的组织代表，在哈尔滨召开代表大会。为了使成员对王福等特务的信任，敌人在继王福之后又派出一名内侦——刘玉廷（或名刘玉章），此人伪装成王福的上级，即中共中央代表。12月19日，组织派遣马成龙为代表前往哈尔滨与这位所谓的党中央代表会面。21日，刘荣久、杨文革在朱广军、王福的陪同下会见了刘玉廷，这个内侦谎称要带刘、杨二人到中国即内地去。刘、杨二人向此“中共中央代表”询问了许多问题，刘玉廷利用自己对抗日形势的了解作了一一回答，骗取了他们的信任。

1941年12月30日，是该抗日组织在哈尔滨召开代表大会的日子。在此之前，刘荣久希望通过此次会议将东北各地秘密抗日组织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因此召集辽西、吉林、齐齐哈尔、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区的代表前来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会议当天，吉林地区负责人陈作师、辽西地区负责人齐九皋等人未能参加。30日上午9点钟，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共有五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另有一位与会者就是内侦王福。会上，“中共中央代表”刘玉廷作报告，王福作记录。中午时分，王福称到街上购买食物，半小时之后归来。正当众人准备用餐之时，七八名特务闯入，将与会者全部逮捕，其中包括刘玉廷。当时，与会代表还不知晓刘玉廷的真实身份，为他感到惋惜与抱歉。在这次逮捕行动之后，敌人对东北各个地区进行了大肆搜捕，将与该抗日组织有关的成员一一逮捕，只有陈作师、张秀媛等少数人得以幸免。此次日本人对东北地下抗日组织成员的逮捕活动被称为“一二·三〇”事件。

“一二·三〇”事件是以1941年6月组织重

要成员王国贤的被捕为起点的。敌人以此为线索展开调查,将目标锁定该组织在长春的两个负责人——李逢春、刘荣久,并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处理。逮捕李逢春,派遣内侦潜伏在李荣久的身边,以便获得更多的情报。敌人在迷惑刘荣久等人的同时,还以9月20日发生的“田白事件”为突破口,逮捕了在哈尔滨工作的刘长青等五名组织成员。最后,在刘荣久的身边,由伪满警察厅主持,以朱广军、王福、刘玉廷三名特务作内应,这个以爱国青年为主要成员的东北地下抗日组织在1941年12月30日被敌人破坏。

在“一二·三零三〇织破坏的事件。这个被称作“左翼读书会”的组织与国民党之间没有隶属关系。

首先,从组织的名称上可以证明。1940年,该组织筹备期间,筹备者提交的《章程草案》中征集了大家关于组织名称的意见,并最终确定了五个名称:“东北青年复国会”,因为东北虽然已经沦陷,但是全中国并没有灭亡,以此叫“复国”;“东北青年救国会”,表明东北地区的反满抗日活动是挽救中国的组成部分;“东北青年铁血同盟”,主张人们要以“铁血同盟”的精神反抗日本侵略者;“东北青年解放先锋社”,认为组织建立的目的在于抗日反满,更要致力于全民族的解放运动,使广大的中国人不再遭受剥

削与压迫,而青年人应该充当人民解放运动的先锋;“东北大众革命党”,提出只有工农劳苦大众的革命才能彻底消灭剥削、压迫。无论是组织的名称,还是确定名称的各个理由,都没有反映出该组织的筹办者有创建国民党地下组织的意图。既没有在名称中提及“国民党”的字样,也没有在确定理由中表明该组织要接受国民党的领导。

其次,该组织制定的宗旨与纲领没有仅仅着眼于反对日本侵略。筹办者将组织的宗旨确立为“争取人们活着、继续活着、好好的活着”,而没有简单的定位在“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或“收复中国失地”等口号上。筹办者认为,只是赶走日本侵略者并不能使全体中国人都能过幸福生活,中国人不但要摆脱日寇的奴役,同时也要摆脱国内统治阶级的奴役,成为自己的主人。在组织的纲领中这样写道:“联合一切爱国力量,配合祖国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军阀、财阀,解放全东北!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筹办者并没有将全体日本人民看作是中华民族的敌人,他们认识到日本人民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真正的罪犯是那些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势力与资本家,以此组建抗日团体的最终目的是谋求全世界人民的解放,其中也包括日本人民。在宗旨与纲领的内容中,体现了筹办者的一些共产主义思想,而不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

主义。从这一点来说,也不是国民党人士所能具备的。

第三,该组织的发起人及主要成员都是由“财职训练所”培养的青年学生,而不是国民党人士。在这个抗日组织成员当中,李逢春、刘庆武是一期学员,陈树满、陈作师、董春荣、齐九皋、徐连汉、王宪国等人是二期学员,陈树满、李金山等人为三期学员。在训练所,学生们学习日语,接受军事管理体制,日本教官对学生



伪新京监狱之极刑楼遗址,刘荣久烈士殉难于此

的日常生活和思想管理十分严格。伪满政府开办官费的“财职训练所”是为了培养伪政权的顺民与奴仆,但是却事与愿违,学校军国主义的高压管理,反而促使青年学生走上抗日道路。这些学员利用训练所提供的条件为自己铺设革命道路,从而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掘墓人。该组织的成员除了训练所学生之外,还吸收了东北其它地区的爱国青年人,并特别注意在学生中间发展新成员。这个组织在成立之后的六七个月间,得到迅猛发展,人数增加了七倍之多。其中除了“财职”四期学员之外,还包括新京医科大学组、新京工业大学组、哈尔滨工业大学组等。至于其他地方组织更是数量繁多。这些成员大多是青年人,由大学生、社会职员、教师、伪军官、工人、家庭妇女等各类人群组成,成份十分复杂。目前尚没有资料显示在这些成员当中有国民党人士,即使有,也改变不了组织的性质,即不是国民党的地下组织。

第四,在财职训练所学习期间,学生们利用学校提供的津贴购买进步书籍,主要是近代左翼人士撰写或翻译的作品。其中既有中国作家的著作,也有外国作品。在中国的作家当中,鲁迅先生的《坟》、《呐喊》、《彷徨》等,茅盾先生的《子夜》,巴金先生的《家》、《春》、《秋》等,老舍先生的《赵子曰》、《老张哲学》、《骆驼祥子》等书受到学生的欢迎。苏联、法国等国家作品也在学生之间争相传阅。此外,学生们还特别关注社会科学著作,例如邓初民的《社会进化史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陈志远的《哲学基本问题讲话》、《新经济学大纲》;钱亦石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史》;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讲演集》、《实业计划》、《建国大纲》等书。这些书籍揭露社会黑暗、宣传革命思想,成为爱国青年学生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们宣传救国思想的有力武器。进步书籍加深了学生们对中国社会以及帝国主义的认识,使他们的革命思想跳出了简单的民族主义的局限,逐渐向社会革命的领域飞跃。这种质的飞跃是只有作为无产者的青年学生才能够实现的。

第五,虽然该组织的成员一直在积极地寻找关内的抗日组织,但是从来没有与国民党建立真正的联系,更没有得到过国民党的具体帮助。这

个由东北青年组成的地下抗日组织成立伊始,就开始以各种方式谋求与关内抗日组织取得联系,并与一些“祖国派来的人”进行过交往,例如石墨堂、魏忠诚。1940年端午节组织的成立大会上,董春荣曾经提到过石墨堂。同年夏天,石墨堂两次去哈尔滨,与当地的负责人董春荣、刘长青交谈。董、刘二人认为此人思想保守,并且挥霍浪费,是不可能革命的,因此不再与其接触。8月,陈树满向长春地区成员汇报关于魏忠诚的情况。此人自称是“祖国政府派到东北来的”。组织决定派李金山、王国贤、高德生和陈树满四人赴沈阳会见魏忠诚。经过一番详谈之后,陈树满等人认为这位“祖国派来的人”什么办法也没有,也许是冒牌货,不用对他抱有希望。与该组织进行接触的石墨堂与魏忠诚二人的确是国民党人士。据日伪档案中介绍,石墨堂是在“九·一八”前参加的国民党,曾历任奉天党部委员、伪锦州省政府教育股长、东北协会在东北的负责人,以及东北调查室主任等职务。至于魏忠诚,其真名罗庆春,又名罗大愚,1937年抗战爆发,当时在日本法政大学留学的罗庆春与东北留学生张宝慈等人成立“抗战联合”,开展抗日活动。1940年春,罗庆春成为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返满,组织反满抗日团体——东北抗战机构。该机构虽然鼓励和引导东北青年的抗日活动,但是却相当排斥左倾思想。在石墨堂、魏忠诚之后,未曾有相关的资料显示该组织与其他国民党人士取得过联系。在向国民党寻求援助而未果之后,刘荣久等人相继与所谓的共产党人取得了联系,即朱广军、王福、刘玉廷三人。虽然这三个人是敌人打入组织的内应,并直接促成“一二·三〇”事件的发生,却表明这个东北抗日组织并不是一个隶属于国民党系统的团体,否则是不会被朱广军等人所欺骗的,也就不会出现“一二·三〇”事件了。

这个被敌人在日伪档案中称为“左翼读书会”或“全满读书会”的秘密抗日组织,既不是国民党的、也不是共产党的下属组织,而是由东北爱国青年为了实现国家与民族的解放,自发建立起来的。该组织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政治背景,但是,它对东北抗日运动乃至中国抗战的贡献是无法抹煞的。

(责任编辑 萧 徐)

胡风与王实味冤案引出的同类教训

● 郑文林

近读当年胡风蒙冤的有关书籍和文章，不禁想到早他八年、遭遇同类冤案的胡风北大同学王实味。两人蒙冤过程虽有不同，但所受劫难的性质和原因，及其给我们的教训，却有许多一致之处。

胡风（张光人）和王实味是1925年夏天进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学习的。但同学只一年，胡风便转去清华大学英文系学习；三个月后，又离开清华回湖北老家了。1929年秋，胡风去日本留学，开始了文学活动和革命活动，1933年被驱逐回国，在上海从事进步的文艺活动。王实味在北大也未读完全程，他于1927年年底辍学回河南老家，先后在南京、上海和开封等地卖文、教书为生，并从事文学活动和革命活动。1937年9月，王实味携范文澜的介绍信去了延安，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从事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胡风、王实味相继离开北大后，除1932年在上海有过短暂接触外，两人彼此联系不多。1940年开始的“民族形式”论争，倒使这对同学分别在重庆和延安有过一次文字“接触”。

“民族形式”论争始于当时向林冰（赵纪彬）的一篇文章，中心是主张以“民间形式”为创造中国新文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向的主张得到当时文艺思想界一些人的赞同。胡风从捍卫五四新文学出发，坚决反对这种主张。认为现实斗争和革命的内容才决定形式，不能简单“旧瓶装新酒”。胡风为此写了长文《论民族形式问题》，还编了《民族形式讨论集》等，不仅对向林冰进行批评，还对支持和同情向的观点的郭沫若、周扬、艾思奇、胡绳等知名人物也“直率”地进行指名批评。

这场被有些思想史家称作“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之一的论争，不仅波及重庆，也波及到延安思想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风的同学王实味也参加到论争中来，他写了《文艺形式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一文。在这场论争中，王实味基本上站在他的同学胡风一边。他“大体同意”胡风的观点，认为胡风“在基本上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著了相当的劳绩”。他也和胡风一样，在文中“直率”地点名批评了陈伯达、艾思奇等人的观点。不过他从爱护老同学出发，也指出胡风在该问题上有“过左的偏向”和“傲慢气概”。他要老同学“能更虚心一点”。最后，王实味写道：“沪上一别，十载未通音讯，故人大概不至以我底直率如昔为忤吧？”

“民族形式”论争，本是一场学术观点之争，但在当时的情势下，这场学术观点之争慢慢渗进了政治立场和政治内容；尤其胡风、王实味这对北大同学在论争中“率直”地指名道姓，得罪了当时思想文艺界的主流派，这和他们以后相继在政治上罹难，不无影响。

就在那篇民族形式讨论文章发表后仅一年，王实味便因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野百合花》一文，而成了当时延安

整风运动中的“思想斗争目标”；继而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座谈会上又成了“政治斗争目标”——托派分子。这是陈伯达在会上首次提出的，他揭发说王实味“掩盖了托派的历史”，“这个人不只是限于保存托派思想的人，而且还是进行托派活动的人。”原来，当年王实味、胡风的北大同学中，有两人即王文元（王凡西）和陈清晨（陈其昌），后来成了托派，王实味在上海时都偶然地遇见过他们，有过短暂接触和来往。王实味一到延安，便主动向组织交待过这一事情。现在要把王实味这个“目标”彻底打倒，光凭《野百合花》这篇文章是不够的，于是便抛出了王实味的“历史问题”——托派，“托派分子”帽子一戴，王实味便由同志变成了敌人。结果是王实味被开除党籍，并被长期关押。

最后抛出“历史问题”把斗争对象打倒，这成了后来历次政治运动和“大批判”运动，特别是“文革”运动中屡试不爽的手段，也成为一种运动“模式”，从作家胡风、丁玲等一直到国家主席刘少奇等，无不如此。其始作俑者，盖为王实味案。

王实味案，当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还起过一点“历史作用”，这就是由此案使中共最高领导者对解放区的干部队伍和知识分子队伍的估计产生误判，使整风运动一度转入“抢救运动”。

就在揪出王实味不久，中共最高领导人就在一次讲话中说，在中央研究院发现了王实味是托派，他号召大家“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人”。不久，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审干”的决定。其结果就导致了使整风运动一度转向的“抢救运动”，延安曾经一度“特务如麻，到处都有。”（胡乔木语）好在中共最高领导很快就发现了这一错误，并制止了“抢救运动”的发展，对受冤者给予甄别平反。然而，由整风运动导致“抢救运动”的起因案件——王实味托派案，

却没有得到平反。

1947年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王实味被押着转移，在山西兴县一处山隅里被秘密处死。此事毛泽东事先并不知情，当他听到这一消息后，大为震怒。他拍了桌子，指着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林老，你还我的人！”当然，林伯渠同此事并没有什么关系（见《杨尚昆回忆录》）。直到建国后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在念叨这件事：“他（王实味）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

在王实味身上发生的文祸冤案，八年后的1955年在他的同学胡风身上又重复出现，而且规模更大，变成了以胡风为首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最后酿成建国以来一场最大的文字狱。

有人说胡风罹难，也是由一部文字——《三十万言书》所致。也有人说，决定性的是舒芜的交信行动。实际《三十万言书》只是导火索，“交信”只是定罪所需的“由头”。和王实味不同，胡风罹难有很长的历史原因。

从上世纪30年代“左联”开始，胡风便因



胡风与夫人梅志合影

和鲁迅的关系、“两个口号”之争,以及“典型问题”、“民族形式”之争等,和中共党内后来掌管文艺的主流派成员观点相左,产生过争论,彼此关系存有芥蒂。以后在重庆、香港,又因为胡风的文艺理论观点——“主观战斗精神”,以及他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过某些看法,于是遭到主流派的几次批判。建国后,因这些分歧,加上条件的变化,文艺主流派变成了文艺当权派,对胡风的批判,更是不断并加剧。胡风和王实味一样,也是一个在观点上“死不悔改”的人,但他毕竟是一个文人书生,他天真地以为最高领袖和党中央在了解了他的观点和情况后,是会支持他的。于是在文友的支持和帮助下,胡风撰写了《三十万言书》,递交给党中央和最高领袖。他在文中详细叙述了他的文艺观点和看法,反驳了论敌对他的批判和攻击,提出了他对文艺工作的建议。

据《陆定一传》(陈清泉等著)转述陆定一的话说:毛泽东对胡风的案子“非常重视,特别是看过胡风30万字的报告以后,更加恼火”。于是,形势急转直下。这时,正缺少一个“草船借箭,只欠东风”的“东风”。于是敏感的舒芜便应运而出,向上面交出了胡风历年来写给他的信件(对于是否叫“交信”,舒芜还有不同看法和解释),并按当局的意图辑成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其中“反党集团”是后来毛泽东所加,舒芜原写为“小集团”),并公布全国。于是,胡风及其文友由同志一下子变成了敌人。以后,随着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反党集团”又改为“反革命集团”)的公布,一场大规模的批判和肃清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全部成了阶下囚。有正式材料说,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的有78人,涉及两千多人,实际株连者无以计算。

和八年前最后定王实味罪行时一样,最后定胡风及其“集团”罪行的,并不是《三十万言书》之类的文字了,也是“历史问题”,即“反革命历史”。三批材料及其按语说:胡风及其“小集团”已不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

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为任务的。”

历史的重复还有,和八年前王实味案后搞了一个“审干”和“抢救运动”一样,“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出来后,也使最高领导对建国后的干部队伍和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产生误判,随即在全国干部、知识分子队伍中搞了一次“肃清反革命运动”,党政军机关和文化教育单位相继成立“五人小组”,清查胡风“分子”和“历史反革命”,也搞得“人人过关,个个恐慌”。这不仅使胡风一案株连面更为扩大,伤害了一大批干部、知识分子,而且为不久打出新的“反党集团”(如“丁陈反党集团”)和发动新的更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反右派运动,埋下了伏笔。

酿成这两起文祸冤案的原因是复杂的,远不是一句“文化专制主义”所能概括。有的史家探讨,比如认为当年延安处于日寇、国民党的包围封锁之下,容易造成夸大敌情,甚至不分敌我而酿成王实味托派案;建国初期敌我斗争状况,也易使最高领导产生“不拿枪的敌人”还在大量活动,从而酿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等等,但笔者认为还有两个原因值得一提。

一个是把文艺学术问题政治化。五四以来的文人知识分子强调“独立人格”,他的学术观点或政见,有一些往往与党的领导人的观点或政策不同,甚至有偏颇还坚持己见。王实味、胡风就是这类知识分子。历史的可悲处在于,王实味、胡风还不是政治敌对者的知识分子,而是自己营垒内的知识分子。王实味是共产党员并去了延安,胡风虽不是党员没有去延安,但也是政治上有名的进步文人。他也服膺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他们在和“论敌”论战表述自己观点时,还不断引述毛泽东的话语和观点以证明自己的正确。然而,他们还有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见,并坚持这些观点和政见,不肯轻易放弃。而当时党的领导人往往不能容忍这些“自己人的”学术观点和政见的存在,视之为“错误观点”;又片面夸大它的“政治”作用,把它和自己当时所从事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政治活动相挂钩,使其由文艺学术问题上纲为政治问题,最后用行政甚至专政的手段来加以解决。王

实味、胡风两案都是由此酿成。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在总结这一教训时说得好：“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做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脚的。”

一个是个人性格因素。王实味的同学和朋友说王实味“孤傲”、“好走极端”，对人“用词尖刻”，“固执己见”等等。这种性格使王实味到延安后，成了延安几个“有名的怪人”之一，和同事、上级关系紧张。这从导致王实味罹难的《野百合花》一文中也可看到，片面、夸大的事实排比，再配以尖刻的言辞，其给领导和读者造成的不好感觉和印象是可想而知的。这种性格又决定他后来的对毛泽东派胡乔木来帮助他、中央研究院开始对他的批判帮助会，一概采取排斥态度，毫不领情，拒不认错。这种性格决定的态度，其政治后果是可以想见的。

这一性格因素，在王实味同学胡风身上也同样存在。鲁迅曾说“胡风耿直，易于招怨”；又说过胡风“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的话。胡风的朋友反映胡风文学“派性”强，“热情内涵”但又“嫉恶如仇”，对不喜欢的人“爱冷冷地说几句讽刺话，又是毫不留情的”等等。这在胡风给他的亲密文友的信中就有强烈的表现。这使胡风既得罪了当政者，又得罪了不少文人作家。因此，当政者一旦公布了

他的“密信”（虽然是片面摘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便引起了“众怒”，形成了“众口一词”的批判。这不能不是胡风罹难的一个重要性格原因。

一位智者说“性格决定命运”，信哉斯言。当然，这只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如此。因为导致这两起文祸冤案的，主要还是当时客观的社会政治原因。

不过，比起王实味这位老同学来说，胡风还是幸运的。当年胡风看到报上公布说他的“反革命集团”材料和“按语”后，已感到问题的严重，并作了最坏的打算。他曾对路翎说：“我可能被枪毙，而朋友们，你可能是长期徒刑。”然而，胡风其后虽历经苦难，但最终并没有被处死，而是被判了无期徒刑。这要得益于他的老同学王实味被处死后，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和批评，因此规定了对他这类案犯一般“不杀”的政策。更为幸运的是胡风在被关押二十多年后，终于能1977年得到释放活着出来，并于1980年庆幸地得到初步平反，恢复了他做人的尊严和地位。

这不是胡风比王实味命好，而是中国的政局发生了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四人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88年胡风在逝世后更获得了彻底平反；他的老同学王实味也在1992年得到了平反昭雪。

（责任编辑 萧 徐）

（上接 64 页）化水平越来越高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肚子都吃不饱。河南农民说：“富的穷了，穷的没富起来。”另外，农村有河，农民看到的都是小河里的水流到大河里，大河才满的；没有见过一条大河里的水是倒过来向小河里流的。因此，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讲的那个道理，讲一万遍，十万遍，也没用。那时有一个理论，说农民不会自发产生社会主义，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思想的灌输才行。可是讲“大河有水小河满”这种道理，硬是灌不进农民的脑壳里去。因为它不是真理，是笑话。

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批判彭德怀副总理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之前，中共中央副主席

朱德在中南组的会上发言说：“农民想富，要使之富起来，不会成为富农路线，这是关系五亿人口稳定的问题。”（见李锐《回忆庐山会议》一文）朱德的话算是说到农民的心坎上了，农民要是听见了，会举双手拥护。可惜他们听不见，当时朱德说了也不管用。

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就拿常识性的错误道理当真理来没完没了的教育农民几十年，这实在值得我们深思。类似的事可不止这一件。这是个什么问题呢？老百姓会笑我们，外国人会笑我们，历史会笑我们。我们当时做出这种事，不是可悲又可怜吗？

一个宣传了几十年的错误口号

● 冯东书

在中共“十六大”期间,中央电视台请专家讲解“十六大”精神,在讲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讲了家富才能国强,其中提到一句“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这使我十分感慨。

1961年春天,当时新华社各省分社同时是《人民日报》的记者站,我作为山西分社的农村记者到《人民日报》实习当半年编辑。那时为了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让农民热爱人民公社,稿子里常出现“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句话,意思是只有把人民公社办好了,公社社员家才能富裕起来。当时有六个分社的农村记者在《人民日报》农村部实习。我就听到一名分社农村记者向一位农村部副主任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话不对。天下哪有大河有水小河才满的事呢?不都是小河有水大河才满的吗?以后不要这样说了。”那位副主任说:“你说得好。”但是以后,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地报纸、广播上,在农村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在广大农村的群众会上,仍然不断地在向农民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句话讲起来上口、好记、形象化,说来说去,使它在当年的普及率之高是少有的。它的生命一直持续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人民公社在改革中散了伙,才消失掉。但是公开反过来讲“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我是在“十六大”才听到。

“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句话,是在1956年全国“合作化”以后,在当时的政治需要下应运而生的,很快就成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的经典比喻。

都没有人看出这是一句常识性的错话吗?当然不是。但是由于它是当时解释公与私之间,农村公有经济和农民之间关系的政治性语言,在一切强调公有化的时期,你非说只有小河有了水大河才能满,那不是在反对党的路线吗?不是说只有农村个体发家致富了,公家才能富吗?这还了得。人们犯不着为这么一句话去冒风险,宁犯常识性的错误,不犯后果严重得多的政治性错误。我记得曾有人想改一下,改成“锅里有了,碗里才会有”,但终因不如原来的话上口、好记,没有扭过来。这也可能和那时人民公社的锅里饭不够吃,锅里没有,有关系。

用这种话对农民进行教育,农民信吗?农民不信。这句话教育了农民几十年,农民一直要求“包产到户”,压下去冒起来,再压下去,再冒起来,直到硬是人民公社拖垮为止。当时也正因为农民不信,才反反复复地向农民说。过去中国农民最想念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呢?是土地改革以后,“合作化”以前。他们觉得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他们有了土地,有了耕畜,可以开始盘算怎么发家致富了。但是自从1951年春山西办起第一批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全国农村统统办起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叫“合作化”),到1958年农村一阵风都办起规模更大的人民公社(当时叫“公社化”),广大农民的耕地、耕畜都从手里飞走了,归了公。从那以后,农民一直没有感觉到公有(下转63页)

从陈播的一封信 看《苦恋》高层争论

● 徐庆全

1979年9月出版的《十月》第3期上,发表了白桦写的电影剧本《苦恋》,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彭宁据此摄制的电影改名为《太阳和人》,在1980年底完成。

从剧本发表的1979年9月到1981年10月,围绕这部电影持续了两年的争论,并在文坛上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现今留存下来的时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播的一封信(此信为私人所藏,未曾公布),揭示了关于这部电影最初争论的一些情况。现将信转录于下,并结合当事人的回忆及相关材料,略作解释。

陈播致贺敬之、李英敏的信

敬之、英敏同志：

昨接文艺局的同志来电话,询问长影拍摄的《苦恋》的情况,就我了解的向部报告如下：

我们看的文学剧本,是一九七九年五月“长影”印的,还有十月印的分镜头剧本。我

是昨天找来看的。分镜头剧本与文学本略有不同。

作者是白桦、彭宁二同志。此片已由厂里决定开拍了。

作者是想写一个在旧中国出身穷苦家庭的青年画家,飘流海外,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到祖国,想献身祖国,受到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的故事。“苦恋”在剧情中写在他的一生中恋爱生活的苦情,也含意他对祖国热爱而“苦恋”的双关语。

我找了几个看过剧本的同志谈。认为：

一、这个剧本想写“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剧中不仅写了对画家晨光一家的迫害,还有对诗人、教授的迫害,逼迫他们过原始人野人的生活,只能长期隐藏湖荡吃生鱼、鸟蛋为生。写了画家一生,热爱祖国、忠贞不渝、坚强不屈的性格。从这点说来,有一定意义。

二、作者在探索“电影诗”,追求电影所表达的一种新的样式和风格,这种想法也

是好的。

三、作者想通过艺术形象隐藏着自己的倾向,而不是说出来的,这种艺术探索是可取的。

四、对于剧本有以下几点看法：

1.整个剧本的构思与艺术形象的表现,使人感到在影片拍成后是悲怆的情调,这个剧本没有反映出“四人帮”横行前,党对于知识分子总还是重视的,(虽然有“反右”扩大化的问题),归国华侨中有许多人、许多知识分子是受到重用,也发挥了他们的为祖国服务的才能。这个分镜头剧本在结尾,写了晨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雪地里爬行,寻找他的人们发现他时,他已经是在一个大问号的那一个点上冷却了身体,他用两手尽量向天空伸去,两眼睁着……这和文学剧本开头引了屈原的《天问》篇的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相呼应的,这样表现是不好的,使人感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晨光却死去了,是为什么?

没有解答,令人难以理解。

2.这个剧本大写雁在天空写成人字,从开头贯穿到晨光的死去,最后结尾是“一枝芦苇在风中晃动着,坚强地挺立着……”这种寓意是很含蓄的,放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晨光死去了再现的,更加深了对死的渲染,这种手法也是值得深思和推敲的。

3.整个剧本所描写的,由于采用“电影诗”的手法,对于年代、时间,虽有所表现,但是,有许多使人看不明白,如晨光到天安门前贴一张屈原《天问》的画,背景是“白花山,白花海……”只能使人联想“四·五”事件;粉碎“四人帮”前后也是分不清的,还有一些其他情节不一一说了。

4.据说长影对这个剧本,有不同意见,导演彭宁同志曾将拍过的两本样片,请夏衍同志看,夏衍同志因看其他影片,稍看了样片,夏衍同志说,我未看过剧本,不好发表意见。(看过样片的人认为,样片的调子低沉,主人公晨光是在雪中爬行,最后死掉,脚手朝天,有人打了火把来找他)。

最近文化部即将举行优秀影片授奖大会,我们想将各厂来的领导同志留几天,专门将这一类剧本讨论一下。看作如何处理为好。

陈播

4月24日

中宣部意见:修改不好电影剧本,就不要拍

根据《苦恋》改编的电影《太阳和人》,是中国人耳熟能详却没有看过的电影,介绍这部片子,还得根据文学剧本《苦恋》。

剧本写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在旧中国,少年凌晨光虽家境贫寒,但很有才华,得到不少人的器重,生活上也处处得到人的照顾。青年时,被国民党抓壮丁,被船家女绿娘搭救,彼此相爱。后来,凌晨光因参加反对国民党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特务追捕,逃到国外。在美洲的某个国家,他成为著名的画家,享受着有别墅、汽车、画室的豪华生活;绿娘也来到美洲,有情人终成眷属。祖国解放后,凌晨光夫妇返回祖国。在轮船驶入祖国领海看到五星红旗之时,他们的女儿降生了,并取名为“星星”。回到祖国享受了短暂的快乐时光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凌晨光一家的命运,如同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堕入谷底:全家人被赶到没有窗户的昏暗斗室。在凌晨光生日那天,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女儿星星觉得在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容身了,决定和男朋友到国外去。凌晨光表示反对,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法回答。此后,凌晨光被迫逃亡,藏身芦苇荡,成为一个靠生鱼、老鼠粮生活的荒原野人。剧终时,雪停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经燃尽,他用最后一点力量,在雪地里爬出

“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

早在电影剧本发表后,就引起了文艺界的争论,也引起了中宣部的注意。时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听到这些争论后,给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的王阑西副部长和陈播写了信,要求他们关注这部影片的情况。陈播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

王任重先是听到有人向他反映情况,等看过样片后,他给王阑西同志和我写了一封信,说到正在拍摄的这个片子的问题,要我们关注。我把样片调来看了,果然像王任重所说的一样,我们就很重视。(2002年7月10日采访陈播记录。以下所引陈播的回忆均源于这次采访,不再注明。)

陈播的这封信,是就王任重的询问,给当时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的贺敬之和副局长李英敏的答复。

4月28日,贺敬之将陈播的信转给王任重:

任重同志:关于影片《苦恋》的情况,文化部电影局的陈播同志写了这个情况和他们处理的意见。我建议你、周扬同志和我们一起调看一下这部影片的样片。可否?请批示。

当天,王任重批示说:

敬之转周扬同志,这部片子我看不要演,如看也可以看一下,请夏衍同志也看看。

5月17日,周扬让秘书露菲转告贺敬之的秘书张作光:调《苦恋》看一次,看时要把夏衍请上。

周扬等人什么时候看的样

片,没有材料。5月21日,王任重与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一起看了样片,“大家都反对拍这部电影”,但是,显然也有人提出了修改后拍摄的意见。所以,王任重告诉王阑西和陈播,“修改不好电影剧本,就不要拍。”(1981年8月25日王任重致周巍峙的信)

修改过程中的争论

根据这样的意见,文化部电影局便开始组织修改这部影片。陈播回忆说:

我们专门研究了剧本和分镜头剧本,帮助导演分析剧本中所存在的问题,说服他进行改动。导演彭宁思想不通,但口头答应改。为了能修改好电影,我们让丁峤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去,把我们的意见转达给长影,让长影修改,并要求他们拿出书面的修改意见,报文化部。长影接受我们的意见,写出了修改意见给我们。我看到他们的修改意见后,又报中宣部。中宣部同意按照修改意见拍摄。

可是影片完成送来审查时,我们发现,基本没有按照修改意见修改,只是将结尾凌晨光趴在大问号上改掉了。我第一次看这部片子时,白桦、彭宁也在。他们让我马上表态。我说:现在我不好表态,因为你们没有按照修改意见修改。我还要报告中宣部,报告王任重同志。

王任重同志接到我们的报告后,很慎重。他提议,请中央党校和军队的同志们来看

看,王任重同志的意思是,让这两部分观众来说服白桦,对影片进行修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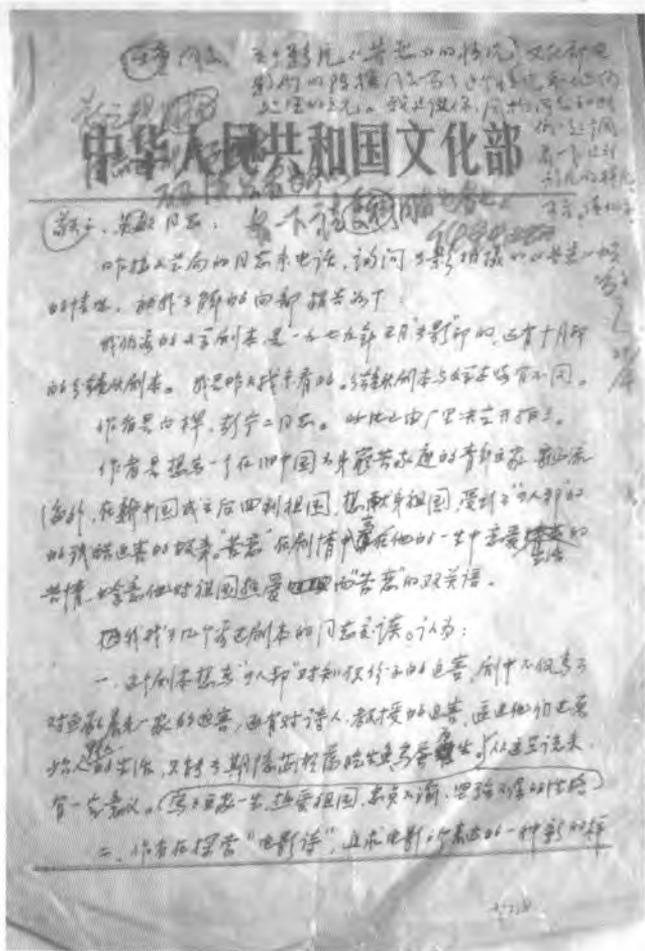
在此期间,白桦和彭宁又找到电影家协会,借了放映间放映该片,寻求支持,看影片的有七百多人,还有外国人。看过的人都说好,感觉是在替知识分子说话。

影协的林杉同志对这部片子很看好,他召集了一个座谈会,大概是在1981年1月份,要我去参加。我当然不便参加。中宣部文艺处的一位女同志去了。她回来后向中宣部作了汇报,也向我讲述了座谈会的情况。座谈会上都说好,这就造成了一种声势。这样,这部片子就不但是送审的问题,而且变成了文艺界关注的问题了。

陈播所讲的白桦和彭宁找电影家协会的事,林杉在1981年8月召开“首都部分文艺家学习小平、耀邦同志关于思想战线问题重要指示的座谈会”——为叙述简便,简称“思想问题座谈会”——的发言中也谈到,可与陈

播的讲述相印证:

电影剧本《苦恋》在刊物上发表后,未引起影协一些同志的重视。影片《太阳和人》的样片,电影局审检后,按惯例为中国电影家协会放映了一场。后来按白桦、彭宁的要求,又加映了一场。这一次白、彭还邀请了一些外国人来看,事先我不知道。放映后,《大众电影》编辑部应白、彭的要求,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开会那一天,编辑部通知我去主持。会议中途,我有事退席了。后来得知,会上除了一两位同志委婉地从政治上指出影片的问题外,其他发言大多是肯定这部影片的;又听说白桦即席赋诗并朗诵,对大家的支持表示



感谢。我了解这些情况后,当时并未引起注意,而是认为对一部影片可自由讨论,各抒己见,看不到一片叫好声是当前社会思潮的反映,因而没有采取补救措施。后来才知道,白桦、彭宁利用这个座谈会,对影片的支持,到处宣扬,并向电影局施加压力。(见《会议简报·林杉发言记录》)

参加过这次座谈会的原《电影艺术》的副主编罗艺军,对陈播所提到的中宣部有人参加会议也有印象。他告诉我:

我记得中宣部文艺局参加会议的是两个同志,一男一女。女的我记不清是谁了,男的是梁光第。我在会上有一个支持这部片子的发言。散会时,梁光第还跟我打了个招呼,谈及我的发言,还是表示支持的态度。(2003年1月26日采访罗艺军记录。以下所引罗艺军的回忆,均源于此次采访记录,不再注明)

关于这次座谈会的情况,我曾想方设法想找到会议记录,但是没有成功。这里,只能引用陈荒煤在“思想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对此次会议的介绍:

最近,我重新看了《大众电影》编辑部去年底、今年初召开的一次座谈会材料,很吃惊。参加座谈会的,有我们电影界的评论家,比较优秀的导演和写过很多好剧本的编剧。尽管会上对这《苦恋》有两种不同的分析,但不少同志对影片作非常肯定的支持和表扬。如,有同志说:这部影片“在思

想上是振聋发聩”,“艺术上是标新立异”。有的导演讲:粉碎四人帮后,这是一部最新最完整的影片。有的编辑说:凌晨光就是影片编导者的形象。如果不是强烈的热爱祖国,写不出这样的作品,影片的编导像凌晨光,像屈原一样爱国。有的评论家说:画家的悲剧命运,牵涉到“四人帮”的罪恶,领袖的错误,群众的愚昧,人的异化等问题。有的人赞扬影片用大雁把“人”字写在天上是“诗化的主题”,就是要恢复人的尊严,艺术的尊严。一位导演说:影片的结局改变了凌晨光作为一个大问号趴在地上这一幕,很可惜。他责问:我国出现了这场大灾难,难道连划一个问号都不可以吗?一位评论家说:影片的主题是人性的召唤。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对待画家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导演彭宁同志说:一般影片都出单主题,而这部影片是多主题——热爱祖国和中华民族;歌颂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一代苦恋者,歌颂他们的向心力和凝聚性;要从这一代人的悲剧中找出历史的教训,使这些历史不再重演;歌颂人的尊严、生命、自由、价值和奋斗;反对现代个人迷信。白桦同志说:这部影片是他写电影以来和他原来的文学设想最接近的影片,是他看自己的影片第一次流泪的,有好像看到了自己生的孩子有点像自己的那种感受;影片写的是艺术家短暂的一生,而意图是概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映人和

历史的关系。他还说:开始创作这个剧本时,他就想到我国伟大的诗人屈原,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都是九死未悔的。他引用了《离骚》的话:“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九死未悔”,很深刻、很形象地反映了我们的肝胆;凌晨光命运的客观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见《会议简报·陈荒煤发言记录》)

在陈荒煤讲话的8月21日,已是对《太阳和人》口诛笔伐的时候,陈荒煤对这次座谈会的介绍,当然是作为对这部影片批评的材料依据来看。

《太阳和人》为更多的人所观看,是在1981年1月由《电影艺术》、《大众电影》两家杂志联合召开的“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上。这次会议是在1月5日召开的,地点在北京体育学院的留学生楼。会议的组织者之一的罗艺军谈及了有关情况:

这次会议邀请电影界编剧、导演、评论工作者为主的一百多人参加,会期两周。之所以选择新年伊始为会期,基于两个因素:一、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观摩1980年的部分较好的新片,从评论具体作品再归纳出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头年底正是影片杀青之际,年初开会正逢其时。二、在生产第一线的导演艺术家,往往在年初处于旧作完成,新作尚未上马之际,正好有一段空闲能够与会。

会议的前半截气氛开朗而活跃。许多多年来未能谋面的

朋友，互诉衷肠。对影片的讨论，是自由论坛，求同存异。会议主旨标明“民主、争鸣、团结”，由于大家刚刚从“文革”及其后的两个“凡是”的阴影走过来，因而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左”倾向。谢晋带来他的新作《天云山传奇》，引起与会者的很大兴趣。谢晋介绍，影片正在送审，前途未卜。因为有一

种意见认为影片“美化右派，丑化党的领导”。在这个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支持谢晋，认为《天云山传奇》是一部佳作。

参加会议的白桦和彭宁带来了电影《太阳和人》。在会上放映后，马上成为会议的焦点，并引起重大分歧。多数人对《太阳和人》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态度，有的给予很高赞扬，认为影片深刻地批判了现代个人迷信，并真实地概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我当时任《电影艺术》副主编，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之一，也作了一个基本肯定性的发言，认为影片在美学上有突破。当然这纯属个人意见。

这次会议虽由两个杂志出面，实际上是中国电影家协



1985年，胡耀邦接见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代表时与白桦握手

会主持的。代理影协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林杉及另外的几个书记处成员，一直坐镇并起决策作用。这次会议也受到上级领导的关注，林杉同志和我每隔两三天都要赴周扬同志寓所，向他汇报会议的动向。

在这次座谈会“一直坐镇并起决策作用”的代理影协第一书记的林杉（影协第一书记袁文殊因病住院），曾有一个肯定该片的发言。在“思想问题座谈会”上，8月24日，他在检讨中谈到发言的内容：

我在发言中曾肯定该片，认为它是80年的好影片之一。发言时，我虽声明不代表影协，但仍造成影协支持该片的印象。这一点我应检讨。事实上，影协领导核心未讨论过该片，也未取得一致认识，有些

主要领导同志对它也持否定态度。我的发言实际上给了这部影片支持，我承担责任。至于有的同志说这个座谈会为了掩护《太阳和人》，有意推出另一些影片加以批评，这个情况不存在。

我当时之所以肯定该片，首先是从艺术上引起的。最初的印象，是影片有点精雕细刻，与一些粗制滥造的不同，又错误地认为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作品，不能用现实主义手法去规范它；还认为它是一部意念电影，固然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创作方法，但可有一席之地。在影片的内容上，又错误地认为它是反映现实的，只是反映得不够准确。因此，没有很好地去考虑影片的社会效果如何。（见《会议简报

林杉发言记录》)

在这次检讨发言中,林杉还透露,影协“党的领导小组五位成员中,三位对《太阳和人》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同罗艺军的印象一样,林杉也认为,“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上,多数同志肯定该片,有的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会出现一边倒现象”,“经做工作,才有一位珠影的同志发言,基本否定该片”。

为什么在“一边倒”的情况下,还要“经做工作”让人说出不同意见呢?罗艺军告诉我:

会议上确有一些对影片持批判态度的人,可一发表意见就被赞扬派的人打断,形成一边倒的趋向。这里的原因有会议的气氛问题,但更主要的是白桦和彭宁的态度。白桦和彭宁对这部片子是下了功夫的,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珍惜。他们也都属于狂放的人。在片子放映后,有人也说出过不同意见,但是,在白桦和彭宁看来,这就好像说他们的孩子不好一样,他们不大能接受。换句话说,给影片提出意见的同志是少数,往往会受到白桦和彭宁以及与会者的反驳。我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之一,觉得这和会议的主旨“民主、争鸣、团结”不合。为此,我们还去说服动员持批判态度的人在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可无人愿意再充当这种角色。

到了会议的后期,人们听到了对《苦恋》要批判的传闻。因此,主持会议的人似乎有些手足无措了。罗艺军回忆

说:

在会议的后半段,已经有传闻说要批判《苦恋》了。这样,会议的气氛就明显地不好了。按照原定会期,还有五六天才结束,我们主持会议的人,似乎不知道怎样收场了。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林杉同志和我几次到周扬同志那儿去,汇报会议的情况,希望周扬同志能给予指导。可是,周扬同志只听汇报,并不表明态度,对《苦恋》这部片子,我记得他也没有明确的支持或反对的态度。这样,会议就虎头蛇尾地收场了。

会后影协内部进行总结,有人追究《太阳和人》事件责任,疾言厉我,气氛森严,颇有点又要开展一场反右运动的味道。林杉同志未在大会上发过言,总结会上却表示他要承担这个事件的全部责任。我对这位在多次政治运动中挨整的老剧作家勇于承担责任的表态,肃然起敬。如果说这个事件果真是一个重大政治错误的话,别的人且不论,我至少也应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幸而时代已进入新时期,《苦恋》事件并未发展成一次反右的政治运动,我们也就蒙混过关了。

这样,正像陈播所言,这部片子就不单单是个送审的问题了。如何处理?陈播回忆说:

在这种情况下,中宣部和文化部就更加慎重。这时,文化部是周巍峙同志任代部长,他接手处理这件事。他认为,这部片子是有错误的,我们电

影局的意见是对的。另一方面,根据王任重同志的意见,他强调,对这部片子要民主,要修改。

当时,我们担心白桦和彭宁不尊重我们的意见,特意请了陈荒煤、司徒慧敏等电影专家,我们一起与彭宁谈话,谈修改意见。

尽管有电影专家出面,白桦和彭宁还是希望影片不要修改了。面对着一方面是一片叫好声,另一方面是文化部要求继续修改的局面,白桦想到要让中央高层领导看看这部片子。他找到了胡耀邦: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晚,我求见胡耀邦,惟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看片子。他可能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拒绝了我的请求。他告诉我:“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我的秘书就不赞同。”……他说:“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后来,这部电影一直没有通过。

不过,尽管胡耀邦拒绝了白桦的要求,但在社会上对这部片子沸沸扬扬的时候,还是保持了一种冷静的态度。白桦在《我所见到的胡耀邦》一文中写道:

已故的中央党校秘书长宋振庭,在当时打电话告诉我,尽管沸沸扬扬,耀邦在你这个问题上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

抵制了那些“左”派同志,重申他的一贯主张:再也不能以一部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于知识分子了,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白桦:《我所见到的胡耀邦》,载《怀念胡耀邦》第3集,香港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21页)

文艺界领导层之间的分歧

在这“沸沸扬扬”的时刻,文艺界领导层之间对《苦恋》的看法也产生了分歧。

1981年2月14日,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领导的刘白羽致信周扬、王任重,“建议在文艺界党员学习大会上放映‘太阳和人’,联系实际,进行讨论”。(1981年2月14日,刘白羽致周扬、王任重信)

周扬、张光年、夏衍、陈荒煤等人,与王任重的意见一样,不枪毙影片,促使作者修改。林默涵和刘白羽虽同意这样的意见,但仍有自己的看法——张光年有生动的记载:

(1981年)2月23日,上午到周扬家开碰头会,着重谈了白桦的电影《太阳和人》修改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白羽、默涵咄咄逼人,碰得夏衍老头气恼不置。(张光年:《文坛回春实录》(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

从这则日记可看出,在当时,最起码是意识形态领导部门中的部分领导,对于处理“《苦恋》问题”是相当慎重的,而且,对于《苦恋》的“修

改”(即“挽救”)已经基本“取得一致意见”,但是,从张光年笔下刘白羽、林默涵两同志“咄咄逼人”的表现来看,刘、林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或者说不愿就此罢休。刘白羽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领导,这也是稍后的“《苦恋》风波”最先起于《解放军报》的重要原因。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苦恋》的作者白桦是部队作家——武汉军区,这也使得《解放军报》对于他的批评“师出有名”。

在此前后,主持编辑《时代的报告》的黄钢等人,将《太阳和人》产生的过程写成报告,送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求中纪委介入。中纪委接到报告后,在中纪委第三次会议上曾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在“思想问题座谈会”上,苏一平讲话中提到此事:

中纪委对此片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有个同志说:现在电影、小说就是两个题材,一是爱情,一是反右派和“文革”问题,看了以后悲悲惨惨,不能鼓舞和激发人的积极性。这是自己人和自己人对着干,自己拆自己的台,哪天垮台了,宣传部门有责任。他们认为《太阳和人》是否定三十年,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是一部很坏的影片,不应公映,必须进行批判。(见《会议简报·苏一平发言记录》)

中纪委讨论后,对此事的处理也是很慎重的。中纪委打电话给中宣部,询问是否要中纪委出面来处理。王任重征求周扬的意见。周扬则召集一个

小会讨论。张光年记载说:

3月2日,上午到周扬处参加核心组例会,……黄钢借《太阳和人》电影事件向中纪委写报告,要求调查出笼经过,追查支持者。周扬在会上征求意见,默涵支持黄钢,贺赞成调查,陈荒煤和我表示反对,夏衍、赵寻、陆石等也不赞成作为违纪事件处理。我第一次同默涵公开争执。(张光年:《文坛回春实录》(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

尽管有林默涵同志对黄钢举动的赞成,但会议还是认为,中纪委不应介入此事。随后,王任重根据周扬等人的意见回复中纪委:电影正在修改,还是由文艺工作的领导部门来处理,不然会使文艺界更紧张了。

但是,到了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却发表了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对这部电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此后,关于这部电影的争论也推向社会,并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本刊更正

本刊今年第1期23页对作者的说明应为:李昌同志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时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全国总队长。

曾国藩与天津教案的现代法理评析

——读唐浩明《曾国藩·黑雨》

● 胡铁民
黎映桃

清朝咸同年间,西方列强在中国广建教堂,传播教义,教堂的所立之处,滋事不断。正如唐浩明文中所言:“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曲直,一概庇护教士。遇民教争斗,平民疽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思一呈。”江西、四川、贵州、湖南等省连发教案,而天津教案因死人之多,闹事之大,尤为引人注目。中兴名臣曾国藩,时任直隶总督,因天津教案,清廷令曾氏驻节天津,悉心专理。该案事关多国主权,涉及清朝督、抚、道、府、县数级官员和方圆百里地方百姓,尤其是当时还存在国内士大夫阶层和民众爱国排教情绪高涨的实际情况。这些特征均表明了天津教案的错综复杂与纷纭莫测。但此案经曾国藩苦心横虑,努力弥缝,终被办结且成为历史的陈迹,而曾氏办理天津教案的是非成败及所反映出来的法理问题,不能不引起读者的思考。

一、基本案情及关键争端介说

同治九年,法国在天津海河北岸的狮子林桥边建立望海楼教堂。这年夏天,因当地百姓传说天主教堂的育婴室迷拐小孩、挖眼剖心,部分乡民组织起来告发教堂。在天津知府张光藻带人初查而无法落实时,围观百姓同教堂因口角发生冲突,但行为仅限于“丢石头、丢垃圾”。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暴怒的领事丰大业“像一头受伤的野兽”,迅速带人闯入三口通商街和天津府衙门,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丰大业又对其在狮子林浮桥上遇到的静海知县刘杰进行傲慢训斥,刘杰与之辩论时,丰大业开枪向刘杰射击,射死挡在面前的刘杰家人刘七。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犹如“一颗开花炮弹”激起了天津民变。愤怒的数百围观百姓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扯碎法国国旗,打死多名传教士,最后放火焚烧了望海楼教堂,从而酿成了清朝震惊天下的天津教案。

教案发生后,法国调兵集结于天津、烟台,扬言“将天津化为焦土”,慈禧急速派老成持重的朝廷重臣曾国藩去天津处理教案。此后一个月时间内,法国代表同直隶总督曾国藩进行了反复交涉。双方对惩办原凶和修复教堂没有异议,要害的争端在于法方要求“天津地方官员抵命”和预先限定捕杀乡民的最低人数,而曾国藩认为拿官员抵命不可接受,因为“有损朝廷尊严,也于国法不合”。但在法方的强硬外交和清廷害怕引发战争而下令曾氏作出让步的情况下,曾国藩违心地答应了法方的要求,虽然后来在落实这些要求时曾氏作了部分变通,但曾国藩却从此案办结之日起就因被国人责骂而名毁津门。

二、本案法理的现代评析

1、从具体案情看天津教案的性质与是非曲直。本案有诸多特殊之处：事关教民相争，教堂教士为百姓所围攻，是为教案；事关中法相争，乃至中、俄、德等国的外交争端，是为涉外案；事关杀人、伤人及打砸焚烧教堂，是为刑案；本案含丰大业在内，打死外国传教士 20 余人，烧毁财产价值巨大，引发严重外交争端，为通天大案；涉案人员有乡民数百人，且乡民为自发行动，恰如现代所言群体性事件。因此，天津教案是一起有着许多特殊属性的特别重大的刑事案件，它因自身带有浓厚的政治、外交色彩而无疑变得复杂难办。

在今天看来，就事论事与以案说案，有两点可以分析：一是百姓因怀疑法国教堂有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罪行，而围攻教堂、骚扰传教士是说不过去的。因为仅是怀疑不能作为判断定性的依据，曾国藩也认为，“于情于理，洋人都没有必要这么做”。而事实上，曾氏抵天津后，即派人对此传闻进行调查，“查来查去并无确证”。二是丰大业开枪打死人固然有罪，他的责任自然有清廷与法国交涉而被予以追究，村民无权自治其罪，甚而毁国旗、烧教堂、打死 20 多人，致使后果极其严重，则更是百姓义举行为的局限。但从更深层次看来，法国对清朝的侵略与掠夺是从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等方面入手的，传教士的活动就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它构成了实质意义上的非正义。教民与百姓之间的争端处置上，事实上的不平等构成了形式意义上的非正义。这些非正义因素集结在一起转化成一种正义对非正义的强烈清算。从这点意义上讲，清王朝那样众多的士大夫和当时的国人鼓呼“宁和法国开战”也不能答应法国的非分条件就不难使人理解了。

2、从办案过程看传统士大夫操守和法观念。曾国藩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以“仁爱礼义”持身，讲究经世致用。他的很多传统士大夫的操守在办理此案中时有体现。（1）爱国拒强。法国公使上门交涉时粗暴地宣称：“敝国上下震怒万分”，如不能答应提出的条件，则“恐生兵端”。曾国藩针锋相对地指出，丰大业“向我朝廷命官开枪，打死县令家人，更是事态激变的导火线”。他甚而想，法国强行在中国传播他们的教义是“可恨”的，朝廷应该借此机会，将侵略者“统统逐出国门”，真正实现“御强敌于国门之外”。

（2）尽忠职守。赴天津办案前，曾氏染病在身，在圣旨下达的当天，他还让李鸿章帮他运来建昌花板木材，为其准备后事之用。在幕僚劝说他称病请辞时，他说：“我身为直隶总督，天津发生闹事，我能不管吗？”他还引用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悲壮诗句自勉，决心向林则徐学习，力疾受命。（3）体恤下情。曾氏到津后，并未高居督抚位上，在天津各界士民要求见他时，他耐心地听取了天津百姓和地方官的意见。他一方面为百姓的行动寻找正义的因素，另一方面在地方官面临压力时，他好言宽抚他们，更是拒不同意法国代表提出的“严惩地方官员、杀官抵命”的要求，在天津地方官因此案被革职后，他还动员僚属私人出资，安抚官员家小。他亲自为这些“罪官”送行，并沉痛地表示：“三位进京受审，老夫心里深感疚意”，“让你们遭此不应有的委曲，这些日子，老夫惭愧清议，负疚神明，后悔万分。”

透过曾氏浓浓的士大夫礼义操守，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办理此案的法观念：（1）讲究公正。曾氏在接见天津士民时，曾当众大声宣布：“鄙人一定遵循国法，秉公办理。”在法国代表要求诛杀天津道台、知府、县令时，他坚持认为：“命官犯法，自有朝廷处置”，他表示应“交部议处”，否则，“大损朝廷尊严、更于国法不合”。在慈禧要他“多杀几个凶手”时，他认为应以查案结果为依据而不能事先预定杀人多少。（2）注重调查。这几乎是曾氏办案的一个惯用办法，在唐浩明全篇作品中，描写了曾氏多次亲历亲为调查案情。他有时微服私访，有时坐堂问讯，注意对案情作细致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在办理此案时，曾氏“趁着人少的时候去踏勘闹事的现场，询问育婴堂内的孤儿”，对知情的百姓进行走访，他表示：“不可再听市井议论了，要按自己已定的方针办。”他在现场附近的寺庙中整日整夜地与调查回来的幕僚交换意见，其注重调查的观念可见一斑。（3）警惕会党。曾氏总认为会党的力量很大，破坏也最大，这一点他比其他官僚看得更准确、更深刻。会党对政权构成威胁的教训对作为镇压行家的前湘军统帅现直隶总督来说，简直是太熟悉了。他在历次办案时都留心对会党的发现与清除。当他在本案中发现被调查的对象有

“水火会”的成员时,就抛开了办理教案本身的要求,提出要“借个机会,将它取缔”。这种现代社会看来类似危害国家安全的会党活动,在曾氏的法眼里是重中之重。

3、从案件的结局看封建刑事司法的局限。天津教案以严惩天津地方官员(在曾的力主下未被抵命)、处死直接闹事的百姓8名、修复法国教堂和赔款白银50万两为代价终被平息。在当时办案的曾国藩看来,这也许是最恰当的处置方式,但从当代法理角度考察,即可发现清朝刑事司法的局限。

(1)历史的局限。由于清朝发生教案的当时,正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开始,清朝的国家主权遭到了严重的削损。对于两国之间的冲突和争端,一则缺少共同的国际法作准则,二则既使在有国际法准则的情况下,在两国国力明显不对等时,平等地按规则处理涉外案件,简直是一句空话。本案正如唐浩明文中所言“教训是深刻的,教训是国家不强大。”当时法国陈兵津卫,以“即行开战”为要挟,清廷害怕了,屈服了,只能答应法方提出的苛刻条件。将当时的刑事司法附属在外交强权的门下,使刑事司法完全背离其原则要求而剥夺国内民众的不应被剥夺的利益。这正印证了现代人权保护是以国家主权为前提的法理结论。没有或缺少国家主权的国家,其国内民众也就没有或缺少人权。这种由于国家主权的不完整而使民众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事实,在清王朝的后期历史中,简直是最常见不过的。

(2)现实的局限。在清廷的当时观念中,并不存在“严格依法办案”的意图。清廷当时没有派出专职的刑事司法官员主持或辅助办案。慈禧考虑办案官员的人选时,也是以“老成持重”与“顾全大局”为标准,据此派出的可以“宽洋人之心”的“重臣”,当然首推节制天津的最高行政官员即直隶总督曾国藩。最有意思的是,清廷自王公大臣到地方各级官员,都认为办理天津教案的关键不在于刑事司法,而在于外交斡旋。并且,正因为当时司法依附于行政的现实状态,刑事司法的独立性无法彰显。即便是多次表示“秉公办案”和“勤勉为政”的曾氏其人,其办案过程也免不了因缺少刑事司法的技能和切实可行的规则而显得毫无程序可言。甚至“擅权夺情”,

生出严重背离今天的刑事司法理念的“为多杀几人,而用其他案犯替代”的司法舞弊行为来,这不能不说是清廷刑事司法的一个讽刺。

4、从法、情、势冲突看曾国藩的人物悲剧。在《曾国藩》一书中,作者用了大量的笔墨,对主要人物曾国藩进行了刻画,在天津教案的写法上,着重突出了曾国藩的人物悲剧色彩。

曾氏的天津之行是近乎悲壮的。他在同一天收到了为自己做棺材的建昌花板和皇上的圣旨,他联想并预感“此去津门,有去无回”。在尽忠王事与畏惧艰难的冲突中,他写下了遗嘱,决心宁牺牲“衰朽之身”,也要履实君命。曾氏在办案过程中,力主“不能将地方官员抵命”,但导致了法方坚船利炮和清廷的训斥的威压,在多重法、情、势冲突面前,曾氏左右为难,最终公正、人情、国法只能向“形势”屈服,这给曾国藩的良心造成极大的痛苦。他多次表示“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曾氏和当时国内民众及朝廷的士大夫普遍排教拒外一样,也有爱国的激情并讲究民族的自尊,也有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的言行。在国力严重悬殊,“战争即将爆发”的双重冲突面前,曾氏异常悲愤,是坚持自己的办案主张,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还是为“使国家和民族免遭战火”而向法方屈服,在两难选择的狭缝中挣扎的曾国藩的人物悲剧色彩因此而愈加明显。

曾国藩是一个功勋盖世而又恪守儒家正统经义的精英高级官僚,他平素以“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因而自律颇严,自视颇高,一直渴望有较好的官声民望。特别是赴津之前,他即以平定“洪杨之乱”的奇功被赞誉于当世,而天津教案的办结使当时举国上下一片沸腾,人们咒骂他出卖国权,堪为民族败类,他时常感到“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及至于对被扩大化处死的百姓家庭进行补偿和对被误伤的百姓进行周济后,他“心灵深处才觉得好受些”。天津教案无论是情、形还是法、势在诸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冲突,要解决这些冲突就不得不扭曲自我。从办理此案的第一天起,曾国藩就自明且必然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名毁津门的事实成为曾国藩内奉操守、外薄清名的一生中的最大的遗憾。

(责任编辑 李 晨)

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 符合当时中央的战略部署

● 王辅一 李维民

2005年第4期《炎黄春秋》发表的署名王人广的文章《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吗》,对于我们所写的《也谈从大局看皖南事变》(见《炎黄春秋》2004年第9期)提出不同的意见。现回复如下:

新四军军部去皖南前有请示,到皖南后有汇报,中央并未提出异议

《王文》认为,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不是中央的战略部署,“项英却将军部和第三支队留在皖南,孕育了以后惨遭损失的后果”。《王文》全文引用了1937年12月30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康生、陈云《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致长江局(陈、周、项、博、叶)的电报后说:“将这封电报的内容作为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的主要根据是错误的。”又说:“电文中并无把‘新四军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设在皖南’的内容与涵义。”我们认为,《王文》这个结论与事实恰好相反。上述电报显然是首先考虑了新四军组成后如何展开和部署而提出的,电报中明确提出“苏浙皖赣边军区,以皖南为重心。……我们则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这两个支队占了新四军部队的一多半。在此之前,中央在10月1日电报中曾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是十分重视他们。……我们应采取下列步骤,达到保存这些支点。”在与国民党谈判新四军编组问题时,国民党当局曾想把新四军调到山西前线去,而我党中央则以“新四军参加东南作战,不北调”为主要条件。后来经过“折冲结果行动地区是在江南”。12月30日毛等提出的长江南北作战部署建议,并不包括国民党军的主力

部队(即江北的第五战区和江南的第九战区的100多个师、百余万人),只限于建议在武汉外围地区设立两个主要军区和几个辅助军区,两个主要军区不过“各部署三万至五万兵力”。在这些外围地区,显然我军是重要的力量,这个建议与上述保持我党在南方战略支点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

当时新四军去皖南集中,不是项英个人的决定。关于新四军军部的驻地,1937年11月8日毛泽东提出:“军部第一步设南昌”。如果说向敌后发展,南昌比皖南离敌后还要远,去皖南已向北前进了一步。当时,日军正气势汹汹地向南推进,如果继续南下,皖南也就成了敌后。后来因为华北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迟滞了日军南进的步伐,这在当时是难以预测的。1938年1月14日,项英请示中共中央和长江局,提出准备“集中部队,向皖南休宁、徽州一带集中”。15日,长江局复电项英并告中共中央:“同意部队即向皖南集中”。项英和长江局的两个电报,中央都会收到,新四军军部直到4月4日才离开南昌,在这两个多月内,中央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2月27日,叶挺将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向皖南开进的情况电告朱德、彭德怀。新四军军部到达皖南后,项英也发过几个电报向中央报告部队情况,毛泽东和中央均未对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有任何异议。就是皖南事变后批判项英时,也没有说军部当初设在皖南是错误。

项英参与制定并贯彻执行了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方针

《王文》指责项英没有执行中央关于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实际上,项英不但参与制定了向敌后发展的方针,而且贯彻执行了这一方针。1938年2月14日,项英、陈毅在南昌联名向毛泽东建议:新

四军编组后,不应全部集结岩寺,应尽量前伸,向浙、苏、皖边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等地配置。这是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最早构想。《王文》在引毛泽东2月15日复项英、陈毅电中,只讲毛泽东提出要向苏南敌后发展,却将第一句话“同意(项英、陈毅)14日电的行动原则”故意不提。4月初,新四军军部和主力大部进入皖南后,不到一个月,就走出了向敌后发展的第一步。项英与军领导人一起,从第一、二、三支队抽调侦察分队和部分干部组成先遣队,由粟裕率领,于28日出发,挺进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第二天,项英向毛泽东和长江局报告:“先遣队已出发,各支队不日陆续跟进。”6月4日,项英又致电毛泽东:“我一支(队)全部已入敌区,正向溧水、天王寺方向前进。”第二支队也于六七月间分路进至苏南,到1938年底,初步建成了苏南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第四支队于5月进至皖中开展游击战争;第三支队于7月中旬进至皖南南陵北面的西河镇一带抗击进犯之敌,后转到铜陵、繁昌沿江一带抗敌。11月17日,项英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向北发展的精神,派张云逸参谋长率军部特务营和一批干部,由皖南赴江北无为地区,加强江北抗日斗争的领导。

1939年2月,周恩来到达云岭新四军军部,与军领导人商定并经中央批准的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第一句是“向南巩固”,就是说,不是放弃皖南,而是首先巩固皖南,同时向东作战,向北发展。从1939年3月下旬起,项英与叶挺一起,报经中央和军委批准,加强江北的工作,包括: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兼任指挥,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兼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军部参谋处长赖传珠任江北指挥部参谋长,统一指挥第四支队、第五支队及江北游击纵队。后又派第四团第一营和第五团第三营去江北皖中。7月,项英在云岭与陈毅约见管文蔚,确定将管部上升为主力,为由苏南向苏北发展作准备。8月,向中央和军委建议,鉴于张鼎丞已赴延安,第一、二支队统一由陈毅指挥。11月7日,第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组成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统一领导苏南地区的抗日斗争。11月中旬和12月初又将第四团主力(旋即改为苏皖支队)和以第六团为骨干的

挺进纵队派往江北,在扬州一带开展抗日斗争。江北、江南指挥部的成立,表明了新四军初步完成在大江南北的战略展开。

1940年1月14日,项英在云岭召开军分会、东南局联席会议,认为“江南应大力争取苏北,来配合江北与华北打成一片,在战略上力争华中优势”。1月20日,项英向党中央建议发展苏南东路(指江阴到无锡公路以东、宁沪铁路以北地区),以阳澄湖为基点,灵活开展游击战争。3月派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任“江抗”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要他带一批团、营干部,将苏南东路的抗日武装统一编组,到当年10月发展到3000余人。同年夏,项英要军部战地服务团大部去苏南随陈毅北渡,又派东南局青年部长陈丕显带一批干部前往,协助陈毅开展苏北地方工作。至1940年底,新四军由1938年4月编组时的10329人,发展到88744人,歼敌顽9万人,在苏南、苏中、皖中、皖东建立起抗日根据地。

以上事实说明,项英不仅参与制定了向北、向敌后发展的方针,而且贯彻执行了这一方针。对此,中央曾多次给予肯定。193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给项英转新四军党代表大会全体同志的贺电中指出:“新四军的领导同志在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阵地上,锻炼出坚持党的路线至死不屈的党的坚强干部,保存着各个游击区域艰苦卓越的武装骨干,发扬着布尔塞维克英勇奋斗的光荣传统,为党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成一支抗战前线上的新四军。在抗战两年中,新四军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战阵地,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给了敌人无数次的损伤,破坏了敌人无数次的‘扫荡’,并且正打击着敌人以战养战的新政策,为大江南北沦陷区域的群众指出一个光明的奋斗目标,与新四军一起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大江南北的游击根据地,以争取长期抗战的胜利。这是你们的成功,这是新四军党的领导的正确。”新四军在皖南期间取得的业绩,与项英的辛勤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新四军军部未及时撤离皖南,责任不在项英一人

《王文》说:“在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磨擦日甚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力促皖南军部和部队转移”,

而项英强调困难丧失了转移时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1940年春季之前,中央从未提出过新四军军部撤离皖南的问题。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还是:“陈毅猛烈发展苏北,……项英直接指挥皖南斗争,巩固现有阵地,建立政权,力求扩军。”

1940年4月23日,项英在转报陈毅、粟裕等21日关于放弃皖南、集中力量发展苏南的建议时,项英赞成军部移至苏南。5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项英、陈毅:“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但《王文》却把中央书记处复电中要求项英“惟请注意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的重要内容删掉了。实际上,党中央既同意新四军军部和皖南主力移至苏南,同时又要求坚持皖南阵地,并且还要发展皖南。

5月28日,项英、袁国平向中央报告:军部将率第一、三团东移;留第五团在皖南。此后由于当时国民党方面坚持以新四军江北部队南调为先决条件,为东移设置障碍,致使皖南军部和主力东移的问题被延搁下来。《王文》引用7月12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的电报:“请项英同志妥为布置,以维持我军原有地区。并准备于适当时候,将军部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然后引用项英的电报:“据上饶谈判结果,暂不可能取得合法东移。目前的布置和计划,应依目前情况,皖南部队仍坚持原有阵地,准备独立斗争。”《王文》由此断言:“这样,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丧失了转移时机,并使自己陷入受袭击的危险境地。”把责任完全推给了项英。

应当指出,国民党与新四军的关系,在皖南事变前、后是截然不同的。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受国民党第三战区指挥,弹药也由他们供给,行动受到限制。1940年11月1日,毛泽东起草的致项英电也说:“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只好留皖南。”这个电报说明,当时中央并未要军部不顾一切从皖南撤离,也说明当时皖南情况复杂,并非是说走就走了的。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方面发出“皓电”,要新四军北移,到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

变,其间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为什么新四军军部未能及时转移,这是问题的关键。

1940年11月9日,为答复国民党方面“皓电”,毛泽东起草的“佳电”中宣布新四军皖南部队将“遵令北移”江北。第二天,即11月10日,毛泽东致电叶、项:叶挺去三战区与顾祝同谈北移问题时,要国民党汤恩伯、覃连芳两军停止东进,不要进攻皖东,作为谈判“第一位问题”。同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他告诉国民党方面“如汤(恩伯)东进则战事难免,皖南部队北移亦难免发生波折,我方均不负责任。”11月15日,毛泽东在对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的指示中讲道:“蒋介石怕我皖南不动,扰其后方。故我对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准备,以为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12月1日,中央致电周恩来、叶剑英的电中还讲道:“皖南部队北开,但须延缓开动时间,解决补充条件,保证道路安全。”

从以上各电可以看出,毛泽东讲的皖南部队“北移”是有条件的,条件不满足不走。但是,蒋介石在我军取得黄桥战役胜利后,即策划了进攻新四军的阴谋,制定出《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不可能再给我军饷弹。当时中央对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和决策的某些失误,正如《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所说:“在‘佳电’发出后和蒋介石的‘齐电’发出前的一段时间里,毛主席一度对形势作出较为乐观的估计,认为蒋介石大举‘剿共’不可能,一切做法是吓我让步,大吹小打。为加强政治斗争的筹码,曾提出在皖南偏要再拖一两个月,而不立即北移的主张。”直到12月18日,从延安发出的以朱、彭、叶、项名义致重庆周、叶转国民党方面的电报还提出:“近日东京及南京广播,已宣传新四军移动事,因此移动必有周密之准备,否则有被敌伪阻碍不能通过长江南北多道封锁线之虞,……又移动之前请求对饷弹予以补给,现尚未全领到,故请转陈委座,展缓移动时间至明春二月半,在二月十五日以前德等保证全部离开皖南现地,不留一兵一卒。”这是新四军军部未能及时转移的主要原因,因而把责任完全推到项英身上是不公正的。

(责任编辑 吴 思)

笃好文艺的皇帝多败国

● 官伟勋

历史上，凡笃好文艺并有卓越成就的皇帝（包括一些没正式当上皇帝但几乎当上皇帝的），不仅政绩都不佳，而且大都弄得国破身亡“不得血食”。

汉灵帝刘宏，“好文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召纳许多“能为文赋”擅长“尺牍及工书鸟篆者”，并待制鸿都门下，“无行趋势之徒”（一些品行不端趋炎附势的家伙），“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这位汉灵帝，因为好文，所以也特会玩，“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他自己则“著商贾服，从之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躬自操辔。”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京师转相仿效，驴价遂与马齐。”在他统治时期，宦官专政，党锢之祸复起。因国库空虚，为了弄钱，公开标价卖官。不够，又把天下田亩增税十钱，兴师动众，大修宫室，终于激发了黄巾起义。东汉之亡已无可避免。

东晋末，刘毅与刘裕争帝位。“刘裕素不好学”，刘毅“颇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归之”。宁远将军胡藩曾问刘裕：“公谓刘卫军（即刘毅）终能为公下乎？”刘毅最终肯在你之下？裕默然。问胡：你怎么看？胡藩说：“连百万之众，攻必取，战必克，毅以此服公。至于涉猎传记，一谈一咏，自许以为雄豪，以是缙绅白面之士辐凑归之（车马盈门），恐终不为公下。”刘毅身边聚集了那么多“白面之士”，一个个都以能谈史咏诗自豪，但却缺乏办实事的能力，缺乏军事指挥才能，结果刘毅被刘裕彻底打垮，刘毅深夜投奔牛牧佛寺，要求避难。该寺因当年曾窝藏刘毅的政敌桓蔚，老和尚被刘毅所杀，所以和尚们怕再受牵连，不敢收留刘毅。刘毅叹道：“为法自弊，一至于此！”上吊死了。

最典型的应数梁元帝萧绎。此人好读书好到

入迷的程度。自己读累了，让侍读替他读，他听，昼夜不断。歪在榻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书。侍从见他已入睡，念的不认真，念错一句，他会立即惊醒：“不对吧！”他写东西不打草稿，援笔立就，自称：“我深于文士，愧于武夫！”大军压境，城破在即，他还召集大臣上课，给他们讲《老子》。眼看城破了，伤兵哀号，尸体遍地，他还要求大臣每人即景赋诗一首。敌人攻进来了，他不忙于组织抵抗，而忙于烧书，人们问他为什么？他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他不怪自己脱离群众脱离实践，反而怪书本！

隋炀帝杨广，史称“善属文，不欲人出其右”。善长文学，不想让任何人超过他。他“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当谓侍臣曰：‘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朕与士大夫高造，亦当为天子矣。’”意思是，人们都以为他是靠继承父皇之位，而当上皇帝的。其实我就是跟天下文士比试，也会是天子的。他善于作文章，还会写诗，酷爱著述。大业十一年正月，增秘书省官百二十员。史书上说：“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为帝，前后近20载”，修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蒲博（古代一种博戏）、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31部，万七千余卷。”他爱著书，还特爱书，搜集很多善本，“于观文殿前为书室14间，窗房床褥厨幔，咸极珍丽，每三间开方，户垂绵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杨广要去书室时，宫人执香炉，走在前面，踏着机关，二飞仙就下来把帐幔收上去。“户扉及厨扉皆自启”，杨广出来时，“则垂闭如故”。瞧，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我们这位历来倍遭唾骂的杨姓皇帝已经在搞自动化了。

宋徽宗赵佶,擅长书、画、乐、舞,能文章,传有真书及草书《千字文》等。“绘画重视写生,以精工逼真著称。工花鸟,相传用生漆点鸟睛,尤为生动。他广收深山的奇石,江湖中的异物,抢占天下名贵花石树木,称“花石纲”。为运这些奇石珍竹果木,毁桥梁,凿城郭,不知糟蹋了多少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铸九鼎,用掉22万斤铜。铸成后,饰以黄金,建九座大殿安放,称九成宫,他亲自著《九鼎记》以记载这一“盛事”。

公元1135年,元顺帝看到宋徽宗的画,一再表示赞赏。翰林学士库库在旁说道:“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元顺帝问何事?库库说:“独不能为君耳。身辱国破,皆由不能为君所致。人君贵能为君,他非所省也。”

库库的批评,看似苛刻,实际上很中肯。隋炀帝与宋徽宗的悲惨结局是大家都清楚的。

南唐二主李璟、李煜,史称“多才艺,好读书”。李璟,“善容止,器守高远,性宽仁,有文学。”李煜“能诗文、音乐、书画,尤以词名”。他那些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流水落花人去也,天上人间”!千百年来倾倒了多少文人雅士!可惜他“风流才子误作人主,至有入宋牵机之恨。”所谓牵机之恨,是指他被宋俘虏后,被迫服用了牵机药,死前在床上,肚子疼得脑袋连连碰膝盖。

爱好文艺著名的还有唐玄宗,他酷爱音乐舞蹈,会作曲,培养出无数文艺尖子。“梨园子弟”中的“梨园”二字,就是来自他的作为。其他爱好文艺出名的还有刘裕的儿子庐陵王义真,“警悟爱文艺,而性轻易”,与谢灵运为密友,被司空徐羨之杀了。还有北朝秦王兴的太子泓,“性宽和,喜文学,善谈咏,而性懦弱”,被晋抓到建康,跟他老婆一块“被斩于市”。

明人,《谷山笔麈》的作者于慎行,有如下分析:“人主之好文章书画,虽与政理无裨,然较之声色狗马,雅俗不同。且从事文墨,亦可陶冶性灵,简省嗜欲,未必非养身进德之助。”这分析有道理。接下去他又说:“自古兴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表章经训,劝学崇儒,如汉武唐宗是也。败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耽精技艺,善画工书,如陈叔宝,李煜是也。然使陈、唐二主留心国政,忧勤万机,即

耽精文艺,政自何妨?惟其庶政怠荒,万事不理,而一于流连光景,弄笔染翰,与雕虫之士争短于尺寸,斯其所以败耳。”中肯,但难以做到。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国家之事太多太复杂,罄尽全力尚且未必做得好,况且生活在变化,社会在发展,需要学习研究的新问题很多很多,如再“耽精文艺”,对诗词对书法或绘画精益求精,是很难两全的。要吟出一句好诗,谈何容易?“为安一个字,拈断数根须”。贾岛为了“僧敲月下门”,是敲好?还是推好?骑在驴上,自言自语比比画画,费了多大的劲?老那么琢磨,能不误正经事吗?

当然,业余时间有些此类爱好,不刻意求精,不主次不分,倒也确实不失为陶冶性情劳逸结合的好方法。

其实,好学的帝王也并不少,“周公朝读百篇书,夕见七十士”;宋太宗“开卷有益,不为劳也”,康熙“手不释卷”,“至于咯血”,曹操、李世民也都是好读书的人,怎么没亡国呢?李世民有段故事很说明问题。

唐贞观十二年,著作郎邓石隆打了个报告,建议把李世民发表过的言论搜集起来出个集子。李世民说了下面一段话:

“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是为不朽。若为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不同意给他出专集。

看来,以上种种,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是把德政放在第一位,还是与天下文士争短长,把个人耽精文艺放在第一位?简单点说就是:是为政而好文?还是为文而好文?

莎士比亚在《爱的徒劳》里有段台词:

“读书人总是这样舍近求远,当他一心研究怎样可以达到他的志愿的时候,却把眼前应该做的事忘了!”

颜习斋说:“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李恕谷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

这些话,都是针对他们当时所处的时代,读书人都把精力放在钻故纸堆上,不顾国家衰亡人民涂炭而说的。如不把它绝对化,不误以为他们在提倡读书无用,而了解其精神实质,这些见解都是很

宝贵的。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只可能在个别方面有大成就。热衷文艺的专攻文艺好了,有志于治国平天下的就专心致志于治天下好了。务求兼得者,怕不利于国也不利于己。不过,说服文艺大家不去谋权,大约容易些。就是他不服,这种人大致也弄不成。碰两下钉子他也就服了。但若说服后者怕就难了。

隋炀帝在那个时代就能编著那样的《百科全书》,还能搞自动化,实在难能可贵,人们在推翻他的王朝否定他在政治上的某些方面时,连他开大运河,和在著述上的成就也给否了,甚至给毁了,这实在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损失!

对历史,该接受的教训一定要接受,该肯定的,不管他是什么人,都应该予以肯定!

(责任编辑 致 中)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 费
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满 妹	39.00	6.00
胡耀邦传	张黎群等	50.00	6.00
改变那个世纪的人和事丛书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50.40	6.00
——梁漱溟与毛泽东	汪东林		
——亲历一九五七	徐铸成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	中共党史出版社	285.00	20.00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张树德	69.80	7.00
文化大革命简史	金春明	28.00	5.00
走进怀仁堂(上下)	董保存	55.00	6.00
林彪的这一生	少 华 游 胡	28.00	5.00
国事忆述	陈锦华	48.00	6.00
从陈独秀到毛泽东	冯建辉	22.00	5.00
庐山会议实录	李 锐	18.00	5.00
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	杜润生	35.00	6.00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熊向晖	29.00	5.00
陈独秀风雨人生	朱 洪	28.00	5.00
梁漱溟问答录	汪东林	25.00	5.00
刘少奇蒙难始末	图 们 祝东力	17.00	5.00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邓 野	29.80	5.00
农业学大寨始末	宋连生	28.00	5.00
工业学大庆始末	宋连生	30.00	5.00
周扬与冯雪峰	徐庆全	28.00	5.00
走出个人崇拜——一个年代的反思	冯建辉	16.50	5.00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图 们 肖思科	28.00	5.00
25年——1978—2002 中国大陆			
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	王 安	26.80	5.00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江 涛	40.00	6.00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队	宋 波	40.00	6.00
侵华日军主要将领的最后结局	朱晓艳 班惠英	40.00	6.00
党史札记(一集)	龚育之	28.00	5.00
党史札记(二集)	龚育之	35.00	6.00
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	群言出版社	38.00	6.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35.00	6.00
马克思主义者瞿秋白	龙德成	28.00	5.00
家书抵万金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编	23.80	5.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本书系大型政治性资料图书,如实反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至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共 1600 余人的简历,为国内外读者了解建党八十多年来中共中央历任领导成员的有关情况提供翔实的资料。本书的编纂,注重严肃性和权威性,资料来源可靠,收录内容准确,编纂体例规范。

《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从土改到合作化,再到大包干。作者参与了中国农村重大变革的核心决策。本书记载了亲历、亲闻、亲见,而且语气简练,生活具体,见解深邃,如作者著名的演讲风格,对于想了解中国农村历史的人,本书堪称宝藏。

《红墙大事》作者从事党史和军史研究近 20 年,接触了许多当年的档案文献及当事人,本书记述了共和国历史上许多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的酝酿、争论和展开,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制定和实行。以史实为准绳,以文献为依据,按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向读者真实地展示了那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家书抵万金》由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题写书名。书中收录的 30 余封家书是从 3 万封家书中精选出来的,最早的写于清代,最晚的写于 20 世纪末,分为手足亲、睚眦缘、反哺义、舐犊情四个部分。每封家书都配有原汁原味的家书原件照片、相关人物的精美老照片和家书背后的精彩故事。书后还附有中国家书的源流、体例、礼仪及抢救民间家书倡议书。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69 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 10% 付邮费)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06年第**2**期

韩光 —— 屈指忆征程

叩访李四光故居

李正文在苏联劳改营

胡风与王实味冤案引出的同类教训

“罗思鼎”和“朝霞”事件

笃好文艺的皇帝多败国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5.80元